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文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3102982

D231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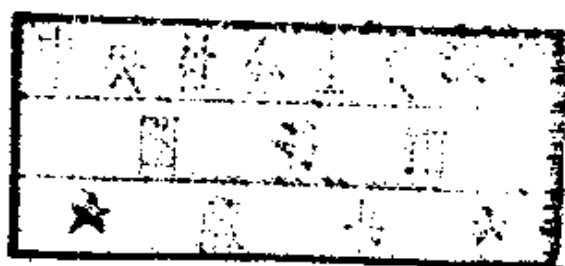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文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201029822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开国文选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10

ISBN 7 - 5073 - 0604 - 6

I. 开…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史料 IV.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922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

著 者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 / 张 宁

封面设计 / 张 戈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 北京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850 × 1168mm 32 开 21.5 印张 43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7 - 5073 - 0604 - 6/D · 145 定价: 3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DI44/25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大陆上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结束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为了纪念建国五十周年，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共和国开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我们从有关开国的报告、文电、纲领、决议、宣言、公告等文献中，精选了九十二篇，分为“新中国蓝图”、“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建国纲领”、“隆重开国”、“施政方略”、“团结统一”和“对外关系”等八个专题，编辑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一书。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国家的高度智慧和排除万难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拥护，反映了国家由丧权、独裁、战乱、分裂、贫弱走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历史转折。

本书所收文献，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代表会议的信，最晚的一篇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

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收入本书的文献，除个别篇目，大多数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有的专题，根据文献内容又分为若干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在目录上以星号分隔。每个专题和每个部分的文献，均以时间为序排列，其中一些重要文献的标题，在目录上用黑体字排印，少数文献收入本书时新拟了标题，并在题解中作了说明。所收文献均在文末标明了版本依据，一般不加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九年六月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

田漢作詞
呂驥作曲

CM $\frac{4}{4}$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1 2 3 4 3 2 1

(前奏)

2 3 1 1 2 3 4 2 1 1 2 3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起來！不願當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

2 3 2 1 2 -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3 0 1 2 3 4 1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每個人披上戰袍，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

3 2 1 3 -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

5 7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2 3 4 3 2 1

前進！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目 录

一、新中国蓝图

-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 (3)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 毛泽东 (7)
(一九四八年九月)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 (26)**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 (43)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 (47)**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
斯大林的报告…………… 刘少奇（62）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 周恩来（88）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向全国进军

- 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97）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 毛泽东（107）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15）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南京解放电……………（126）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128）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三、筹备政协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

目 录

- 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 (133)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
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 (135)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发表三党联合声明问题给李济深、沈钧儒
的信…………… (137)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复各
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电报…………… (139)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 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
协商会议的信…………… (142)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
- 毛泽东邀请司徒美堂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信 ……
…………… (144)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毛泽东邀请陈嘉庚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信…… (146)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毛泽东、朱德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 (147)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 宋庆龄 (149)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各民主党派联名祝贺中共二十八周年诞辰的电报 ……………
…………… (151)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

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罗翼群、刘斐等四十四人 (153)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邀请阿哈买提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电报…………… (157)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 * *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 毛泽东 (159)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164)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草案)的解释报告 …………… 周恩来 (168)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

…………… (184)

目 录

- (一九四九年六月)
- 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
..... (194)
-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朱德 (197)
-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 董必武 (200)
-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
..... (215)
- (一九四九年九月)
-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周恩来 (228)
-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四、建国纲领

-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周恩来 (247)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
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董必武 (253)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260)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269)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275)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五、隆重开国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泽东 (291)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刘少奇 (296)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
主要发言**

特邀代表宋庆龄的讲话…………… (301)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的讲话…………… (304)

目 录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黄炎培的讲话 (308)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的讲话 (310)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的讲话 (314)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发言 (317)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陈铭枢的发言 (322)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陈叔通的发言 (324)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蔡廷锴的发言 (326)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谢雪红的发言 (328)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发言 (331)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的发言 (333)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陈嘉庚的发言 (337)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国农工民主党首席代表彭泽民的发言 (340)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内蒙古自治区首席代表乌兰夫的发言…………… (343)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沙千里的发言…………… (347)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的发言…………… (349)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邓颖超的发言…………… (352)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席代表冯文彬的发言…………… (354)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的发言…………… (357)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 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的发言…………… (359)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刘格平的发言…………… (363)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的发言…………… (366)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吴耀宗的发言…………… (368)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
…………… 林伯渠 (371)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目 录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379)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闭幕词…………… 朱德 (383)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385)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通过)

* *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毛泽东 (388)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389)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391)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 *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

国旗的决议…………… (396)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39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
命令…………… (398)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的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秘书长名单…………… (402)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
负责人名单…………… (403)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

六、施政方略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
代表会的指示…………… (435)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刘少奇 (440)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任弼时 (448)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各县一律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470)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473)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
..... (476)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 附录：华中局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问题
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478)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 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 (480)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 *

- 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 (483)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 刘少奇 (504)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 刘少奇 (509)

(一九四九年六月)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 …………… 张闻天 (515)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陈云 (526)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制止物价猛涨 …………… 陈云 (537)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 周恩来 (54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 …………… (556)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政务院
第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 陈云 (561)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

好转而斗争 …………… 毛泽东 (568)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目 录

* * *

-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
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 (575)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
基本任务的指示…………… (577)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
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579)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

七、团结统一

- 毛泽东、朱德复重庆号巡洋舰官兵电…………… (589)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毛泽东、朱德对程潜、陈明仁等起义
通电的复电…………… (590)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 〔附录〕程潜、陈明仁等致毛泽东、朱德等
的起义通电…………… (591)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朱德对董其武等起义通电的复电…………… (593)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附录〕董其武等致毛泽东、朱德等的起义通电 …… (594)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朱德对陶峙岳、鲍尔汉等起义通电的复电
…………… (599)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录一〕陶峙岳等致毛泽东、朱德等的起义通电 …… (600)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录二〕鲍尔汉等致毛泽东、朱德等的起义通电 …… (602)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对“两航”起义通电的复电…………… (604)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录〕“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
起义的通电…………… (60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

毛泽东对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的复电…………… (607)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录〕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宣布脱离
反动政府的通电…………… (608)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目 录

* * *

- 毛泽东、朱德复班禅额尔德尼电…………… (610)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录〕班禅额尔德尼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报…………… (611)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 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 周恩来 (612)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邓小平 (617)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630)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八、对外关系

-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637)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 (643)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如果美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可考虑和
它们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 (645)

-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邓小平 (646)
-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毛泽东 (648)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 新中国的外交** 周恩来 (657)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 周恩来外长关于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
无权代表中国的声明** (664)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周恩来外长关于应立即取消蒋廷黻代表团一切
权利的声明** (666)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667)
-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



新中国蓝图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 “五一”节口号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如下：

(一)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

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地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七）向解放区努力生产军火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恢复工矿交通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改进技术的工程师、技师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努力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机关工作的人员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工业部门和后方勤务部门的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

（九）解放区的职工，为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减低工业品的成本而奋斗！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给市场！

（十）解放区的职工，发扬新的劳动态度，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反对一切怠惰、浪费和破坏行为，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十一）解放区的职工，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建立尊师爱徒的师徒关系！

（十二）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

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十三）解放区的职工会与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

（十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十五）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致敬！欢迎蒋管区的职工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业建设！

（十六）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

（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援助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二十二)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

(二十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刊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

毛 泽 东

一、报 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

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的柏林问题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

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

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

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

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统一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

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在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

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的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

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述》、《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

济、国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国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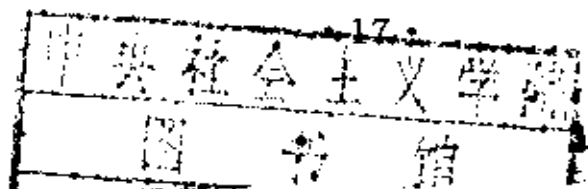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



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千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结 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很好；军事战略问题完

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3]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对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

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基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基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争中对国民党要批评。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

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如果李宗仁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

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都写了。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

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六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决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

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称为“九个照顾”。

〔2〕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3〕 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 泽 东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

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

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

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

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

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

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

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

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

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中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中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

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

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业已完满结束。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二十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

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全会指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论人民民主专政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

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

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

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

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

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

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

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民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

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

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 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刘 少 奇

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一、中国的目前形势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的地区已有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

* 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刘少奇率领同高岗、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形势，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以支持和帮助，同时，为建国后毛泽东访问苏联作准备。本篇是在中共代表团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进行初步会谈后，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的百分之卅（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二亿七千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一千零四十三个，占全国二千个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百五十九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在内，现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只有廿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三百九十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二百四十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与机关学校，空军有七千五百人，海军七千七百人。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在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方能去占领。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去占领新疆的最大的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自可大为提早。

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陷入完全的孤立，所

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但由于中国的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须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充分地加以估计了的，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现在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戒。但照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而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与阻止中国革命，并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作了一些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是能给我们一些困难和损失的，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动全中国的人民及其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种干涉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应付得当的话，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有可能不敢来尝试的。我们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实行武装干涉的口实，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增加困难。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

且已经在开始实行。这能够给我们一些困难，特别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将发生困难。但这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決定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

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务委员会，委员廿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零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

了解如下：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须要解释的。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1〕。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

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

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今年二月安得列夫〔2〕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这是在不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十来个民主党派，它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其党员总共不到三万人，其中民主同盟有二万人，是比较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影响的。它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

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党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来，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在最近才断绝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只是勉强地和共产党一致。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除开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而外，还没有最后地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欧洲国家所有的那种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比较有重要作用的，是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这些团体，有的已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发展会员中。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已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当能发生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开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并召开了妇女的、学生的、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

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及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迅速瓦解，其领导分子早已逃跑或消极了，其中较好的分子，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靠近我们。被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则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它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安得列夫同志今年二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员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一切城市中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在过去有很久的间断，今天还需要从（重）新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不能进行得很快。我们希望能有几个苏联有经验的同志去中国帮助这些工作。

三、关于外交问题

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受到失败以后，现在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下的方法来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与破坏中国革命；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四）用许多方法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接近，企图拉拢中共去与帝国主义国家靠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并且是有过经验的，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方针已载入我们二中全会的决定。这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军队所到达的地方，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业已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它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何种步骤和方法来加以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项原

则来进行：

（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情况，没有调查，据日本在一九三六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六国在华投资总额为十八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其中英国占十亿多，美国占二亿二千万，德国与意大利占二亿一千多万。铁路借款与政治借款占五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四亿五千多万，经营出入口的贸易投资三亿八千多万，经营工矿业的投资只有三亿六千多万，但在经过抗日战争以后，日本及德、意在华投资均被没收，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经济事业是：银行保险事业、进出口贸易事业、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有英国占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四百万吨）及上海与天津的英国烟厂和美国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工业，较占重要地位，其他事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事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

续活动，但若干帝国主义者已将活动资金向外逃避，或采消极的观望的态度。在将来的何种时机并采何种方法去处理帝国主义在华的各项投资呢？没收呢？还是采取其他的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决定。在目前，我们正忙于作战及其他工作，暂时还来不及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作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宣传文化事业，除开他们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而外，据旧的调查材料所载，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有卅一所，神学院有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教会三千七百廿九所，宗教团体九十三个，医院一百四十七个，慈善机关五十三个。对外国原来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到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在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

作侨民待遇他们。这样执行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则到处向我们请求和钻营，企图取得我们事实上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作也没有作过的事。但这样作，各国侨民感觉不方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地区的侨民约有十二万人，其中上海有六万五千多人，东北有五万四千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为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我们，或提出若干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来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呢？还是等一等，不急于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免得麻烦呢？在中国新政府成立以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快些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理我们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

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后，予以承认。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关于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作了些解释，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要是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就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宣言〔3〕。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中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

定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为增进与巩固两大民族的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

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

（一）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4〕}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

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作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空诸问题，我们希望能迅速地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

关于与东欧各新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

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与帮助，除开苏联派专家去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去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来苏联参观与学习，派一些学生来苏联学习。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5〕}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

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

关于苏联贷予中国的三亿美元的借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6〕}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刘少奇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根据刘少奇审定的原件刊印

注 释

〔1〕 见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原文是：“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〇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八九页）

〔2〕 安得列夫，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的化名。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七日，米高扬受斯大林派遣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了解中国革命形势。毛泽

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

〔3〕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发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由美、英、法等十二国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声明写道，《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以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条约。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动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反动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就将团结全国人民，“与中国的盟友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

〔4〕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曾规定，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但此项规定尚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国民党政府方面表示，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后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5〕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斯大林在会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时，表示不赞成报告中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这段文字，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翌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七月十

四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話，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先后向马林科夫、斯大林以及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人作了说明。

〔6〕斯大林在收到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及七月六日刘少奇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信后，于七月十一日晚召集会议，就有关问题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谈话的情况。电报内容如下：

（一）在我们将书面报告及若干材料送给联共中央斯大林以后，午真晚十时联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开会，我们及柯瓦洛夫参加，师哲翻译。到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甘诺维赤、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另列席索柯洛夫斯基，参谋总长、海军元帅。首由斯大林说明几个政治局委员已去休养，另有几个军人参加，因中国代表团报告中提到一些军事问题。斯大林首先问我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无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人员？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样？又问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当我们答复了上述各项问题之后，斯大林即展开对于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的说明，并答解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最后在我们请求之下对目前国际形势亦有所说明。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会后，斯大林并问我们生活是否舒适，由所有到会人员和我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解释。

(二)在会议中组织了一个借款条约的共同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柯瓦洛夫参加，中共方面由我们三人参加，并决定借款条约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因这样对联共在手续上较为适合，便于联共将条约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关于斯大林对我们报告中所提出及当时口头提出的各项问题之答复，综合报告如下：

A. 关于中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那些国家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的关系。中共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订一种对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

政策，使帝国主义廉价的商品不能在中国倾销，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使青年的国家工业也可逐渐发展起来；这是两利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私人资本家的企业，故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政策，在中国，目前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很困难的，而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罢工会要发生，我们暂时不要扩大劳资斗争，但工人斗争可能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发生困难，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的继续。

B.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

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斯大林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在我们答复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的问题之后，斯大林说：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在我们答复各区域（例如东北）及各省政府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权力批准和撤换各区域及各省选举的政府负责人之后，斯大林说：你们目前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的观点，是对的。其意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条件之下，不要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但斯大林很注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裂现象之可能发生。又我们在报告中没有提到买办资产阶级，斯大林问到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似乎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C. 关于外交问题

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这些原则就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斗争，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合作，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与各国特别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及企业，斯大林说：可以用劳动法，要各外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关于是否要争取各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D.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关于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斯大林说，你们可以与东欧各国谈判，苏联可以帮助，但最好你们直接谈判。并说：捷克以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可以供给你们商品，帮助你们，

你们可以勇敢地和他们谈判。关于联共与中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密切两党的联系，是对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一种联系。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即可以来，如毛还不便来，苏联可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E. 其他问题

1. 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说：因为在新疆无着陆场，空运军队到新疆，还无办法，至于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骑兵，那很简单，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开始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在看电影时，斯大林说：在二次大战中骑兵作用不大，因骑兵怕飞机，目标很大，很易被打散。

2. 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可要东北与大连苏联同志商量解决。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3. 我们曾要求在莫斯科办一中国大学，收学生一千人以下，为中国训练建设与管理人才，斯大林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4. 斯大林自己提出从外蒙库伦建筑铁路到张家口（因安得列夫在西柏坡时有人提出此议）问题，他说：这是好事，可以办。我们问：可否建立一条铁路由陕西经新疆到苏联？斯说：太长，不如先建立油管要便宜三倍。斯大林又说：你们如果有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其他植物油，我们都需要。并说：你们要扩大棉田，提高棉产，为此，你们要逐渐使用农业机器，才好提高棉产。

5. 斯大林说：可以帮我们在旅顺办一海军学校，并帮我们建立海防。斯大林又问我们，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我们前线帮我们拍照？他们在电影技术上可帮我们。我们答复可以，并说曾有一电影团到林彪司令部。斯说：因他们在那里搞得不好，我们撤回来了。我们说请再派去，可以把关系搞好。斯说：他们拍照影片的内容，可完全依照你们的意见办。

（三）关于国际形势，在我们提出问题后，斯大林答复如下：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主要一点，就是会不会爆发战争？从国际间的各种条件看，即从经济条件，从美国对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对战争尚未准备好）来看，现在与苏联进行战争，对帝国主义者是不利的，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说，目前不应该有战争。但历史上有冒险家，有精神失常的人，所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仍是有的。我们对此有准备。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不足，他们正在进行准备，他们并用原子弹来恐吓，但我们也在准备，我们比他们准备得更快些。

有的冒险家、精神失常的人宣传说：苏联军队要在美国登陆；另外一些人也就相信这种说法，所以可能产生冒险家的。例如美国的国防部长福来斯特尔，他虽然死去，也还可能产生这种人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除外的。

我们问：苏联与英美之间目前存在的各项重要问题是否可能获得妥协的解决？斯大林答复说：这是很难的。若干次要问题可能解决，而重要的问题则很难解决。待以后再看。

我们现在对反动派是进行着孤立他们的政策，用各种群众团结、各种会议，在各国、同样也在美国，进行揭露和宣传斗争，其作用很大，以后还要继续这样作。

今天美国政府及其政策，是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美国有些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人想与苏联搞好关系，但他们不当权。美国将来如有新的政府、新的政策，也许美苏关系可以改善的。

马歇尔计划已经破产，美国在德国的影响已缩小，自己污辱了自己，战争的可能性在那里已缩小。

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就打，他们使用原子弹，我们也使用原子弹。

美国人自己并不想打仗，总想用别人的手替他们打仗，他们也公开地这样说，但愿意替美国流血打仗的人并不多。

总之，我们既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周 恩 来

同志们：我们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了。刚才朱总司令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家在会议中还要讨论许多具体问题，我在这方面就不多说了。我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重心讲一讲。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革命还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的发展的形势当中！我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打到台湾去，打到海南岛去，打到昆明去，打到新疆去。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工会工作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主要地位。

* 这是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工作。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来管理就难得多。而且还要改革旧制度。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的，像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也应该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第二是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第三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拿棉花生产来说，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田都减产，因为有美棉的倾销。其他原料也是这样。所以城市解放以后，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

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还能转败为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无法克服。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过。东北去年全部解放，今年就计划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华北今年春天全部解放，明年就可以增产。接着，华东、华中、华南都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我们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农村破坏很少，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

些方面。

所以从全局来看，我们的事业是发展的。在局部，譬如上海，或者在某一方面，生产确实是减少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殖民地商业，外国货充斥的商业，是会少一些的，有些买卖是会关闭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我们的革命要彻底胜利，要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统统去掉，必然会遇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这样才能节省国家的经费，使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生产的東西，首先用到革命当中、战争当中去。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增加生产，克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困难。这是我们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对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个号召。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的一个号召。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个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就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不但工会的代表，而且我们革命的职员，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要来领导全国政权的建设工作。现在各个地方也正在建设地方的人民政权，工人阶级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过去，我们是从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把敌人的武器缴获过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总之，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而

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最后，讲一讲团结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团结：

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据说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万以上，如果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会达到一千万以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地方，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机构，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来参加领导和参加各种建设的组织。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我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起刚才所说的任务。

第二是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以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实现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机构就是工厂管理委员会。我

们的工厂一切管理人员，不要把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拿过来，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第三是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因为过去他们只有投机才能生存。今天应该把这个投机破坏性去掉，这就需要斗争；同时要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这样才能够团结他们。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解决各行各业的劳资问题，否则两方面的斗争就不能限制，弄不好罢工也可能发生，生产就要受到破坏。订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

第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

根据《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向全国进军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²⁾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

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
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
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
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
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
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
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
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
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
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
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
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
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
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
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
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
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
“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
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
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
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
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
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
美国政

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

锐地摆着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3〕。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

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

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在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

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

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个省。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曾将东北三省行政区划调整为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五个省，加上热河，统称为东北六省。一九五四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辽东省、辽西省合并改称辽宁省，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吉林省仍照旧。一九五五年撤销了热河省，原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 绥远，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傅作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一带。日本投降后，他奉命进攻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八月攻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宁、丰镇。九月初攻占兴和、尚义、武川、陶林、新堂、凉城，大举向察哈尔解放区进攻，迫近张家口。人民解放军起而自卫，将其击退，并俘虏其大批官兵。

〔3〕 “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毛 泽 东

甲、目前的形势：

(一) 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¹⁾。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

* 这是毛泽东为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一月八日由会议通过。一月六日和八日毛泽东曾在会议上两次发表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已包括在这个决议中。

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末，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們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三) 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

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四）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起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

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

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

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

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提出：“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后来因为军事形势发展迅速，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年歼敌计划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只半年即已完成并超过，达到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

〔2〕 马家，指国民党军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1〕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

*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七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湖南

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

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九、十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九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 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 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 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

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 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受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

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贺南京解放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两大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其他各野战军地方军及南方各游击部队全体同志们，全国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们：

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的统治，业已二十二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南京解放电

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三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覆亡，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诸名城，相继光复，国民党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八军，第九十九军全部，第二十一军大部，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六军各一部，被我聚歼于长江以南，常熟、苏州、长兴、广德、泾县、彭泽之线以北地区，并占领上述地区各县。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

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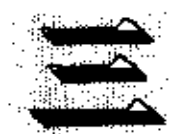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根据《朱德选集》刊印

筹备政协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刘仁同志：

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

(甲) 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

(乙) 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

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毛 泽 东
卯 感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沪局、港分局：

(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来〔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

(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

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纲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

（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

中 央
辰 东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发表三党联合声明问题 给李济深、沈钧儒⁽¹⁾的信*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 泽 东

五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李济深（一八八五——一九五九），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

毛泽东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问题复各民主党派与 民主人士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2〕}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章伯钧（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安徽桐城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叙伦（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王绍鏊（一八八八——一九七〇），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陈其尤（一八九二——一九七〇），广东海丰人，当时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彭泽民（一八七七——一九五六），广东四会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章达（一八九〇——一九五三），广东东莞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郭沫若（一八九

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为无党派人士,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2〕指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从香港发给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的电报。电报谴责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

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加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

—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 泽 东

周 恩 来

子皓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二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毛泽东邀请司徒美堂^{〔1〕}参加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注 释

〔1〕 司徒美堂（一八六八——一九五五），广东开平人，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一九四九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毛泽东邀请陈嘉庚^{〔1〕}参加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一九四九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朱德复李济深等 五十六人电^{〔1〕}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

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 泽 东

朱 德

二月二日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六人，是当时已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宋 庆 龄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 and 他们的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

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力量增强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根据《宋庆龄选集》上卷刊印

各民主党派联名祝贺中共二十八周年诞辰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

当此人民革命接近全国胜利的今天，欣逢贵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我们兴奋愉快的心情，简直非语言文字所能状其万一。

四万七千五百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而这一大事之快要完成，三百余万共产党员的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实为其最主要的因素。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終了，贵党之诞生，实为新中国出现的信号，中国人民为贵党之诞生而狂欢，正是理所当然。

我们充分相信，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之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贵党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 章伯钧
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

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
中国农工民主党	彭泽民
中国人民救国会	李章达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谭平山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蔡廷锴
中国致公党	陈其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及其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完全是适应世界思潮的正确发展与符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之客观要求的。他领导人民的力量，把满清专制政体推翻了，而他的思想与行动，仍一直不断的依据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向前进步，从不停滞。自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倡导三大政策以后，更确立了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性，奠定了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汇合于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之内，把中国革命联系于世界革命之中。他是要一次的彻底的摧毁国内封建与国际帝国主义两种势力，以结束中国数千年的旧历史，创造一个民族独立，国际合作，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现代化的新国家。中国国民党果能遵循他所指示的这一条康庄大道，继续前进，必然会缩短中国革命过程，早日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不幸，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

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于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这一反动政权之所以招致了今日这种政治腐烂，经济崩溃与军事惨败，实为其必然的结果。

由于中国国民党的被劫持，使中国社会仍逗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而且使全国人民的处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这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但，人民所受的痛苦愈深切，人民革命的要求也就愈强烈，以此，中国共产党壮大了，新民主主义产生了，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的本质没有变，人民革命的基本要求就不会变，毛泽东先生针对这一客观形势，倡导新民主主义，一面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一面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且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进步的路上去。这正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所以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如就革命过程分析，毛泽东先生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延续的发展与彻底的实施。

中国人民，在黑暗统治与长期战乱中，已经濒于死亡

的边缘，要求革命，也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被反动派破坏了以后，在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居于优势的时候，仍于本年一月接受反动政权的和平建议，这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人民要求和平的重视。因此，破坏和平的责任者，实是妄想保持反动力量的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他们在破坏和平以后，为了极少数人既得利益的保持，仍图作最后的垂死的挣扎，并不惜进一步的疯狂的倒行逆施置大多数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轰炸城市，封锁海港，滥发银元券及捕杀和平民主人士教授学生等种罪愆，无一不以人民为敌，尤其是蒋介石亲飞碧瑶^{〔1〕}、南韩，卑贱地自沦于殖民地的行列，妄想成立太平洋同盟，以求苟延残喘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下，更为可耻的罪行。

我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反动集团，曾经不断的予以抨击。而对于其最近不顾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与谴责！同时我们并愿郑重声明：自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劫持党权政权以后，一切反革命的责任，完全应由他们负担，与大多数被压迫被排挤的党员无关。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确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对于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党的新生。

我们深知道在各地，尤其是未解放区域内，一定有许多国民党同志具有这种同样的主张。我们希望大家一致起来蔚成普遍的共鸣，并参加这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

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鑑、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李荐廷、朱惠清、黄统、金绍先、高宗禹、陈汝丹、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杨德昭、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文汇报》刊印

注 释

〔1〕 碧瑶，菲律宾吕宋岛西部山城。

毛泽东邀请阿哈买提江^{〔1〕}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 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北平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阿哈买提江（一九一四——一九四九），新疆伊犁人。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的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赴北平参加新政协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

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

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

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么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

根据上项原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第五项之下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组成之。

- (1) 中国共产党；
-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3) 中国民主同盟；
- (4) 民主建国会；
- (5) 无党派民主人士；
- (6) 中国民主促进会；

- (7) 中国农工民主党；
- (8) 中国人民救国会；
-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 (11) 中国致公党；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
- (13) 中华全国总工会；
- (14) 解放区农民团体；
- (15) 产业界民主人士；
- (16) 文化界民主人士；
- (17) 民主教授；
- (18)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 (19)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 (20)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 (21)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22) 国内少数民族；
- (23)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第二条 前条各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筹备代表为四人至七人，其确定名额按各单位情况协商定之。各单位筹备代表之人选，由各本单位提出，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单位协商通过，其前条第五、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各单位之筹备代表，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其他各单位共同推定之。

第三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治协商

会议之一切筹备事宜，其中心任务为：

- (1) 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和代表；
- (2) 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时间、地点及议程；
- (3) 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
- (4) 制定共同纲领草案；
- (5) 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第四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各单位协商推举之。

常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由常务委员会选出，主持常务委员会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常务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进行工作，其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下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其组织及人选由秘书长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

第八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开会须有参加单位半数以上之出席。表决时，每单位不论其人数多少，均为一权。一般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执行，但对有关基本方针之决议，如第三条第三、第四和第五各款，经多数通过仍有不同意者，有保留至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重新提出、或不签名、或退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自由。

第九条 本条例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实施。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各位代表先生：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是经过参加筹备会的各单位协议起草的，这个草案现在正式向筹备会全体会议提出，请求通过。在讨论以前，需要说明以下意见：

这个条例共九条，其内容都是经过参加筹备会的各单位多次磋商和通电协商，以至最后在北平的几次会谈中协议的。

第一条里，需要说明几点：首先，去年开始协商组织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在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所提出的主张以后，开始陆续来到哈尔滨（首先是民盟、民革的几位，还有其他几位），从那时的情形看，打算开一个人数比较少的筹备会。因为当时战争情况与交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使大家统统

* 这是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来到解放区，所以当时协议的一切，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的。可是协议过程经过了六个月的发展，到许多单位从外边来到北平的时候，情况就大变了，到现在则更不同了。拿现在看去年九十月开始协议时的情况，那当然是大变了。所以，现在的组织条例与协议初期是有若干出入，而这种出入、这种改变，在今天看来是必须的。根据这样的情况，首先在第一条中的“宗旨”这一点上，就比协议初期写得更明确了。原来协议时是逐渐把它明确起来的。现在写在组织条例第一条首段头一句话上，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这个宗旨现在看来是很清楚的，因为凡是赞成、拥护和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统统是这样主张的，而这个主张在今天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上已经实现，参加筹备会的各单位也正在为这样的任务而努力着。所以把这个问题写在筹备会组织条例上，也就是说应该肯定下来。被邀请讲话的各位代表人物在讲话中也表示同意这个宗旨。毛主席在讲话中也指出了，直到今天任何一方面对这个宗旨都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这一点一定会被我们筹备会的各单位所同意的，而且也已经协议、同意了。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规定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无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所组成。简单地说就是由各党、各区（各个解放区）、各军（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各界、各团体赞成上述宗旨的代表人物参加组成。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现在我们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进行筹备工作。与此相联系，在筹备协商的过程当中，又确定跟这样的原则相反方面的人物是不能够参加的，这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参加。但在这里需要加一点解释，就是说直到今天毫不悔过、毫不改变、毫无立功表现的分子，当然是不能够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可是里面也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确实有过去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做工作的，而且反动行动还很不少，但现在悔悟了，立功了，那么这种人就要看他立功的大小、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在筹备会预备会中也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筹备会上要协商对某些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过来的，曾经有过反动行为，而现在已悔悟过来、为人民立了功的这种人物，今天已经不是反动分子了，而是转向爱国方面，成为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士了，这应该考虑邀请其中适当的代表性人物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这一意见有待于筹备会考虑。

那时根据协议原则进行筹备，而参加筹备工作的单位，协商的结果是二十三个。这二十三个单位的数目，还是许

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哈尔滨的时候商定的。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当时我们确定：筹备会由提出“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这是有团体、有组织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当时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的。根据这样的情形，我现在分类说明一下，因为这一点在筹备会代表中也还有不完全清楚的。

比如说第一类。中共中央在去年“五一”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在香港有十个单位（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就通电响应，在海外华侨有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华侨团体响应，在上海、北平也有通过我们地下工作关系表示赞成的。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凡是响应过的团体，都应该邀请，赞成这个主张的每个团体、组织、民主人士也要邀请，方针就是这样。但是进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有的团体在某种情况下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没有邀请。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平许德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同志进行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另外一个就是南方民主革命同盟，也就是“小民革”。这个组织是在国民党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成立的，由王昆仑、许宝驹诸先生领导。那时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甚至于在

伪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我们期待他们继续在那里起作用。很清楚，今天在筹备会议上，乃至向全国人民都可以公开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要推翻反动统治，当然应该在这个统治中进行破坏。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以后。在这以前它进行的工作呢？那时是尽量争取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士团结在抗日战争中。这个团体在这两个时期中，工作有所不同：在抗战时期，是努力促进国内团结；内战起来以后，就是进行分化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打击那些反动的。它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所以，当战争形势还不像今天这种情况时，我们期待这两个团体进行秘密工作，没有作为单位邀请他们。已经来到解放区的这两个团体的人士，当时是参加其他组织，并没有用这两个团体的名义出现。举这两个例子，说明在筹备会议中也还有没有被邀请到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二十三个单位已经协商很久了，又考虑到这两个团体——九三学社、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先生等也都参加了其他单位，所以这两个单位在筹备会议中就不再邀请了，留待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再来邀请。这当然还要同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当时协商，九三学社打算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而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本身也打算改建为学术团体（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会），这就可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组织了。

除去各党派以外，就是各团体。过去有的团体尚在筹

备过程中，现在由筹备会变成了正式组织，如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所以现在由联合会本身推选出筹备代表。也有许多单位没有形成组织，则由参加筹备会的有组织的各单位协议共同推选代表，这样组成了这二十三个单位。在这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当中，从名单上看，解放区的代表很少，因为解放区除去有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外，其他的就分配在工、农、青、妇、学、少数民族中了，这方面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当时有的方面提议：是不是解放区的代表再多一点？后来觉得筹备会的工作与正式的协商会议不同，筹备会可以让未解放的地区的民主人士多来参加，因为当时设想还有大块土地没有解放，还有国统区这个名词。但是不到一年，情况完全变了，许多民主人士过去是从国统区来的，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新解放区，只能说它是前国统区了。我们认为还是根据原协议为好，广大解放区的代表留待正式协商会议再参加。

第二条，人数和推选问题。代表人数，本来协商是一个单位一人至四人，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人士、各党派代表来到解放区的很多了，觉得有扩大的必要，所以最后又协商为四人至七人。这就是现在参加筹备会各单位的情况。

至于代表的推选，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各单位，由它自己推选出代表，然后经过各单位代表预备会议通过；另一类是没有组织的，如同组织条例第一条上所说的：（5）无党派民主人士，（15）产业界民主人士，（16）文化

界民主人士，(17) 民主教授，(22) 国内少数民族，(23)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这六个单位还没有组成团体，其代表就由有组织的各单位在预备会中推定出来，经过大家通过。现在筹备会中二十三个单位一百三十四位代表，都是经过参加筹备会的二十三个单位协议通过的。

第三条，筹备会的任务。草案规定了五项：

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协议出参加正式会议的各单位和代表人数。这件事情需要马上进行，否则就无法进行各团体代表的推选。各单位、各区域的代表，还有一部分要共同推选。所以这一项工作成为筹备会议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第二项任务，就是决定时间、地点、议程。在时间上，原来在协议过程中是准备早一点开筹备会，但因为各位代表纷纷来到北平，而且南方交通也逐渐打通，还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可以来，所以就等待着。同时，这中间一度经过了跟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又经过解放大军渡江南进，使我们的工作推迟了一点。现在筹备会已经成立了、开幕了。在预备会中协商结果，要在六七两月完成筹备工作，以便在八九两月召开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提议也是筹备会全体会议需要加以考虑的。

地点，当时在香港的少数民主人士，觉得筹备会只能在哈尔滨，希望正式协商会议在华北的某一个地方召开。当时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希望最好能在北平开。这个希望已在事实上给我们实现了，不仅正式会议在北平开，而且我们的筹备会也在北平开了。

议程，可以等待筹备进行完毕，再去规定正式协商会议议程。

第三项任务，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这要在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代表人数确定后才可以进行起草。

第四项任务，起草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是在民主党派响应去年“五一”口号以后就提到了的。因为我们彼此都认为，有一个共同纲领才便于我们共同奋斗。这不仅是民主党派，乃至各界、各团体、民主人士也同样赞成的。这个任务成为我们筹备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六七两月份一个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也曾经起草过这样的草案，但由于情形变了，使得草案在起稿时就要改变。在哈尔滨，许多民主党派代表曾经试着起草过一两次，因当时还正在进行猛烈的战争，我们觉得应该把革命战争气氛加重，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援战争。可是现在情形有很大不同了，战争虽然还要打一个时期才能完结，但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战争没有了，因为敌人的斗志、抵抗力弱了，上海战役就是证明。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纲领的起草，也不能不加重这方面的气氛，制定出这方面的方针。当然，为了达到建设的要求，肃清明的暗的反动残余势力还是要成为我们总的任务之一，这也是纲领中需要表现的，也是昨天开幕会上许多位讲过的。

第五项任务，政府方案问题。因为要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我们需要在筹备会中起草成立政府的方案，甚至要协商政府的人选，以便在正式会议中提出通过，这也是这次筹备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除此五项之外，当然还有其他任务，不过不是最中心的，所以没有写上。例如，要规定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国歌。现在只是有一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之军旗，这已送达各民主党派看了，也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更主要的是我们政府产生了，必须有我们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及国歌。像这样的方案，也要在筹备会上草拟。

第四条，筹备会组织本身问题。关于常务委员人数，在两次预备会中协议为二十一人。这是今天会议议程上第二项要讨论的。

第五条，秘书长一人以外，副秘书长是各单位单独或者联合推出，这在两次预备会中也有协议，李维汉同志担任筹备会的秘书长，各单位协商推定了九位副秘书长。这九人可以说是由各个方面、各个单位或者单独或者联合推选出来的。这样多的秘书长，说明我们各方团结的力量，这在组织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也说明我们力量之雄伟，人才之集中。

第六条，秘书长、副秘书长之下的几个处，将来要在常务委员会通过。

第七条，筹备中要根据任务成立各种小组。这在常务委员会产生以后就进行组织。首先要进行工作的，就是参

加正式会议之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除小组外，在协议中曾设想在筹备会中设立专门委员会，现在已有了小组，好像不再需要专门委员会了。但是，与筹备会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种工作，就是为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这以前曾经在邀集各党派、各团体代表人物座谈时说过，在分别座谈时也说过，就是要成立各种委员会，目前放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进行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人民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工作的准备。这就是：财经委员会、人民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会、法律委员会（也有朋友提出改成政法委员会）。这些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原来在协议中所设想的专门委员会。过去商量的一些方案仅仅是设想，而今天随着形势的发展，已变成了这样的情形：需要我们开展实际工作，决定政策、方针，进行工作指导。

第八条，是表现我们组织之民主精神的一件事——表决问题。在准备会中协议，筹备会中以单位来表决，不论人数多少，每个单位有一权。另一点，虽然多数通过了，假若有少数人不同意，我们给他组织上的自由权利：或保留意见，等下次会议时重新提出，或发表时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

第九条，章程实施的手续问题。

这九条规定，组成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组织条例。重要的几点已经解释过了，现在根据两次预备会协议的草案，正式向全体会议提出，请求讨论通过。

对第八条的补充发言

关于第八条表决问题，因为开始的时候秘书长报告了，我就没有多解释，这也是个缺点。凡是我們争论的问题，都应该把它弄明白，我们的民主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在这个全体会议上，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把意见一说，报告人就有责任继续补充说明。

关于表决权的问题，我们开始在哈尔滨和华北彼此通电磋商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感觉这一次是大家共同筹备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应以单位为标准来协议。因为开始就有许多有组织的单位，如党派、团体，因此我们就有这样的认识：既然是各单位共同筹备，那么表决时就应当以单位为标准，就是每个单位一权，不管参加的人数多寡，这样才利于共同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至于各单位的代表人数多与少，这是根据各单位的互相协商决议的。许多单位的代表人物来到解放区，我们感觉应该邀请他们参加筹备委员会，所以许多单位的代表人数就比原来协议的一至四人增加了，但是不可能把人数搞得太大，跟将来政治协商会议一样，那也不好。所以要有一个比正式会议代表少一点的数目，就扩大到七人为止。另一个道理就是刚才已经说过的，虽然解放区有这么多的地方政权，但是在筹备会中我们没叫他们参加，将来在正式会议的时候他们会参加的。这次负责筹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

放军这两个单位，此外只有工、农、青、妇、学及少数民族，这里边有解放区代表参加，尽量容纳各地方来的民主代表、民主人士。这样，各单位的代表人数就有些不齐，也不可能齐，就是将来正式会议的时候也不可能齐。因为团体有大有小，人数有多有少，由此就产生进行表决时的方式问题。刚才秘书长也说了，这是各单位在预备会上已经协议了的，既然每一个单位一个表决权，总要有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就是以每个单位的第一名代表或第二名代表来表决。他们没有出席的时候，由那个单位自己选出一位代行表决的人，表示赞成或反对。这是一般的表决形式。我感觉，除这个一般的形式外，在执行的时候还可以补充个办法，这看来好像复杂一点，但这正是新民主的精神。刚才在会场上有几位代表提的意见，现在把它归纳一下，有这么几点：

既然是每一个单位一个表决权，那么有组织的好办，没有组织的六个单位怎么办呢？我认为这六个单位（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产业界的民主人士、华侨、少数民族、民主教授）既然被邀请，就有一个固定的代表人数，这就已经形成了临时性的单位，并且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宗旨。同时，每一个议案事先都经过酝酿，这是特别值得说明的。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

新民主的精神。这一次组织条例各单位事先都看过，都商量过，每个单位都可以讨论，都有讨论的时间，过去没有组织的现在形成了单位，依然可以讨论。讨论过程中，当然会发生少数与多数不同的结果。不仅过去没有组织现在形成单位的有少数与多数，每个党派、每个团体讨论中也有少数与多数，但是总是取决于多数。执行表决的第一名代表，或被指定的代表，他总是代表多数的意见，那么少数就要服从多数。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单位是相同的数目，表决的结果是三比三，这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有的，一般总会商得妥协的。新民主还有一个特点，即除非是最原则的问题争论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新民主的这一原则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原则性的问题必须坚持。所以这上面规定的组织问题、纲领问题、政府问题，可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或不签字，或退出。但是一般的可以取得共同协议，每个单位也可以取得这样的协议。纵使是得到相等的数目，每个单位第一名代表，总是有更多的权利，由他来取决，看第一名代表站在哪一边。如果那个单位是同等的人数互相坚持，他们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还可以在会场提出。这不限于组织、纲领和政府三项，还有其他方面，凡他们认为很有原则性的，也可以提出来。这是关于以第一名代表起立表决，各团体怎样取得一致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总要在事前协商。比如组织条例就是如此，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到哈尔滨和华北以后，我们就曾函电来

往，中共方面还曾委托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两同志同到东北的诸位代表磋商。当时的组织条例大致与现在相同，只是某些具体方面的人数有些增加。到北平以后，又个别谈。最近准备开筹备会以前又两度分别和各单位酝酿了一下，在预备会上也通过了。都是事前尽量酝酿。

第二点，执行表决的时候，既然是代表都同意，那么是不是会场上就可以只说相同的意见，或者只是首席代表起立发言？我觉得不需要这样规定，因为这样倒使我们的民主范围不广。尽管在本团体得到协议，但到了开全体会的时候，还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这使我们的会场在讨论中更和谐，更知道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和谐一致不是大家都说一种相同的话，而是大家说出不同的话，然后取得一致。这是最有力的一致，是最有力的团结。比如组织条例的协议大家都同意，但是在会场上还可以提出文字上的意见，如某一个问题的增加、修改，这不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刚才会场上也表现了这个精神，比如有些同志提出了意见，后来觉得不通又取消了；中共方面也是这样，觉得大家有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应该补充提出来。这样，才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听到，帮助大家考虑问题，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妥切，更加恰当。所以尽管是大家协商一致，但是每一个单位有不同的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大家听一听。我觉得应该允许在会场上尽量提出各种意见。

第三点，表决方式的使用上也可以采取几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每一个单位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起立表示同意

或不同意，这样为好，容易检查。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就是：已经协议过了，没有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为了更隆重起见，主席也可以采取全体起立的方式表决，表示这一个问题大家都赞成。这两种方式是我们在预备会中谈的，合适不合适大家还可以研究。至于一般技术问题，大家依照一般规定，在表决的时候这样进行：首先问不同意的，从反的方面表决；假使没有不同意的，再问同意的；最后再问怀疑的。或者首先就问，同意不同意，怀疑不怀疑。这样，就可以把各单位的意见弄得更清楚，记录得更清楚。但是我想，我们的新民主有的时候也不需要那样的形式，那样的机械。刚才胡乔木同志就争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二十三个单位没有严重的不同意见，那么表决的时候就不一定再问反面的意见，先从同意去问。这样二十三个单位都起立，都同意，就记下来；或者仅是问第二项或第三项——不同意的、怀疑的，减少一点言语，这也未尝不可。假使起立的只有二十个单位，或者十九个单位，那就必须要问第二项——反对的。假使剩下的那几个单位还没有都起立，也许不起立，这样的话，那当然要问第三项——怀疑的有几个单位。这都是必要的形式。我们总是在本质上解决问题。二十三个单位都起立，就不必问第二项；如果没有完全起立，就必须问第二项。这是一个表决的形式，应该说清楚。

关于分开或合起来表决的问题，就是刚才表决组织条例的问题，主席提议采取全体起立的办法就很清楚，因为

事前协议的时候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讨论每一条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隆重的起立表决，我认为这个办法也是可以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讨论每一条时，每一个单位的首席代表起立，这当然更清楚一点。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采取。这就关联到第八条本身的问题。现在主席把第八条提前讨论，因为在讨论中联系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需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些。凡有不明确或不清楚的地方，只有经过讨论才能弄得更清楚，解决得更好。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是个筹备会，所以是以各单位为表决的标准。每一个单位一个表决权。将来新政协全体会议人数更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更广，那么，那个时候的表决标准还要考虑。

根据《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刊印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 各单位代表名单

(一九四九年六月)

(一) 中国共产党 (七人)

- 一、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二、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三、林伯渠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四、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五、陈 云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六、薄一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 七、李维汉 中国共产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七人)

- 一、李济深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 二、何香凝 (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 三、李德全 (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 四、张 文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委员

- 五、李锡九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
委员
- 六、陈劭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委员
- 七、梅龚彬 (因病未能出席, 由吕集义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代理秘书长

(三) 中国民主同盟 (七人)

- 一、沈钧儒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中央常务委员
- 二、章伯钧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中央常务委员
- 三、张 澜 (未到平前由刘王立明(女)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主席
- 四、张东荪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 五、周新民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 六、罗隆基 (未到平前由辛志超代)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 七、楚图南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四) 民主建国会 (五人)

- 一、黄炎培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 二、章乃器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 三、胡厥文 (未到平前由阎宝航代)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 四、施复亮 (未到平前由孙起孟代) 民主建国会常务

理事

五、胡子婴（女）民主建国会理事

（五）无党派民主人士（六人）

一、郭沫若 作家，历史学家

二、马寅初 经济学家

三、李 达 社会科学家

四、林砺儒 教育家

五、符定一 中国文字学家

六、吴耀宗 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

（六）中国民主促进会（四人）

一、马叙伦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会理事

二、王绍鏊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会理事

三、许广平（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会理事

四、林汉达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前理事会理事

（七）中国农工民主党（五人）

一、彭泽民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二、丘 哲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季 方（未到平前由严信民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韩兆鹗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五、郭冠杰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八）中国人民救国会（五人）

一、史 良（女）（未到平前由张曼筠（女）代）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

二、李章达（未到平前由千家驹代）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

三、胡愈之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

四、沈志远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

五、曹孟君（女）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

（九）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五人）

一、谭平山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陈铭枢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郭春涛（未到平前由吴茂孙代）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四、王昆仑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许宝驹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十）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四人）

一、蔡廷锴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

二、蒋光鼐（未到平前由秦元邦代）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三、陈此生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

四、李民欣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

（十一）中国致公党（四人）

一、陈其尤 中国致公党主席

二、黄鼎臣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官文森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雷荣珂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十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七人)

一、朱 德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二、彭德怀 (未到平前由罗瑞卿代)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

三、林 彪 (未到平前由吕正操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四、刘伯承 (未到平前由滕代远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五、陈 毅 (未到平前由李涛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六、聂荣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

七、叶剑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十三)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七人)

一、李立三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

二、朱学范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

三、刘长胜 (未到平前由李颀伯代)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四、许之桢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陈少敏 (女)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
六、易礼容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七、丘 金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 (十四) 解放区农民团体 (七人)
- 一、刘玉厚 西北解放区农民代表
二、石振明 太岳解放区农民代表
三、朱富胜 山东解放区农民代表
四、杨耕田 察哈尔解放区农民代表
五、张振铎 东北解放区农民代表
六、李秀贞 (女) (未到平前由康克清 (女) 代) 冀鲁豫解放区农民代表
七、张 晔 渤海解放区农民代表
- (十五) 产业界民主人士 (七人)
- 一、陈叔通 商务印书馆董事
二、盛丕华 上海上元企业公司经理
三、李烛尘 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四、包达三 上海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
五、张纲伯 上海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六、俞寰澄 (未到平前由鄞云鹤 (女) 代) 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
七、吴羹梅 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
- (十六) 文化界民主人士 (七人)
- 一、沈雁冰 作家

- 二、叶圣陶 作家
- 三、郑振铎 作家
- 四、侯外庐 历史学家
- 五、曾昭抡 科学家
- 六、欧阳予倩 戏剧家
- 七、田 汉 戏剧家

(十七) 民主教授 (七人)

- 一、张奚若 清华大学教授
- 二、邓初民 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 三、许德珩 北京大学教授
- 四、翦伯赞 燕京大学教授
- 五、梁 希 中央大学教授
- 六、张志让 复旦大学教授
- 七、洪 深 厦门大学教授

(十八)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六人)

- 一、廖承志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
- 二、冯文彬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三、谢雪红 (女)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席
- 四、胡乔木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五、吴 晗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秘书长
- 六、钱三强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席

(十九)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六人)

- 一、蔡 畅 (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
- 二、邓颖超 (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 三、张琴秋 (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四、沈兹九 (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五、李文宜 (女)(因病未能出席由杨蕴玉(女)代)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六、邓裕志 (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十)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四人)

- 一、谢邦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 二、黄振声 (未到平前由黄鹤楨代)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国外部部长)
- 三、聂维庆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 四、李秀珍 (女)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二十一)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四人)

- 一、周建人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理事
- 二、汤桂芬 (女)(未到平前由雷洁琼(女)代)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理事
- 三、陈震中 (未到平前由葛志成代)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理事
- 四、罗叔章 (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

(二十二) 国内少数民族 (六人)

一、乌兰夫 (云泽) (未到平前由奎璧代)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二、回回民族代表 (因事未能出席由杨静仁代)

三、张冲 (彝族代表)

四、天宝 (藏族代表)

五、朱早观 (苗族代表)

六、朱德海 (东北朝鲜民族代表)

(二十三)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七人)

一、陈嘉庚 (南洋华侨民主人士)

二、司徒美堂 (美洲华侨民主人士)

三、陈其瑗 (美国华侨民主人士)

四、戴子良 (马来亚华侨民主人士)

五、费振东 (印尼华侨民主人士)

六、暹罗华侨民主人士 (因事未能出席)

七、庄明理 (马来亚华侨民主人士)

各单位四人者：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致公党。

五个单位共二十人

各单位五人者：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四个单位共二十人

各单位六人者：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民主青年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

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内少数民族。

四个单位共二十四人

每单位七人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产业，文化，教授，华侨。

十个单位共七十人

以上二十三个单位共一百三十四人。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定为下列四十五个单位，代表总额五百一十名。

(甲) 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

1. 中国共产党十六人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十六人
3. 中国民主同盟十六人
4. 民主建国会十二人
5. 无党派民主人士十人
6. 中国民主促进会八人
7. 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人
8. 中国人民救国会十人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十人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八人
11. 中国致公党六人
12. 九三学社五人
13.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五人

14.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十人

(乙) 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

1. 西北解放区十五人
2. 华北解放区十五人
3. 华东解放区十五人
4. 东北解放区十五人
5. 华中解放区十五人
6. 华南解放区八人
7. 内蒙古自治区六人
8. 北平天津两直属市六人
9. 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七人

(丙) 军队代表六十人：

1. 人民解放军总部(包含直属兵团及海、空军)十二人
2.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人
3.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人
4.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人
5.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人
6. 华南人民解放军八人

(丁) 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人
2. 各解放区农民团体十六人
3.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十五人
4.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十二人
5.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九人

6. 全国工商界十五人
7. 上海各人民团体九人
8.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十五人
9. 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推举十五人
10. 全国教育界十五人
11. 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十五人
12.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推举十二人
13. 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十人
14. 国内少数民族十人
15.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十五人
16. 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

二、前条所列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十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二人，不满十人者，得推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三、除第一条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

四、各单位代表名单除因特殊情形、经常务委员会同意者外，须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五、本规定之实施办法，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朱 德

今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了。经过这个筹备会的工作,将要产生一个真正民主团结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经过这个会议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的历史,从此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感到万分地兴奋和愉快!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今天开幕,因为现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在这些条件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自四月二十一日我军渡江以来,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芜湖、南昌、九江、武昌、汉口等大城市,解放了江苏安徽全省,湖北浙江的大部,江西福建的一部。在其他战场上,我军解放了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西安、青岛等地。残余的敌人现在虽然还在继续勾结帝国主义企图继续挣扎,但是他们的最后全部消灭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并不是革命者特别喜欢枪杆子，因为不拿起枪杆子，革命的力量就不能生存。这种血的教训使中国的革命者——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拿枪杆子的重要。二十余年来，中国人民正由于有了自己的人民解放军，所以帝国主义与反动统治者虽然勾结起来时时刻刻想尽方法要扑杀革命力量，终于不能达到目的。到了今天人民革命战争终于获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着全国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一点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这一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也遭受过不少的挫折与失败。但是它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它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下，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夺取了敌人的装备而装备了自己。今天，这一支人民武装是空前的壮大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这一支人民武装，所以如此壮大，如此英勇善战，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完全与人民相结合的。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它完全懂得是为谁而战。它是在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下而进行战斗的。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而在现在它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全国人民民主政权即将建立，人民解放军将为这个人民的政府

的坚定不移的柱石。当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之日，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预祝筹备会的成功，预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迅速召开，预祝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预祝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出现于世界。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董 必 武

一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那时看胜利形势的发展，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所以当时想象的新政协是小规模的，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成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平津及其他各地，陆续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解放区的人更多了。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有二十三个单位参加，代表一百三十四人，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筹备会已通过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

* 这是董必武对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的讲话。

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的，计有四十五个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学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中的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各种宗教的代表等；此外还有特别邀请的代表。计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四十五个单位共出代表五百一十人。筹备会并且决定十个代表以上的单位有两个候补代表，十个代表以下的单位有一个候补代表。前者计三十三三个单位，后者十二个单位，这样又增加了七十多人列席会议。特别邀请的代表，尚未最后确定，大体估计，当不会超过七十人。如此计算，新政协代表将在六百人以上，七百人以内。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具有某一方面代表性的人物都可以包罗在内，代表数目是很庞大的；质量也是相当整齐的。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由本单位提出后，还要在筹备会中由大家协商。大体上讲质量是好的。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会议，并且有执行机构和日常办

事的机构；所以它的组织法草案中规定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时，设立全国委员会；主持经常会务的是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在地方视需要经过协商也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

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中国新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八段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

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段又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

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里把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说得清清楚楚。我引证以上的文件，就是想说明现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的中央已把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规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末，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

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

在革命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

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

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对于一切民主人士是要有原则地有步骤地去争取他们。所谓原则，目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凡赞成这三反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所谓有步骤，丝毫不是丧失革命立场，而是把我们革命观点中最基本的及最一般的原则提出来，凡同意这种原则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像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开始时固然有些麻烦，不痛快。但干革命事业有时干得很痛快，也有时干得不很痛快。革命不一定是为了干得痛快，只要能达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目的便好。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发出以后，赞成这个号召的各党派，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随着军事的胜利，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各党派都承

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于他们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件，我军迅速渡江，在沪、港抱和平幻想的人也都觉悟了。毛主席“七一”文告发表后，他们对英美和对苏联的认识都和以前不同了。美帝国主义“白皮书”发表之后，各党派、各民主人士都表明态度，说自己与美帝国主义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无关。现在我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公开提出反对的意见。从旧的、因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到接受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即使是个别的观点，也等于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因此争取团结是要有步骤的。对于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要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以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为人民事业立过功的人位置还会比我们高些；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特别受优待。如以前发表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文件，有我党和其他党派列名；而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署名为首，其后列各民主党派领袖的名字。难道说我党中央书记处各书记同志的声望地位比不上其他党派领袖吗？毫无疑问是比得上的。但他们没有列名。又如这次政协会议代表，我党许多领导同志没有提名参加，因政协规定代表一定要出席，而许多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出席也就不能提名；还有更多的同志可以当代表，因为代表名额的限制和工作关系没有提名作代表；有些同志出在某一单位可以当代表，而出在另一单位，却只能当候补代表；在党内，还有些同志的革命资历不深，因所属单位（如人民团体）不同，需

要他当代表，而资历较深不属于那种单位的却不能当代表。这些事例，如果不从整个革命形势来看，单从个人资格地位出发去看，那是想不通的。又如许多民主人士被招待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有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特别受优待，住较漂亮的房子，吃特灶，我们许多同志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住的吃的都很蹩脚。这事例一样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

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像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说这样话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无条件的。不讲条件而担负革命的任务，革命才是光荣，不革命自然没有那种光荣，反革命更是光荣的反面，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罪恶。早革命则早享受光荣的称号，迟革命则享受光荣的称号也就因之而迟。革命胜利之前有困难，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说绝对没有困难。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把革命的光荣降低到与不革命，甚至与反革命相比，这样错误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单纯计较地位和享受，这是把革命的观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要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生活的提高，一般说要在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才能达到。如果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

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障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

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争，很快便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还不是彻底的胜利，还需要巩固这个胜利。我军所到达的大城市，明显的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势力至少也得要三年至五年，才能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已做到了。三反的任务，仅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宣告结束，所以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对于民主人士必须给以适当的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来直接参加革命，就减弱了革命阵营的势力。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就经济建设方面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私人资本主义占国

民经济的比重还要小，但它有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伴随着，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间断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虽不强大，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在现时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做社会革命工作，决不能拿一个生活标准的简单模型去衡量。合乎我们模型的才要，不合的便不要，尺度应该放宽些。也不能说我们和民主人士分开工作，各搞一套。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坚定的方针。不争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了党的方针。

今天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经过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都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领导而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的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 对于反革命分子投入革命阵营的态度

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

们是欢迎的。今天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明天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争取这些人便能减少革命的阻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把反革命集团孤立到最小的一点，因而更便于肃清它。

从阶级感情出发，对反革命分子屠杀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完全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反革命立场的时候（这当然要有具体事实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是我们花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我们除批判他过去的错误以外，就要进而团结他们，才是符合于革命利益和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一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然好些问题便想不通。有些过去屠杀很多人的反革命者，今天他悔悟了，他愿意参加到革命阵营里来，已经为人民立了功，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又如傅作义先生、程潜先生等，都和我们打过大仗，这当然不好。但北平和长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他们立了功，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干，他们这样干了；这些人可能在今后的政府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我们便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因为他们今天参加革命的光荣，就涂掉他们过去反革命的事实，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应当和对待一直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有基本的区别。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的分子就要严厉。

四 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团结民主人士，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但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是一定有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表现在政治主张上、生活习惯上、工作作风上及思想意识上。因此，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不只是一定要团结，而且要有批评有斗争，才团结得更好。

分析一下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哪些距离是可以接近，哪些距离是不容易接近的呢？

政治上的距离，是较易接近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他们也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他们也时有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对他们是压迫的，只要他们愿意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首先要争取这一点；这一点不能接近，便不能合作。工作作风的接近，就要慢些。生活习惯方面某种程度的接近并非全无可能，同样要慢慢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有些要更慢，有些简直不可能。本来政治主张也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意识是更广泛，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等等在内，这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不同，产生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求得和他们相同，在另一问题或另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有分歧。有些问题甚至

他们毕生也不能和我们一致的，这倒不必勉强要求一致。认识了这些距离，我们在团结他们时，对他们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批评与斗争才能推进团结，才能使团结巩固起来。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我党同志适当灵活地运用，无论如何，不能把党内斗争方式拿来呆板地应用。我们和民主人士阶级立场根本上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一定时期政治上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在政权机构中，既要与许多民主人士合作，就应该有适当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如在上面领导，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在政协筹备会以前，我们和民主人士谈了许多问题，如对中间路线及土改问题等；经过详细的三番五次的解释以后，他们大体上赞同我们的意见了。其中可能还有个别人士对个别问题不很了然和释然，抱沉默的态度；一般的总算解决了。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这样做工作是相当麻烦的，但是革命就要不怕麻烦。我们对于同级的人，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

对于民主人士，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改造他们，不要着急。要诚恳坦白，谨慎谦虚。出发点是团结，最终的目的也是团结。是否有团结不了的人？个别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用了一切团结的方法，还团结不了他，那他也就慢慢地孤立起来了。他孤立了还不觉悟，那就只好由他去了。

五 党内团结

华北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从过去的经验，我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党员首先要团结，才能做到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过去我们政府工作中党员间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的，特别是负一部门领导责任的党员间有些不团结的现象。这种不团结并不是因为有原则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工作作风的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作风趋于一致呢？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工作作风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好的作风只要大家指出来，谁也不会去维护它；好的作风谁也不能说不好，我

们共产党员是服从真理的。问题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开会来谈，不要背后随便讲，而开会时不讲，或是阳奉阴违，都是不好的。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态度问题，同志中间相互批评，不应把态度问题当成为原则问题，因为甲说乙的态度不好，乙也可说甲的态度不好，互相间在党内研讨一下，彼此改正就是了。但态度问题有时是原则问题，例如领导工作者态度不好，以致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或在群众工作上，影响了与群众的联系，这样态度问题便成为原则问题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只有党内团结，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各部门同志要很好地检查党内团结问题。

根据《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

(一九四九年九月)

(甲) 党派代表

(十四单位，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二人，
候补代表二十三人)

一、中国共产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林伯渠 董必武
陈 云 彭 真 郑位三 王稼祥 陆定一
吴玉章 徐特立 刘澜涛 李维汉 (罗迈)
李克农 安子文 候补代表：
邢西萍 (徐冰) 齐燕铭

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李济深 何香凝 (女) 柳亚子
李德全 (女) 张 文 李锡九 陈劭先
朱蕴山 梅龚彬 余心清 王葆真 杨 杰

李任仁 刘积学 陈汝棠 赖亚力
候补代表： 吕集义 郑坤廉（女）

三、中国民主同盟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张 澜 沈钧儒 章伯钧 张东荪 罗隆基
史 良（女） 周新民 楚图南 丘 哲
周鲸文 费孝通 李相符 李文宜（女）
胡愈之 辛志超 刘王立明（女）
候补代表： 叶笃义 罗子为

四、民主建国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

黄炎培 章乃器 胡厥文 施复亮
胡子婴（女） 孙起孟 陈巳生 章元善
盛康年 冷 遹 杨卫玉 沈子槎
候补代表： 陈维稷 莫艺昌

五、无党派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郭沫若 马寅初 张奚若 李 达
董鲁安（于力） 符定一 欧阳予倩
洪 深 吴有训 王之相
候补代表： 丁燮林 周谷城

六、中国民主促进会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

马叙伦 许广平（女） 周建人 王绍鏊

梅达君 徐伯昕 林汉达 雷洁琼（女）

候补代表： 严景耀

七、中国农工民主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彭泽民 郭冠杰 李士豪

何世琨（何文朴） 杨逸棠（杨伯恺） 张云川

郭则沉 王深林 严信民 杨子恒

候补代表： 王一帆 李健生（女）

八、中国人民救国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李章达 沙千里 沈志远 千家驹 萨空了

曹孟君（女） 闵刚侯 方与严 宋云彬

孙晓村 候补代表： 秦柳方

张曼筠（女）

九、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内缺一名）

谭平山 陈铭枢 郭春涛 王昆仑 许宝驹

吴茂荪 萧隽英 李世璋 谭惕吾（女）

候补代表： 于振瀛 田竺僧

十、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

蔡廷锴 蒋光鼐 陈此生 李民欣 秦元邦

林一元 谭冬菁 司马文森

候补代表： 李子诵

十一、中国致公党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内缺二名)

陈其尤 陈演生 黄鼎臣 雷荣珂 严希纯

十二、九三学社

(正式代表五人，候补代表一人)

许德珩 黎锦熙 袁翰青 吴藻溪 薛 愚

候补代表： 叶丁易

十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正式代表五人，候补代表一人)

谢雪红(女) 杨克煌 李伟光 王天强

田富达 候补代表： 林铿生

十四、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冯文彬 蒋南翔 胡耀邦 宋一平 陆 平

王治周 张 本(女) 杨 述

高景芝(女) 王明远 候补代表：

许世平 张 凡

(乙) 区域代表

(九单位，正式代表一百零二人，候补代表十四人)

十五、西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马明方 王维舟 杨明轩 武新宇 李景膺

范子文 马健翎 杜延庆 张子芳（女）
王德彪 成柏仁 韩兆鹗 苏资琛 李象九
杨拯民 候补代表： 房文礼 金山寿

十六、华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薄一波 杨秀峰 宋劭文 朱良材 蓝公武
林 铁 赖若愚 张 苏 高克林 潘复生
唐延杰 邢肇棠 薛 迅（女） 沙可夫
周叔弢 候补代表： 刘少白 甄荣典

十七、华东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陈 毅 许世友 周 兴 管文蔚 梁从学
孙仲德 沈端先（夏衍） 沙文汉（张登）
龙 跃 张 林 韦 恂 李坚真（女）
张福林 季 方 李伯龙 候补代表：
计雨亭 刘民生

十八、东北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高 岗 高崇民 李运昌 周保中 汪金祥
周 桓 何长工 车向忱 张维桢 邹大鹏
于毅夫 吕 骥 杨克冰（女） 李 荒
李国钧 候补代表： 张德馨 赵文全

十九、华中解放区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黄克诚 刘子久 吴芝圃 邵式平 陈再道
潘梓年 谭余保 郑绍文 蔡书彬
夏之栩 (女) 罗厚福 陈经畲 嵇文甫
杨显东 张仲鲁 候补代表： 陈荒煤
王一鸣

二〇、华南解放区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

连贯 刘达潮 区梦觉 (女)
乔冠华 (乔木) 李伯球 欧阳山 王雨亭
李独清 候补代表： 廖梦醒 (女)

二一、内蒙古自治区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

乌兰夫 (云泽) 王悦丰 刘春
那木济色楞 (王再天) 王逸伦
特木尔巴根 候补代表： 朋斯克

二二、北平天津两直属市

(正式代表六人，候补代表一人)

黄敬 李葆华 (赵振声) 郭尚义 刘先磊
张晓梅 (女) 资耀华 候补代表：
徐楚波

二三、待解放区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

杜国庠 张唯一 任谦 侯方岳 周钦岳
周士观 黄药眠 候补代表： 李侠公

(丙) 军队代表

(六单位，正式代表六十人，候补代表十一人)

二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包括直属兵团及海、空军)(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

朱 德 聂荣臻 吕正操 李 涛 傅 钟
杨成武 李国英 王 诤 杨奇清 张学思
康克清(女) 刘善本 候补代表：
贺绿汀 戴镜元

二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贺 龙 徐向前 罗瑞卿 赵寿山 王世泰
李 贞(女) 孙志远 王 昭 任白戈
左协中 候补代表： 杜冠仁 陈 播

二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刘伯承 滕代远 杨立三 蔡树藩 钱信忠
卫小堂 布 克 廖运周 曾 克(女)
高树勋 候补代表： 张南生 马 宁

二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粟 裕 王建安 江渭清 陈士榘 谢胜坤

唐国栋 何基泮 魏来国 黎有章 赖少其
候补代表： 李兰丁（女） 杜中孚

二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罗荣桓 李天佑 韩先楚 苏 静 钟赤兵
刘梅村 曾泽生 张 軫 刘白羽
丁志辉（女）
候补代表： 胡奇才 黄达宣

二九、华南人民解放军

（正式代表八人，候补代表一人）

张云逸 古大存 陈漫远 马白山 吴奇伟
冯乃超 罗范群 黄 宇
候补代表： 李进阶

（丁）团体代表

（十六单位，正式代表二百零六人，候补代表二十九人）

三〇、中华全国总工会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李立三 朱学范 刘宁一 陈 郁 李颀伯
许之桢 陈少敏（女） 栗再温 康永和
易礼容 丘 金 赵占魁 杨之华（女）
张 祺 李凤莲（女） 顾锡章
候补代表： 沈 鸿 周 颖（女）

三一、各解放区农民团体

(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张 晔 杨耕田 胡 明 王国华 强自修
王国权 刘玉厚 李秀真(女) 黄 岩
万众一 杨万选 朱道平 韩东征 曹 铁
张振铎 赵有田

候补代表： 朱富胜 石振明

三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蔡 畅(女) 邓颖超(女) 帅孟奇(女)
张琴秋(女) 刘亚雄(女) 张秀岩(女)
李培之(女) 张金保(女) 沈兹九(女)
刘清扬(女) 罗 琼(女) 陆 瑾(女)
陈波儿(女) 黄静汶(女) 杜君慧(女)

候补代表： 龚普生(女) 翟淑珍(女)

三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

廖承志 吴 晗 钱三强 高 棠 何 礼
董 昕 何其芳 曹 禺 龚 澎(女)
梅 益 杨 文 范小凤(女)

候补代表： 徐 盈 杨涤生

三四、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正式代表九人，候补代表一人)

谢邦定 晏福民 马 骏 聂维庆

李秀贞（女） 周寿昌 黄鹤禎 丁 力
方光宇（女） 候补代表： 孙宗汾

三五、全国工商界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陈叔通 盛丕华 李范一 李烛尘 简玉阶
包达三 姬伯雄 周苍柏 俞寰澄 张纲伯
吴羹梅 巩天民 荣德生 王新元 刘一峰
候补代表： 酆云鹤（女） 冯少山

三六、上海各人民团体

（正式代表九人，候补代表一人）

刘 晓 朱俊欣 吴克坚 冯雪峰
汤桂芬（女） 沈体兰 罗叔章（女）
蕒延芳 陈震中 候补代表：邱文奎

三七、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沈雁冰 周 扬 郑振铎 丁 玲（女）
田 汉 萧 三 柯仲平 赵树理 阳翰笙
巴 金 徐悲鸿 蔡楚生 史东山 胡 风
马思聪 候补代表： 艾 青 曹靖华

三八、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梁 希 李四光 侯德榜 贺 诚 茅以升
曾昭抡 刘 鼎 严济慈 姚克方 恽子强

涂长望 乐天宇 丁 瓚 蔡邦华 李宗恩
候补代表： 靳树梁 沈其益

三九、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成仿吾 叶圣陶 钱俊瑞 林砺儒 张如心
晁哲甫 陈鹤琴 俞庆棠(女) 竺可桢
江恒源 汤用彤 叶企孙 杨石先 戴白韬
柳 湜 候补代表： 江隆基 葛志成

四〇、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陈伯达 陈绍禹 范文澜 谢觉哉 邓初民
王学文 艾思奇 何思敬 翦伯赞 侯外庐
张志让 阎宝航 钱端升 樊 弘 吴觉农
候补代表： 李木庵 胡 绳

四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

胡乔木 金仲华 陈克寒 张磐石 邓 拓
恽逸群 杨 刚(女) 邵宗汉 徐迈进
刘尊棋 王芸生 赵超构 候补代表：
徐铸成 储安平

四二、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潘震亚 宦 乡 李承干 林仲易 徐永祚
洪式间 褚应璜 浦熙修(女)

孙荪荃（女） 陈乙明

候补代表：白 杨（女） 林葆骆

四三、国内少数民族

（正式代表十人，候补代表二人）

刘格平（回） 张 冲（彝）

奎 璧（蒙） 朱早观（苗）

吴鸿宾（回） 杨静仁（回）

朱德海（朝鲜） 王国兴（黎）

天 宝（藏） 白寿彝（回）

候补代表：金汉文（蒙） 多杰才旦（藏）

四四、国外华侨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

陈嘉庚 司徒美堂 陈其瑗 戴子良

费振东 蚁美厚

缅甸华侨代表一人 黄长水

日本华侨代表一人 刘思慕 李铁民

周 铮 侯寒江 庄明理 赵令德

候补代表： 林 棠 张殊明

四五、宗教界民主人士

（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

吴耀宗（基督教） 赵朴初（佛教）

邓裕志（女）（基督教）

张雪岩（基督教） 刘良模（基督教）

巨 赞（佛教） 赵紫宸（基督教）

候补代表：马 坚（回教）

（戊）特别邀请人士

（七十五人）

宋庆龄（女）	伍云甫	熊瑾玎	陶孟和
陆志韦 罗常培	高镇五	陈望道	李步青
吴贻芳（女）	曾昭森	梁思成	任鸿隽
卢于道 陈修和	钱昌照	谢家荣	秉 志
萨镇冰 张难先	李书城	张元济	何燠时
龙 云 黄琪翔	李明灏	李明扬	张醪村
胡子昂 宁 武	周善培	陈瑾昆	张曙时
安文钦 张鸿鼎	张伯秋	陈荫南	张治中
邵力子 章士钊	黄绍竑	刘 斐	李 蒸
卢郁文 颜惠庆	江 庸	汪世铭	沙彦楷
许闻天 邓昊明	程 潜	陈明仁	傅作义
邓宝珊 董其武	孙兰峰	林 遵	邓兆祥
程星龄 周北峰	周信芳	梅兰芳	程砚秋
袁雪芬（女）	赛福鼎	阿里木江	
涂 治 刘英源	阎存林	戎冠秀（女）	
李德林 李时良	董和亭	曹凤岐	周建寅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周 恩 来

现在我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向到会的代表做一个报告。

为什么要做报告呢？因为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使大家对上面说的几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全貌的了解，以便能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的报告。

第一，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政协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

从新政协发起到现在，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磋商国是，并决定如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使我们很高兴，于是便邀请各单位参加并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没有想到像今天有这么广大的解放地区和在交通这样便利的情况下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这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在全国革命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已经改观了。

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

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种谨慎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以目前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为主要根据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得很清楚，参加会议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

我们既然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当然不能包括一切反对党派和反动分子，即反对新民主主义而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全国人民，而为全国人民所信托。这就是确定代表时的严肃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此外，政协代表中还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投向革命阵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确定代表人选时的广泛性和灵活性。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

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1〕}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

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

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除了这十四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又如民社党革新派，我们劝他们加入民盟。当然这样做还要看这两个组织自己的意见。和这类似的其他个别人，也被邀请参加，如汪世铭先生。（二）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三）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要求各代表看名单时，不要连起来比较看，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青年学生的代表，虽然不能与其他代表来比，但他们在中国学生当中却有代表性。还有一些情况，有些人在这一个单位可能是正式代表，但在另一单位却是候补代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差别只是个表决权的问题，但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四）代表名单的产生是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的。这样能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尊重。（五）参加的代表，一般的都请他们到会，不要只是列名，否则就不能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不过也有个别特殊情形经过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先生。现在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五十五人，特别邀请的名单

中或者还可能增加若干人，将来代表的总数，可能超过六百六十人，当然也可能就是六百六十人。

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确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从代表性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代表性。但是仍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像彭德怀同志等，因为他们不能来，所以没有邀请。至于个别的遗漏，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觉得筹备会常委会对于这一工作，一般地说已经尽了责任。

第二，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这个草案已经在几天前送达各位代表。现在讲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可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假如没有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便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济济一堂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那时中国共产

党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孙中山先生合作了。不幸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走上反动的道路，造成了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深入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后来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多次号召组织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所以在革命的后三个阶段内，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于四个阶段，直到现在革命战争快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召开这个会。肯定地说，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绝对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长期性的组织。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赞成的。

政协组织所包含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奋斗的目标。凡是同意这个目标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

外华侨，我们都欢迎他们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团结起来，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最近召开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后将设立全国委员会，领导实行全体会议的决议。另外在全国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和省会，根据需要设立地方委员会。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我们要通过这个组织来进行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范围太大，不容易经常召集，所以只好拟定三年召开一次。至于地方委员会，可以适当多开一些。

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现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便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

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地方委员会的情形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建设新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只打算写出人民政协的组织和任务,而不在工作方法方面详细列举,以免束缚工作的进行。希望各单位对这个草案讨论后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决定。

第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这个组织法草案首先表明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现在只须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国名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

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既然国名重新定了，是重新纪元呢，还是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2〕、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不错，这些地方是有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

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对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的确是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内蒙古是解放了的，它便有了双重的代表，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和区域代表。

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

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不是普遍选举的现象，例如根据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等给普选加以种种限制。这种选举我们不要，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有上述种种的情况，我们只能强调提出普选一点，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单就普选一点，三年后能不能真正做到，还是一个难题。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分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而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他们幕后分侵略殖民地的赃，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

所得的赃，争夺不休。而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都搞过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结果换来了封建买办的专政。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座的陈叔通老先生、沈钧儒老先生，都曾亲自体验过。到了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才找到一条好路，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不同了，那时，大家为民主拼命奔走，也仅仅得出了一个伪宪法^{〔3〕}，真正的民主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

现在，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系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指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这个数目看起来很不少。清朝只有六个部，后来又分为八九个部，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只有八九个部，但每个部下面却设有许多机关，有些机关连部长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当局来指挥，造成官场上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形，我们新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政务院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事实上苏联今天有六十个部，比我们更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模仿苏联，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

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

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其次是文化教育。这样做法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呢？根据过去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来说，是不会的，而且还可以把工作推行得既快又好。政务院下面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如公务人员是否执行了政府的决议和政策，是否有贪污腐化等情形。

军事方面，我们估计国内解放战争还要打一年左右，才能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存在，同时将来也要领导巩固国防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这不用多做解释。

至于地方的统一制度，目前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的组织如何，只好留给将来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现在报告已经完了，请诸位根据这三个文件，多加考虑，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来共同商讨。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注 释

〔1〕 孙夫人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2〕 夷族即彝族。

〔3〕 伪宪法 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

四

**建
国
纲
领**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周 恩 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的摘要。

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

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

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是不仅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

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董 必 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是人民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草拟的。本组组长、副组长和组员一共二十五人，参加筹备会的二十三个单位，除了文化界民主人士以外，均有代表参加，民盟、民进和民主教授三单位且均有两位代表参加。六月十八日举行第一次小组全体会，会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因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成立提纲起草委员会，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七月八日本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目前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

* 这是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务院与各部会间应否设立联络指导机关，政务院下面部会数目的多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逐一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并推定了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先后开会三次，并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乃于八月十七日召开本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八月二十六日第四次常务委员会指定了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本人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九月十三日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文字修改后，在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去讨论。

关于这个组织法草案的总纲，我有以下说明：

第一，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

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第二，国家的属性问题：第四小组的全体组员都觉得这一点应该明确地写在政府组织法之内。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中阶级间的关系讲清楚。“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经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这两本书的解释，经过他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以及七月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的多次解释，并经过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各民主党派在纲领和宣言中的表示，都确定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特质。

第三，政府组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民主集中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欧美资产阶级故意把他们专政的政府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机体，使之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以便于他们操纵政权。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中当权的一部分人容许另一部分的少数人，所谓反对派，在会议讲台上说空话，而当权者则紧握着行政权柄，干有利于本身统治的事情。这是剥削阶级在广大人民面前玩弄手腕、分取赃私，干出来的一种骗人的民主制度。司法是最精巧的统治工具，同样是

为当权的阶级服务的。我们不要资产阶级骗人的那一套。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

第五，本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各国宪法多规定为国家元首的职权。我们觉得本法草案的规定，更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第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政务院的名称，原来有人主张用国务院，但国务院包括军事，不太合适；有人主张用行政委员会，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委员会，最高行政机关下还有指导性的委员会一级，其下还有各种委员会，这样名称容易混淆。至于部长会议或部部长会议也不合乎我们的实际，在我们的最高行政机关中，部长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所以最后我们仍采用了政务院的名称。

对本法草案的第一章，我要说明的，就是以上六点。

关于第二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我想作下列三点说明：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而不设主席团，也不设常务委员会。苏联采行联邦制，有十六个共和国，每一共和国在中央有一位副主席，所以自然组成了主席团。我们没有这个事实，也就不必仿行此制。至于日常事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之秘书长领导办公厅人员经常处理。

第二，对第七条政务院总理的名称，在第四小组的会议中曾有所讨论，大多数组员认为如称院长易与法院院长、科学院院长混淆，大家尤其不赞成我们新的行政首长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行政院长用同一个名称，所以草案中采用了政务院总理的名称。

第三，第七条有“批准任免”的字样，因为有的行政区和省市的人民政府，其主席、副主席如果是选举出来的，则中央人民政府只批准其任命。后面第十五条也仿此。

关于第三章政务院，我想作以下四点说明：

第一，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部长和主任委员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我们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会、院、署、行，如果它们的首长都是政务委员，再加不任部长的政务委员，则政务委员人数太多，政务会议也就不易开好。

第二，关于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如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是否列一级的问题，在第四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有三种意见：（一）算作一级，像现在组织法上所写的那样。（二）不算一级，不发号施令。（三）不规定是否算一

级，由事实发展去决定。现在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门，如果每周开一次政务会议，一个部门的工作，每月无法轮到讨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故肯定把它列为一级，以便联系和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各部门工作。这样，各部门的工作是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人民监察委员会是监察行政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的，与检察署不同。有人主张它应隶属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地位高些，职权也较大；也有人主张它隶属政务院，比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更好些，因为与行政机关接近，熟悉实际情况，更便于执行职务，而且人民监察委员会所起作用之大小，实际上要看主持者是否负责及此机构是否被重视而定。我们同意后一主张，所以起草时就把监察委员会列在政务院下。

第四，政务院下设的专管行政部门共有三十个，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应转向建设，不能不多设几个部门去管财政经济工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部门没有列为政务院专管行政部门，如合作事业，如盐务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在草案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于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有了这样有弹性的条文，政府便好办事了。

最后我想对组织系统表简单说几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虽然选举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之后，后者即为行使全国最高政权的机关，所以组织系统表中用虚线表示其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闭会后的全国委员会对政府仅提出建议案，故亦以虚线表示之。

政务院下，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地位较高，故在图中的部位亦较高。政治法律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门以黄色实线表示之；财政经济委员会所指导的部、行、署以红色实线表示之；文化教育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院、署则以绿色实线表示之。政务院对三个指导性的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及各部、会、署、院、行均有直接指挥之权，以黑色实线表示之。外交部对情报总署，财政部对人民银行，贸易部对海关总署有监督指导之权，亦以黑色实线表示之。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已印发了，请各代表先生审查后付之公决。

根据《董必武选集》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三条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

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第二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之。

第七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下列的职权：

一、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

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

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

五、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

六、批准或修改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七、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

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九、任免下列各项政府人员：

(甲) 任免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署的署长、副署长及银行的行长、副行长。

(乙) 依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

(丙) 任免驻外国的大使、公使和全权代表。

(丁) 任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戊) 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

十、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第九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第十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两个月举行一次，由主席负责召集。主席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请求，或政务院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须有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十一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办公厅，并根据需要，得设其他附属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三章 政 务 院

第十三条 政务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一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政务委员得兼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各部的部长。

第十四条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政务院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行使下列职权：

一、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二、废除或修改各委、部、会、院、署、行和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议案。

四、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

五、领导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

六、任免或批准任免第七条第九款乙项规定以外的各縣市以上的主要行政人員。

第十六條 政務院總理主持政務院全院事宜。政務院副總理和秘書長協助總理執行職務。

第十七條 政務院的政務會議，每周舉行一次，由總理負責召集。總理根據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務委員的請求，得提前或延期召開會議。政務院的會議，須有政務委員過半數的出席始得開會，須有出席政務委員過半數的同意始得通過決議。政務院的決議和命令，以總理單獨簽署行之，或由總理簽署外并由有關各委、部、會、院、署、行的首長副署行之。

第十八條 政務院設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和下列各部、會、院、署、行，主持各該部門的國家行政事宜：

內務部；

外交部；

情報總署；

公安部；

財政部；

人民銀行；

貿易部；

海關總署；

重工業部；

燃料工業部；

纺织工业部；
食品工业部；
轻工业部（不属上述四部门之工业）；
铁道部；
邮电部；
交通部；
农业部；
林垦部；
水利部；
劳动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科学院；
新闻总署；
出版总署；
卫生部；
司法部；
法制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

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

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

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

为进行工作，各负指导责任的委员会得对其所属各部、会、院、署、行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

第十九条 各部、会、院、署、行，在自己的权限内，得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第二十条 政务院设秘书厅，办理日常事务，并管理文书档案和印铸等事宜。

第二十一条 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厅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二十二条 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

第四章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

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其管理和指挥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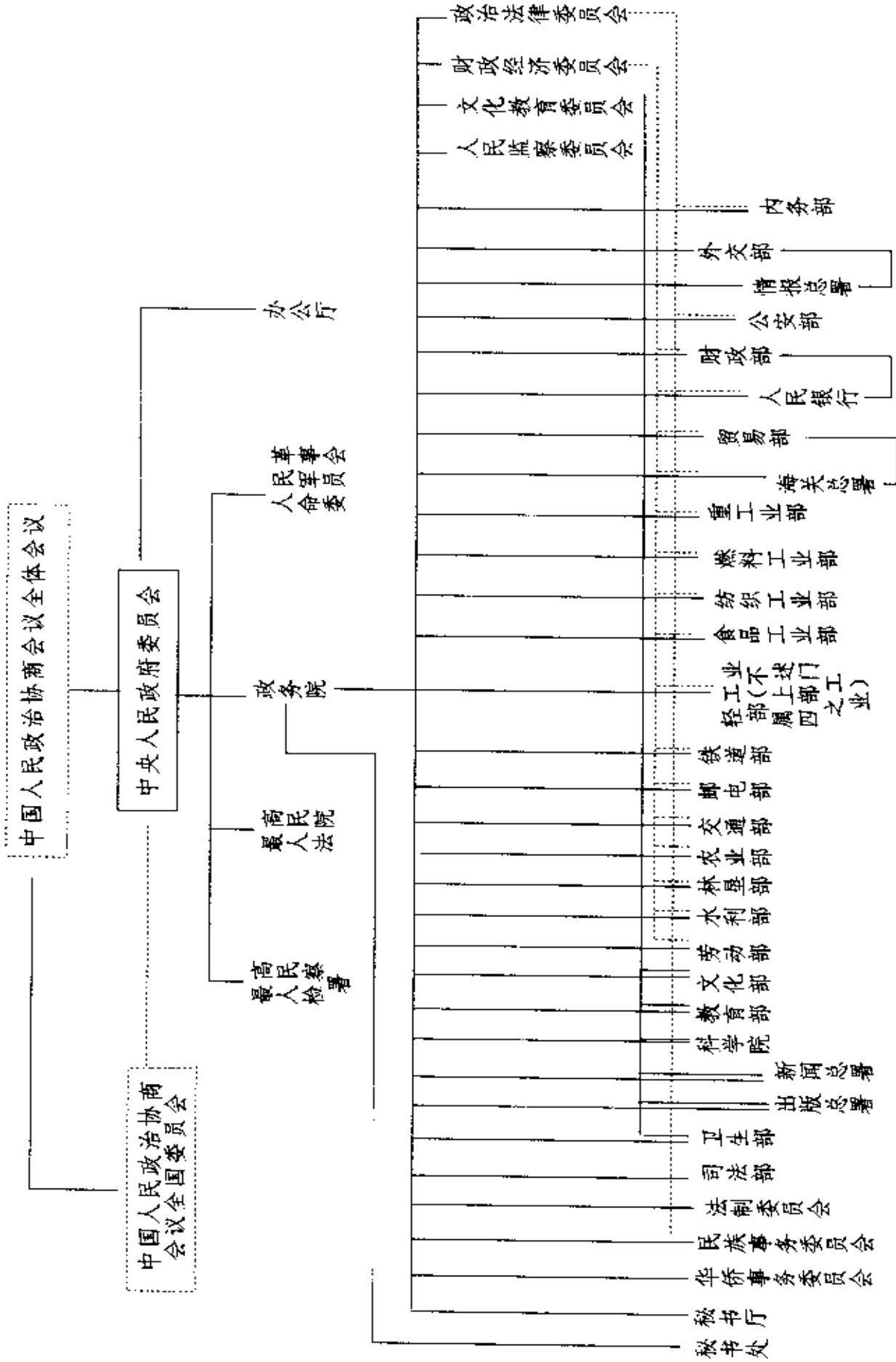
第六章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与解释权

第三十一条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组织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系统表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章 参加单位及代表

第二条 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

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上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定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定之。

第四条 凡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各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其有不同意见得保留之，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声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或代表或全国委员会委员，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委员会视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予以警告，撤换代表，撤销委员资格或撤销参加单位等处分。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处分，如被处分者不服，得向下届全体会议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全体会议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

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须有参加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主席团，由全体会

议选举之。主席团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秘书长一人，由全体会议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团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其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议事规则，由主席团制定之。

第四章 全国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如下：

一、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二、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三、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

四、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

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之；其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之。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决议，得设立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为该地方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组织法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后施行。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 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

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

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区，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十九条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

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

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在地方各经

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

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五条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

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

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

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五

隆重开国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

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

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刘 少 奇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

* 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端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

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

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根据《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 位代表主要发言

特邀代表宋庆龄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在农村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担子是由农民肩负起来的。现在中共已经把革命的主力从农民移向工人。发展生产是当前政策的基点。我们正在把孙中山先生所草拟的中国工业化的计划骨干，给与具体的内容。

但是我们中间还有人在怀疑，他们认为人民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成就了，他们认为在农村中所能做到的，未必能在城市中做到。他们在怀疑地观望，看看对于这个沉睡着的巨人，这个全中国工业心脏的上海，中共在采取什么步骤使它苏醒起来，恢复它的活力。可是让我们看看这新解放的上海吧。这是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军管会时时刻刻照顾着人民的需要。为了保障人民的积蓄与生活而实行的折实储蓄的办法，以及其他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已经使新发行的货币，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这信任的取得，一半也是由于军管会对于人民的态度。军管会明白地宣布他们的政策，对于每一个执行的步骤，都加以耐心的说明，用了最简单明了的词句，使每个人都能了解。更重要的，他们表现愿意真诚地学习。他们决不怕失去面子，有了错误，就坦白承认，希望别人给与忠告，以求帮助人民自助。他们说：“请教你们工业家，怎样才能使机器的轮子转动，为人民生产？”他们对工人和学生说：“你们对于我们的建议，有什么意见？”他们对文化教育工作者说：“解放你们被闷塞压抑着的思想吧。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最大利益。”结果当然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而最后的收获是成功。

在政治方面，中共也采用同样方法，处理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今天参加着这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就包括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整个改变了。我们的老师，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与戏剧家，不会再受迫害和剥削了。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广大的读者和听众。知识不再是可怕的东西了。相反的，大家正努力使文化教育工作者和人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向人民学习，因而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是国内的情况。那么在国际阵线上，这人民胜利的进军又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反动势力如果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结果，就是他们本身的灭亡。这种力量是不能毁灭的，它比之帝国主义的庞大军事力量，要大过无数倍。这种力量是未来世界安全的核心，它是从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所产生的。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人民力量的结合，已经改变了历史的均衡。

这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世界亿万人民的伟大力量。让我们献身于阻止文明毁灭的斗争，用每一分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应有的享受。这是说，直到每一间茅舍重建成适当的住屋，大地上的产

品能自由流通，工厂的利润获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医药保育都由社会供给，我们的工作决不停止。当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信仰与居住区域，都能同样获得这些必需品，我们才算达到了目的。这是新中国与新世界的一个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民觉悟了，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到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

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发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对今天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实确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

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像得到，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更愿坦白地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力是三位一

体，是狼狈为奸。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余，还须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在做困兽犹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真确，他说：“谁要放松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新的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产阶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黄炎培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主席团！诸位代表们！来宾们！工作同志们！

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所新的大厦，是钢筋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就是这些单位的一根一根柱子，这钢筋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所新的大厦的基础，是什么？说理论基础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这所新的大厦多少大？有九百五十九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多万人。连我在内。我们将乘着大厦成立的机会，立刻创设一个工作总机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这所新的大厦，在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一群人常常闹着外来的大强盗，就是帝国主义。家里常常闹着一群小偷，就是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中间有一根柱子，它也是当冲的。它给这般外来的大强盗和家里的小偷们破坏它，迫害它，这根柱子是什么？就是民族工商业者们。现在这老的柱子，变成新的柱子了。民族工商业者们嘴里都在邪许！邪许！共同地卖着气力来建造这所新的大厦了。小愉快完全消灭了。大强盗不许进门了。

这所新的大厦的环境，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有很高的高山，很大的大水，很多条高山，很多条大水，统统趋向着一个很大的大洋，就是太平洋。太平洋应该是太平的。可是一群小的海盗，想依靠着大的海盗，来兴风作浪，并且强盗们自己先闹起来了。只有沿太平洋的各国人民自己觉悟起来，才能保障太平洋的太平。

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这所新的大厦，周围有很辉煌灿烂的墙壁，墙壁上写着一行一行顶大的大字，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所新的大厦，有很好的邻居，最好最接近的邻居，是一所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厦，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惟一的帮助我们建造这所新的大厦最出色的一个邻居。

回过头来想，为了建造这所新的大厦，不知多多少少

人卖尽了他们的气力，流尽了他们的血汗，多多少少劳苦大众，爱国志士，伤残了他们的肢体，牺牲了他们再宝贵的生命，就是换得来这所新的大厦。

这所新的大厦完成了。这所新的大厦的主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大家要站立在各个岗位上，去好好地工作了。我们全国人民要谢谢建造这所新的大厦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战斗员，指挥员，他们的总司令朱德先生。我们全国人民要谢谢领导建造这所新的大厦的空前伟大工程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立三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主席、诸位代表：

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的日子，全中国工人和一切体力脑力劳动者，都以空前未有的欢欣鼓舞来庆祝这个伟大的划时代的日子，庆祝那个长期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死灭，庆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人民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庆祝全国人民最终地摆脱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遭受屠杀、压迫、饥饿、贫困的奴

隶命运，而奠定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巩固基础。这个伟大胜利的获得，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几十年不挠不屈的英勇斗争所创造的果实。在帝国主义用它的大炮“冲击”开中国的“海禁”，把中国人民变成半殖民地的奴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进行过多次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结果都遭受了失败，不是被帝国主义用最野蛮的屠杀方法直接镇压下去了，就是被民族叛徒如袁世凯、蒋介石之流为保持个人的和反动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甘作帝国主义走狗所出卖了。只有这一次中国人民的大革命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如毛主席所说的，由于我们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即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由于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有“一个由这样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层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由于有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援助。正如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没有这样的援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一次中国人民大革命获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英明的领袖。由于有这个英明的领袖，才使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准确指针而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由于有这个英明的领袖，才使中国人民革命的先进部队，中国工人阶级与全

国人民有了巩固的结合，而形成了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团结，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保证。这个英明的领袖，就是现在全国人民一致爱戴的毛主席。

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胜利的确是伟大的，的确是值得庆祝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更远的路程，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摆在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不仅要彻底歼灭现在还在作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余，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事业；不仅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以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而且要开展一个长期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逐渐把经济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富强的工业国；把毫无国防力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足以抵御任何帝国主义侵犯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把人民生活经常陷在贫穷，饥饿，和不文化的痛苦当中的国家，变成全体人民都能享受丰衣足食和文化幸福生活的国家；这样来引导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的。这个工作的确是伟大而艰苦的，这需要全国人民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以国家主人翁的最高觉悟，继续发扬过去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负起这个建设

新国家，新社会的艰巨责任。工人阶级与过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有根本的区别。过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都是以剥削广大劳动群众的血汗来自己享福。工人阶级是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阶级，因而不只是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精神，能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且在取得了革命胜利，成了领导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后，决不能以剥削其他人民群众的方法来谋自己一个阶级的利益。恰恰相反，只有全体人民都得到了解放，工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只有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只有在发展人民经济，提高生产，增加整个国家财富当中才能求得。因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全国人民当前的最高利益，也就是工人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必须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精神，努力生产来成为全国人民的模范。必须发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固有道德，以改变社会的风气。必须努力巩固自己的工会组织，使它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最可靠的支柱；必须努力巩固统一战线的组织，以便更加团结全体人民，一致拥护人民政府的一切设施，而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必须号召全国人民更加巩固与中国人民的最真实的朋友——苏联的友好关系。号召全国人民向苏联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伟大的建国经验，和

艰苦奋斗的英勇精神，以克服在我们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成为国家政权领导阶级所应当负起的责任。这个责任的确是伟大而困难的。在中国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继续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很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毛泽东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永远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便是表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大团结，便是我们今后伟大建国事业必能胜利完成的保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泽东旗帜的永远胜利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诸位代表同志：

首先我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庆贺这一个对中国，对全世界人民解放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同时我要代表新疆人民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

任务而聚集在这个会场的人民代表们致最诚恳的慰问。

同志们！目前，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不幸的历史而迈进争取全国人民的光明的新生活的神圣任务的新阶段。在这个会议上，将确定这个斗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基础，所以说这个会议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

我们中国人民的新的历史途径，已经打开。我们将由武装革命斗争，转入到政治的经济的国防的和文化的建设方面。

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上建立的，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给我们打开了这条光荣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因此全中国人民（新疆人民也在内）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同时向领导这伟大的胜利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表示极诚恳的感激和崇高的谢意。不但是这样，而且为了报答这个胜利，今后要在中共和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斗争中，贡献出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坚决相信这也是一定能够做得到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我们的友人欢笑。因为这个胜利已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同时给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阵线，增加了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给世界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和人民解放运动，以很大的教训和启发的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全世界爱好自由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和尊敬。

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使我们的敌人痛哭，因

为这个胜利给中国境内的反动分子们特别是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毁灭性的打击，给全世界侵略者，帝国主义反动集团以无情的打击，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和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采取过所有可能的措施，但是事实已证明，他们的一切企图不仅空费气力，反而帮助人民解放军。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已证实，凡违反多数人民的意志或者违背正义的任何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归于灭亡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新疆：我们可以说新疆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压迫、反专制、反奴役、以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残酷斗争历史。五年前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的人民解放运动，虽然使我们新疆人民获得部分自由权利，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连这一点可能性都要剥夺去，而企图重新实行黑暗专制，来践踏人民。可是新疆的自治区的人民却在和平环境里，继续进行了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新疆人民在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中国人民（新疆人民也在内）的解放，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后，才能获得彻底解决。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就是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所以新疆人民在和平斗争的环境中，很关切地期待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后胜利的到来，新疆人民和中国境内其他人民，同样地坚定了他们对将要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信心和希望。而高兴地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解决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组织等问题的

这一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新疆人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总而言之：我们全中国人民，即将要踏上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在我们面前正摆着创造新的、自由的、进步的、文化的、生活的任务。这个任务当然是很艰巨而繁重的。但是中国人民（新疆人民也在内）坚决相信，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已有二十八年斗争经验、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来领导这个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坚强信念，这也就是使我们骄傲和勇敢的原动力。

为新民主主义胜利而前进！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显示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显示着中国人民从此自己来处理中国的事务，显示着人民的新中国的光辉灿烂前程。感谢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正确领导，感谢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感谢全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长期搏斗，以及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此我们开始稳步走上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道路。这不仅是在座的诸位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所同感欣庆的。

三个月来，经过人民政协筹备会中各位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诸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关系建国大业奠基工作的“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等三大法案之起草。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和通过这三个法案，从而依据以成立全国人民所一致期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现共同纲领。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郑重表示，我们对于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原草案，完全赞同。因为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

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即人民由被压迫地位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新国家中，政权操在人民的手里，并剥夺违背国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动派——即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派之参政权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在数十年中累积起来的革命经验，证明非走着上述四阶级联盟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便

没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过：“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受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引申其义，孙先生所要建立的民国，与我们今日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现在的世界，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侵略其他民族，挑拨战争，威胁和平，且自身正走向没落之途的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道路。另一条是没有压迫没有侵略，反对战争，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幸福生活的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统一战线道路。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指示我们：“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又在临终致苏联遗书中说：“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和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被帝国主义压迫与奴役的民族是一致的。为了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为了巩固和建设我们新国家，并保证我们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进于社会主义以致于世界大同之路，我们在国际上两条阵线中，只有“一面倒”，只有坚决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线这一面，既没有二条道路，也没有第三条道路。

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为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政；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旧民主主义国家的议会，更为

少数金融巨头所控制。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了真正反映民意和有效的为广大人民服务，政府的组织，必须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议会政治往往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我们更由于近二十年来累积的经验中，认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一方面要能真正代表人民；另一方面要使其有充分权力以推行国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兼具两者之长。而且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展开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国防的、文化教育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上，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治制度，应是我们所当采取的优良制度。

新中国之经济建设，在于国民经济之全面改造，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并保证其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上发展。因此必需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这与孙中山先生的“发展工商业”、“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私人资本”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

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其主要任务，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并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孙中山先生曾说“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又说：“近代人类思想，注重谋大家的幸福。”其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关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在精神上也是一致的。

综合起来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于奠立建国初基而即将提出本会讨论通过的三项法案草案，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认为是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人民意旨的，不仅自身衷心地表示赞同，而且深信凡属同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以至全国人民大众，也都会一致表示赞同。本会一定能够顺利完成其任务，不过这只是万里长征中走完第一步。在今后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工作中，我们还要更加巩固四阶级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按照本届会议制定的蓝图——共同纲领，不避艰辛再接再厉向前迈进！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 陈铭枢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本人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关于人民政协筹备会所起草的人民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三个文件发表一点意见。人民政协筹备会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各小组起草三个文件曾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起草好了以后，又经过多次的分组讨论，修正再修正，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非常完善而具有创时代历史意义的三个文件了。这三个文件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也创造了中国人民的新生。我代表本会的全体同志向大会宣告：我们对于这三个文件的内容表示衷心的赞成和拥护。

其次，我们应该说明这三个文件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这三个文件的现实性，譬如共同纲领可以说每一条都是符合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这里面没有一点不合实际的高调，每一条都是可能做到的而且是必须做到的。我们感觉得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其他如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都使我们有同样的感觉。第二，这三个文件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体化了，特别是政协组织法明白的确定了人民政协就是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从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后来又经过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结果都失败了；经过全国人民

多年的奋斗，直到今天才胜利的完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今天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进一步的扩大了，巩固了，坚强了，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了。这三个文件都充分表现了这一个民主统一战线的精神。第三，这三个文件表现了我们新国家的阶级性和它的阶级关系，并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旧民主否认阶级的存在是欺骗的，说国家是超阶级的也是错误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四个阶级的联合，并且必须以工农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所谓“人民”的范畴就是这四个阶级，所谓“国家”政权也是属于这四个阶级的。第四，政府组织法中特别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这一个特点，是中国特有的，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也不完全同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制度。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也是依据中国革命运动历史的发展而加以提高的。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召开国民会议，后来不幸未能实现而他逝世了。再如旧政协虽然被蒋介石反动派破坏了，但在中国人民中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并且证明了和反动派在一道不可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不过，由于有了那么一次过程，才发展成今天的人民政协。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我们才找到了这一个根据中国历史发展，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人民需要的政府组织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也是最适合的——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制度。

最后说到本会的立场与愿望。国民党自从蒋介石背叛

了孙中山以后，反对反动统治的运动即已开始，本会就是反对反动统治运动的国民党民主派同志的一个联合组织；于一九四五年成立于重庆。在旧政协时代，我们已经是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一直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从事瓦解反动政权的工作。现在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了，我们愿意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同时我们坚信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应该与新民主主义汇流。一切假借旧三民主义为教条而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人，都是孙中山的叛徒，必为全国人民所共弃而归于灭亡。我们号召一切革命的三民主义者都站在人民方面来，共同努力肃清反动残余，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而努力。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 陈叔通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本席代表全国工商界发言，我们热烈赞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这三个草案尤其是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奋斗，以全国人民的重大牺牲所换取得来的东西。这

与过去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所制定反人民的伪宪法，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

这个共同纲领，是经过四十六个单位的代表，分别地，混合地，反复讨论，字斟句酌，谨慎制成的，他包括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呼声，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那就是全国人民自愿，而且必须遵守的方针和任务，也可以说就是人民的临时宪法。

目前还有一部分同胞，呻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之下，没有得到解放，因此我们首要任务，还是支援前线，就是共同纲领所说的应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过去全国工商界诚然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压迫。但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农民贡献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工商界也应该动员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彻底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反动派使全国走上和平建国的大道。

我们全国工商界，要加紧团结起来，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要把我们以前靠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完全扭转过来。抱定自力更生的决心，切实做到面向农村为人民服务，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配合全国的经济建设计划，早日实现，使农业国为工业国。要达到这个目的，全国工商界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真心诚意地协同工作，要把握得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兼顾两利政策中，要认识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劳动是建设的基本动力，资本的运用一方面也应该是为全国人民谋

福利的。

新民主主义是徐步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今天的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全国工商界不应该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怀疑和顾虑。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必然可以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铺平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丰衣足食，快乐自由，这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也是工商界的希望。

我们今天必须响应政府的号召，抱定节衣缩食，团结创造的精神，发展自己事业，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使工商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力的一个单位。

让我们高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 代表蔡廷锴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言。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拥护和平民主的人民期待中，正式开幕了。这个会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史的第一页，这个会议结束了几千年的反动统治，开始了人民大众行使国家的政权；这个会议将诞生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央政府。全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是欢欣鼓舞的！我们迎接这一个光辉的节日，不能不想到这个伟大的胜利，是由人民解放军和工农阶级英勇奋斗得来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得来的！我们要向全国工农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致敬！向人民解放军致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说明了我们的民主革命是基本上完成了，但困难还不是没有，在我们的华南西南，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武装；在我们面前还站着一个美帝国主义；还有复兴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过去，我们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已取得了推翻反动统治的伟大果实；今后，我们更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坚决地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建设我们的人民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们，包括了国内各民主阶层，各民族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这比之那徒有所谓选举形式而实际操纵在大资产阶级手里的旧民主议会，实有天壤之别，在我们中间，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共同意见都充分地反映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里面了。这三个文件，不但经过了筹备会代表反复研讨，而且综合了先后到平的每一个代表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这三个文件，不仅是我们的建国纲

领，也是每个参加单位共同的行动纲领。这三个文件我们必须忠实，坚决地去拥护它！我们今后的共同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们，将坚决地遵守和执行共同纲领，更愿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切努力协助全国总解放，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我们建国的任务！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 谢雪红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和各位旁听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将要完全解放的时候召开了。真正的人民世纪开始了。中国人民做主人了。几千年来的封建遗物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就要送到故宫博物院去了。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们将要送到人民法庭去受严厉的惩罚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呀！这是多么光荣的史实呀！

这些胜利和光荣是由那里来的呢？大家都明白，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了全国人民起来作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人民解放军三年来英勇善战而得来的。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结束了封建买办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中国人民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国家的时候，全国人民所关心着的台湾，目前还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所统治着。在这里，反动派依然继续着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活动，而且还在勾结美帝国主义，并企图组织日本法西斯力量要来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的果实。而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将完全被消灭，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阴谋活动也就更加积极公开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被蒋美反动派所压迫剥削着的台湾人民是在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水深火热当中过着极端恐怖、凄惨的生活，可是台湾人民已经认识了和觉悟了必须消灭反动派的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台湾人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放。

这次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而由这个会议组织起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完全根据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六百七十万台湾人民，三百多年来反对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异民族的侵略压迫，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买办统治，不断作流血牺牲的斗争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行将产生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这个共同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代表着我们的利益，所以

我们不但应该要遵守，而且我们为着这个纲领的全部的实现，必须努力奋斗到底。只在纲领草案第十二条中所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我们就觉得非常满意，台湾人民的政治要求总结起来就是这个，仅仅这一条就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消灭反动派的统治和击灭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现在的台湾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基础，有很多的各种工厂，物资丰富，生产力旺盛，铁路、公路、电力均相当发达，还有很多的技术人材和勤勉朴素的人民，一旦解放了后，是有着许多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而对新中国的建设也可能有很大的贡献。而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为保卫中国国土，在国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积极生产，积极支援前线，迅速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全台湾省人民，包括二十多万少数民族的高山人民，向大家表示对三个文件的完全同意，同时负责传达给台湾人民，组织他们一致来遵守，并为这共同纲领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台湾的解放是很快了，要建立一个民主、康乐、模范的新台湾也很快就会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宣布我们一致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愿意坚决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完全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唯一宗旨。二十二年来，全国人民已经认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全国人民和我们合作，因此就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且正在消灭最后的残敌，完成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共同纲领要求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澎湖、海南岛和西藏在内。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去做。

共同纲领要求人民解放军和一切人民武装力量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忠实地这样去做。

共同纲领要求建立统一的人民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共同纲领又要求人民军队应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加强，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保卫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我们的军队是我们人民民主国家对付内外反动阴谋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于国内来说，我们的军队决不允许任何反革命分子继续破坏捣乱，危害人民利益。对于国外来说，我们的军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侵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寸土地。我恳切地希望人民政协的全体代表，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一切爱国人民，能够继续援助人民解放军执行上面所说的各项任务。我坚决地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一切人民武装力量，一定能够实现人民政协的一切愿望，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命令。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句话。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一同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完全不相同。在旧政协的时候，我们只能希望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觉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减少灾祸痛苦，我们还不能希望完成革命大事业。

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来这里，决不是像旧政协的时期那样，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全体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

因此，今天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中国人民要求我们来完成重大任务，全世界人民也要求我们来完成重大任务。

中国人民要求我们完成什么任务呢？那就是要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头建造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世界人民要求我们完成什么任务呢？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

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中国民主同盟过去几年以来的努力奋斗，也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些任务。中国民主同盟这几年来的斗争经验，和中国人民近一百年来反对内外压迫者的长期斗争经验，都教训了我们：要完成这些重大的历史任务，办法是有的。这办法就包含在我们所讨论的三个文件里面：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这三个草案，实际上是一个草案，可以说是适合于目前的中国人民大宪章草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建国总方案。

我在这里不谈文字问题，只从这三个草案的精神来说，我提出以下的四点：

第一，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产业落后的中国，只有从新民主主义才能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二，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包含各民主阶级在内，都得到民主自由，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样才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发挥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

第三，各级政权机构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

数，下级服从上级，而不是采取互相牵制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这样才能巩固人民的政权，而使国家得到了长治久安。

第四，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保证长期合作。意见有出入，可以相互协商，决不使力量分散。这种团结协商的精神，是我们解决国是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今后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而且必须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只有采取这个方向和路线，革命建国大事业才能顺利完成，不然，革命建国事业会失败，或者会遭遇挫折。

这个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多年来的斗争经验的一个总结。现在已经包含在这三个草案里边。而这三个草案又是经过人民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和各单位代表研究考虑过许多次的。这还会有问题吗？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向全国人民声明，我们毫无保留地赞成并接受这三个草案，并且主张拿这三个文件，作为目前的中国人民大宪章和革命建国总方案。

各位代表先生们！我还要再向各位说几句话，我们的办法已经有了，我们的方向和路线已经确定了。目前我们最最要紧的，是大家团结一致，按照这共同的方向和路线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来加紧工作。

各位代表先生们！时间再不等待我们了，全国人民，世

界人民都迫不及待地盼望我们赶快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能再让国内反动派苟延残喘了。我们要使我们在广州，在台湾，在西南，在新疆，在西藏的同胞，快快得到解放，和我们一起，参加建国工作。我们要使全国恢复和平，人民各得其所。并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了。必须联合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共同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侵略的重大责任。

要担负起这许多重大的任务，我们前面是会有困难的，会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统一的方向和统一的路线，并且，更重要的，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因此我们就有办法来克服任何困难了，我们就有把握来完成当前的历史大任务了。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 陈嘉庚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本席谨代表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个草案，简单地表示如下的意见。

一般地说，这三个草案都能够適切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充分地照顾到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基本利益，对于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表示完全接受和极力拥护。

站在海外爱国华侨的立场，我们特别感到这三个草案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对于祖国前途抱有很大的期待。可是，这二十几年来，我们和我们在国内的眷属吃够了“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痛苦，我们出钱，出壮丁，出技术人员，尽力替祖国服务，但在海外的我们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在国内的眷属受尽了这个反动政府的榨取和压迫，我们更不要说在祖国政治实际上有甚么发言权了。现在，可不同了，海外华侨已成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在由于这个战线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里头，海外华侨有充分的代表权和发言权，这使到我们华侨在祖国政治中的

地位空前提高了，相信侨胞一定感到无限的快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既能够巩固和强化这个有足够的华侨代表的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我们对这草案极表同意，这是一。

我们华侨的居留地，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便是他们的殖民地，过去有不少人看到祖国政治的黑暗，感于帝国主义的宣传，错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总有点可取的地方。可是这种假民主现在已经破产了。特别有最近几年来我们华侨在居留地所受到一天比一天厉害的歧视，凌虐和迫害，我们认清了帝国主义在嘴里的“民主”，不仅不是真民主，而且是对多数人专政和迫害的警察政治。有了这样痛苦的经验，我们深深体验到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制度，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在是绝对的必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既是依据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来草成，一定能够使新中国政府成为代表与保护华侨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使中国人民，连同华侨在内，由被压迫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这是二。

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来说，他的内容不只反帝、反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且积极地提出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具体方针，又恰当，又切实，在各方面都能够满足爱国侨胞的要求。比方说，草案中的经济政策一章，高度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精神，特别提出便利侨汇，一定能够繁荣经济，吸

引华侨对祖国工商业的投资，以促进新中国建设，又比方说，民族政策一章，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使身受异族歧视之害的我们华侨感到异常適切。特别是外交政策一章，它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为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些原则的切实执行，不独为中国外交辟一新纪元，而且一定会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而也大大改善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加之，外交政策一章，又明白课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的义务。将来新政府一定能够对海外华侨的生命财产和权利，予以充分和有利的保护，是可以断言的，这是三。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信念，本席代表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以及爱国侨胞，对于这三个草案愿无保留地予以接受，通过以后，并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努力促其实现。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农工民主党首席代表 彭泽民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这几天我们听了毛主席，刘少奇先生，宋庆龄先生，张澜先生及各位代表的讲话，又听到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及谭平山先生关于共同纲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报告，深深感觉到这次会议真是做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一个无比伟大的会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就是世界史上也是创举。特别是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这伟大场面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现，自然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不能不归功于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尤其是我们不能一刻忘记的，是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英明远见的领导。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文字、口头上，号召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及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现在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就这三个大会文件说几句话：

第一，刘少奇先生说，共同纲领是中共最低的纲领，是要一字一句对中国人民负责，使其彻底实现的。我们对这些话表示充分的信任，相信中共是有此诚意，有此决心，并

有此力量，使这个建国纲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兑现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宣言，以至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先生宣布的我党的基本政治主张，政纲和政策的要点，不仅全部包括在这个纲领里面，而且使之向前发展，更加提高，并作出更具体更恰当更切合实际的决定。因此，我们全党的同志，从此以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随着共产党，做毛主席的学生，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第二，说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我完全承认这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走向革命到底完全胜利的最好保证。这政策不是软弱缺乏勇气的资产阶级所能执行所能贯彻的。他们固然有时也利用一下，但终不免为民族败类蒋介石所背叛。因此这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在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尤其在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忠于人民事业，为革命服务的天才领袖领导之下，才能认真地贯彻执行。这说明这个政策之实现，必须有阶级性的保证。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就同意了联合战线的主张，但终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破坏，革命也就失败了。蒋介石后来在抗战中又拿来利用，但不旋踵又亲手破坏了，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二十几年来一贯地坚持着这个政策，毛主席更将其发扬光大，这就造成今天的光辉的胜利。刘少奇先生说：不仅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愿与大家一道。我们坚决拥护这种看法，并愿

促成其实现。我党曾经提出过反日的联合战线和抗战的统一战线；可以说自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一直到后来的参加民盟，响应“五一”号召，都是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无疑的就成了我党努力的中心。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郑重补充说明的，那就是在我党成立的初期，因为对革命理论认识的不足，因而对于革命阵线上的友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到应当采取亲密合作的政策，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莫大的遗憾。现在值得我们引为庆幸的，也就是我们站在革命进步的立场上，我们能够发现错误，自我改正，所以我们的党特别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就能够决心地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保证了我们的革命的纯洁性。

第三，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我们认为这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制度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自己负责的政权。在本质上与欧美三权分立的旧民主的国家制度，绝无相同之点，在性质上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相接近，但在形式的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组织，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和建设成功的保证。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保证之下，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纲领的一字一句，才能无保留地得到实现。

综合起来，这三种历史性创造性的文件，是中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建国的方针，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是互相关联的，是缺一不可的。在筹备期间，各党派，各民主人士的意见，虽多被采用，但基本上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共产

党，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指导理论和中国历史、社会实际情况，以及数十年来的奋斗经验相结合制造出来的。

最后，我们愿协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一德一心，接受这三大文件，并促成其彻底实现。谨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满的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内蒙古自治区首席代表 乌兰夫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诸位代表先生：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我代表着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表示热烈拥护和全部同意。因为我们的共同纲领，宣告了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且还确定了新中国内部各民族的地位和民族关系，是建立在各民族完全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真正成为各

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三百多年以来，内蒙古民族人民，既受着满清皇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奴役，又受着与这些统治者相勾结的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苦难是无法诉说得尽的，各个时期的反动统治者，实行了羈靡、怀柔、分裂、同化、扶植蒙奸、镇压革命等等民族压迫，使得内蒙古的社会进步，长期的受到了阻滞，使得内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停留在落后贫困的状态中。而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为了对蒙古民族及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实行强制同化，还异想天开的制造了一种谬论，一口否认中国境内有蒙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任意污蔑侮辱。处在如上所说的种种情况之下，中国境内蒙汉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民族压迫政策挑起了蒙汉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歧视，而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动派，又利用他们所制造的民族矛盾来进一步实行民族压迫。

正因为这样，内蒙古民族人民挣断枷锁，渴望解放，渴望自治的意志，也就愈来愈坚决；很多年来，我们曾为着自己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对帝国主义者、大汉族主义统治者与封建压迫，作了英勇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是，在那样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是谁曾经给予了内蒙古民族人民以无限同情和援助呢？

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内蒙古民族最好的朋友和领导者。他们承认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

位，并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就是中国各民族必须团结共求解放。他们提出了和历来反动统治者完全相反的民族政策并实行了自己的政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给了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以领导和援助。内蒙古民族人民，就是遵循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并在他们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于一九四七年五月获得了多年以来没有达到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解放。

自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又四个多月了，内蒙古人民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直接推动下，在各解放区与人民解放军的极大帮助下，经过了自治运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已使内蒙古的面貌为之大大改变，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军事上，内蒙古人民已建立了一支人民骑兵，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积极配合各兄弟部队作战，共同解放了内蒙广大地区和人民，歼俘了大量敌军。在政治上，自治区内的蒙汉人民，现在是共同的参加管理着各级政权，蒙汉民族的政治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经济上，自治区内的蒙汉人民在土改中，都同样分得了一份土地耕畜和农具。他如蒙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无不同样得到发展或同样受到尊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上遗留下的蒙汉民族间的种种成见隔膜与歧视，现在已经变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毫无疑问的，蒙汉各民族间平等团结的新民

族关系，是内蒙古民族解放与新内蒙的建设事业所以能顺利进展的重要因素，也将是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以能顺利进展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显明的事实，充分说明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是完全正确的，并已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内蒙古人民自己所走的道路，也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帮助，没有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政策，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平等与自治，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这一个不仅适合于蒙古民族，而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业已把它加以总结，成为我们必须共同遵守的纲领了，我们应该热烈地庆祝这一胜利，热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决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各革命阶级、民主党派、各民族、国外华侨一道，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并使内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提高与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各民族的永久友谊密切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救国会代表 沙千里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本席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言。我们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着空前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种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宣告了二十二年蒋朝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死亡,而且在于它永远地结束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对于中国人民的残暴统治,尤其在于它宣告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人民自己做了国家主人的一个人民新世纪的开端,这样一个伟大的开端,是在一个为马列主义所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是在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中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完成的。

对于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三个草案,我们有一点意见,向大会表示:第一个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我们认为这是最适合于中国人民要求和目前情况的一种统一战线具体方案。按照这个组织法,人民政协将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的,最完整的,最有力的组织形式。其组成分子包含着除反动分子以外的各阶级、各党派和各团体的代表。本着协商的精神求得团结一致和长期合作。这种团结一致长期合作,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人

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是最适合于目前情势的一种办法。因为在全国解放，反动势力全部肃清之前，进行普选没有可能，在这时期内，包含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的人民政协，事实上是最有代表性的人民政权机关，由它来领导全国，执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是十分适合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个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我们认为它是人民民主专政适当的体现。在现阶段的中国，为贯彻革命的目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对必要的。为着有效地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组织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使政府既有真正的民主基础，又有集中的权力，跟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虚伪议会政治完全不同。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形式，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必能圆满地推行。在组织法草案中，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的设置，既有很精密的分工，对于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特别注重，而在部、会、署之上又有各种委员会，分别负责作综合的指导，以这种组织严密的最高执行机关一定能够稳步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我们，一向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走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对于适当地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愿意完全接受。

第三个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我们认为这一个纲领，充分反映了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者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中的具体要求。这个纲领规定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具体任务，针对着新民主主义现阶段的要求实事求是，不唱高调，照顾到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利益，恰如其分切实可行。这个纲领和我们人民救国会同志们一向的政治信仰和主张，完全相适合。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制订和实施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而奋斗，现在当以更大的努力，为实现并保证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的充分执行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 陈其尤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本党出席本大会的全体同人，听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条文件的草案的报告后，非常满意。这三个文件，特别是共同纲领，都曾经过本党出席同人的仔细讨论，提出若干修正意见，并

参加各单位混合小组的数次讨论，因此，对于这三个文件最后修正案的内容，我们均已完全同意，没有可说。这里只打算把本党同人对这三个文件的重要性，略为说明，以供大会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的创举。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真是到了极点，“民不聊生”四个字也不足以形容这种惨状。要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从上述三种压迫之下完全获得解放，除了经过像人民政协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进行长期斗争，是无法取得的。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虽然还不是直接经过人民普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仅都是来自民间而且都是多年与反动派作过残酷斗争的人，所以都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召开以前，人民政协会议及其所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可以充分代表人民执行政权的。至于组织法上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设立，可将协商的精神带到各地方去，更是一个良好的设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实在是充分表现了上面的各项精神，所以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其次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这个法里，首先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样非常明显地把我们的团体和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规定出来，实是很适合于中国的客观环境。政府的组织形式，既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以没有什么三权相互制约的那一些叠床架屋的机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极有效率的而不是官僚形式的。至于中央政府的各部中，有关财政经济者竟达全部部门的半数以上，这充分表明了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我们惟盼大会能迅速依照这个组织法，选出中央政府，以进行全国的建设。

最后是关于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三个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可说是我们大家反复讨论后才获得的共同结论。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牺牲生命以追求的，它可说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本纲领在经济政策方面特别周详，这是十分正确的，其理由毋庸赘述。至于对于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严惩，对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所必须，本党以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革命，素来努力，且其力量雄厚，未可轻视。此次纲领对华侨利益，多已顾及，这是值得赞扬的。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

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我们非常感谢，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阶级及各民主人士协力之下，能够胜利完成。我们衷心地对上述三个文件予以全力的支持，并向到会各单位代表正式提议，希望全体一致迅速予以通过。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代表邓颖超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席团，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华全国民主妇联代表团决定由我向大会说几句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宣告着：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那个黑暗的旧中国已经死亡；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式诞生了。中国从此将展开人民的新时代，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民和我们妇女欢欣鼓舞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标志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从它包括的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方面的代表来看，是一个很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个广

大团结的力量，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特别是有了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克服革命发展中的任何困难，胜利地前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开辟了中国妇女在政治地位上的新纪录。这次出席大会的女代表六十九人，和男代表们共同商定建设新中国的大计。我们将看到全中国的妇女，在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里享受着各种平等自由的权利，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和全国人民共同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这是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们全国妇联热烈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完全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一经大会通过，我们必严格遵守，并为其实现而奋斗。

首先我们号召全国妇女，特别是各地妇女团体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好好学习政协重要文献，从而在全国人民中作广泛的宣传解释，团结一致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建设新中国，应是今后中国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我们号召全国妇女，把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热情和不怕顽敌、不怕困难的英勇气概，加以发扬，用来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农业的生产。争取迅速地恢复战争创伤进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以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促进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我们号召全国妇女要努力参加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组织妇女参加文化和科学的学习，提高妇女文化和科学的水平，以迎接将要出现的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我们满意共同纲领中关于妇女权利和保护儿童的规定。我们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注意保障共同纲领中所赋予妇女的各项权利，尽可能吸收妇女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但不是形式的和数目字的表现，而是使她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同时，我们妇女也必须努力学习政权工作，充实自己的各种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从而在政治上更提高一步，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我们妇女要把大会的决议变成实际的行动，来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毛泽东胜利的旗帜下前进！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席 代表冯文彬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席团、全体代表先生：

我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对于这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和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青年一代的光明前途，三十年来，无数万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革命青年，曾经不断地和反革命敌人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并有多少万青年，在斗争中丧失了青年的生命，有的是英勇地在火线上战死，有的是忠贞不屈地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和刑场上就义，现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正式召开了。中国青年三十年来为此而牺牲奋斗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了。现在写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等三个伟大历史文件中的全部条文，正是反映了这一伟大革命胜利的成果。因此，对于提交这次大会讨论的上述三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表示完全拥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团结各阶层先进青年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团结并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积极参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它的奋斗目标，正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将把坚决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毫无保留地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指针和每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天职。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内战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二九运动时代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时期西北和华北等解放区的青年救国会，抗战以后东北的民主青年联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青年同盟和民主青年联盟等革命青年组织发展而来，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但在工作作风上保持着上述各革命青年组织的战斗传统，在干部中也有不少是来自上述各革命青年组织。因此，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完全继承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大家也就可以完全相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一定能够像过去一样，经受得起任何严重的历史考验，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始终不渝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到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即将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拥护，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更主要地是要在行动上予以贯彻。

我们将号召军队中的青年团员，在统一的军事指挥之下，毫不懈怠地继续英勇作战，在最短期内扫荡并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同时积极参加国防建设。号召工厂和农村中的青年团员，要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并推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号召学校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知识，以便在学校毕业以后，能够有效地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号召在各种机关和人

民团体中的青年团员，积极工作，服从领导，模范地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动员和团结更广大的青年，踊跃参加中国各种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并和世界民主青年团结在一起，高举世界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的旗帜，向前迈进！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九三学社同人）很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个会议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百余年来的帝国主义买办统治，二十二年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法西斯反动统治政权，使之进入于独立、民主、和平、统一，达到富强康乐之途的会议。由这个会议，古老的，专制的旧中国，将变成为人民的民主的新中国！

由于这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最近这五十年来中国社会之急剧的变动，我们的先辈也曾有不少为民族生存寻求出路而牺牲奋斗的人物，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只可惜都被反动派阻窃，归于失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之正确的领导，坚强的努力，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英勇的奋斗，使中国革命达到这样迅速的，空前未有的

成就！现在离全部解放虽然还有很小一段路程，然而为时当亦不远，真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我们应当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和朱总司令致敬，向人民领袖毛主席致敬！

这次会议的人物，是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份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一九二五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九十二岁的老翁，也有二十一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相信，有了这样巨大的，空前未见的团结力量，不惟很快地肃清蒋介石反动残余，打到台湾，打到昆明，打到重庆成都，打到海南岛，我们也更相信是很能依照共同纲领，把新中国的基础，建立起来！

谈到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只就大会将要来讨论的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来说，它是经过了筹备会

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我们九三学社同人愿以全力拥护这种精神，并保证这个文件的实施！

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由于人民的力量之迅速无比的胜利，一方面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吓得发抖，同时也就加紧了他们的侵略阴谋，为争取最终的胜利，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团结，进一步的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团结在世界和平民主堡垒苏联一起，以强大无比的力量，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迷梦！我们高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 郭沫若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了。

这是人民中国的建国会议。大会要通过三个建国的人民大宪章，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得以参加这样隆重的开国盛会，我们感受着无上的荣幸，谨以最大的热诚庆祝大会的成功。

三个建国的人民大宪章：

“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

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集思广益的办法，经过了无数次的斟酌损益，反复商讨，而草拟出来的。我们认为确实是集中了全体代表的意见，字字句句都切合着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人民意志的总表现。我们要以最大的热诚，表示无条件的接受，彻底的拥护。

我们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没有什么党派的意见可以代表，因而仿佛都是个人。但我们要在大会上坚决地表示：我们决不是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引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

“民主的个人主义”本是旧民主主义的本质，发展到了今天，若不自觉，就会发展成为“美国主义”了。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本位，而戴上一顶“民主”的帽子。个人主义愈彻底，“民主”帽子便愈虚伪。美帝国主义在今天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的财权政权教育权文化权都被操纵在八大财阀集团极少数个人的手里，因而美国式的“民主”实际上是寡头专政了。

我们中国人里面，难道还会有那样糊涂的个人主义分子，甘心做美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吗？

这样的人和我们是不能两立的，我们是毛泽东的信徒，我们是民主的集体主义者。对于美帝国主义不存丝毫的幻想，也不存丝毫的恐怖。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已经戳穿了。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地戳，戳得它遍体鳞伤，不成形状。

我们是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因为没有党派的固定联系，似乎也就显示得都很自由。但我们再要在大会上坚决地表示：我们也决不是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

今天的所谓“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民主的个人主义”的别名。自以为站在中间，其实丝毫也不中间。美帝国主义正是欢迎这种人的，那里会“中”得起来呢？

但我们确实是相当自由的，而且自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要自由自在地跟着毛主席向一边倒。

我们在国内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切号召，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拥护，拥护，我们彻底的拥护。

我们在国际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平阵营的一边。我们要联合苏联，学习苏联，接受苏联人民的一切宝贵经验以从事建设。我们要向苏联看齐！学习，学习，我们彻底的学习。

中国人民从今天起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祖国。我们一定要以全生命来爱护我们的祖国，要努力实行大会的决议，遵守人民大宪章。迅速把我们人民的祖国建设成为坚强的和平堡垒。

我们的祖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许有任何外来的侵略和内在的反侧。我们要时常警惕着，击破内外敌人的阴谋，并消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有的祸害。

建国事业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艰巨的。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面前横梗着无数的困难。但我们坚决地相信，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是能够克服任何天大的困难的。

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盟邦苏联三十二年来的建国历史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坚决地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产力获得了彻底解放的工农大众是能够创造出无数类似神话的奇迹出来的。

集体主义的英雄时代到来了。新生的祖国，为了建国大业的迅速成功，在呼唤着她的英雄儿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民民主专政胜利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刘格平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全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我们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真正平等的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先生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

这次政协会议的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三个文献中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少数民族在内）长期斗争所得到的成果，我们觉得这三个文献是中国人民的灯塔，我们各少数民族要百分之百地、全心全意地拥护它，执行它。

各个少数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整个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的。蒋介石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勾结着各少数民族中的封建上层败类，如蒙族中的德王（德穆楚克）、白云梯；回族中的白崇禧、马步芳、马鸿逵等等，彝、苗民族中的土司；以及各民族中的恶霸、地主等进行屠杀、欺骗、奴役、分化和剥削压迫，使各民族的人民互相隔离，造成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少数民族人民，当然是要要求自决，要求脱离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统治。

在外蒙古独立自决后，他们的人民不是早已得到自由解放了吗？

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解放的地区，少数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我们看：

第一，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正在迅速地消灭着蒋匪残余，向着西北（也要迅速和新疆民主力量相汇合）、西南、华南及台湾等地区大进军中，要将这些少数民族内外的敌人和他们的帮凶们加以斩草除根，打倒障碍我们各民族人民团结的害虫们，使我们中国各民族人民能够团结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

第二，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各个少数民族人民，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解放区中，与整个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共同奋斗，打破了一切民族间的隔阂；很多的组织了人民武装部队，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第三，解放区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实行村、乡、街的自治，以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在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之下，可以参加人民解放军，可以组织民族的公安部队，以保卫各少数民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内蒙，自治区建立已经有两年多了，这是少数民族自治的最好范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民

族政策的具体表现。

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国民党匪帮和美、英（他们正在西藏搞阴谋）各帝国的挑拨分裂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今天，已经明确地规定在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各少数民族人民几百年以来，流血奋斗所争取的目标，今天终究实现了，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同意和拥护它，眼看着我们各个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国人民的光明幸福前途，我们有说不出的愉快和兴奋！

最后，各个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每个人都必须宝贵和珍视这个人民自己的大宪章，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必须协同人民解放军肃清各民族内外的人民公敌，粉碎并驱逐帝国主义的阴谋和侵略，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完成我们的和平建设。这个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方向，对于我们还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我们深信在共产党及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伟大的成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 代表马叙伦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位代表先生们：

全国人民渴望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开幕了。这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获得的。不但我们全体代表们在这儿欢欣鼓舞，开会的消息传到那儿，那儿的人民也大大地欢欣鼓舞。现在本席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敬致庆贺的热忱，并向领导人民获得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致敬！

我们认为那三个即将在大会上通过的，揭开中国新历史的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胜利的产物，我们热烈地予以拥护。

中国人民历来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一百多年来，更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受到它们的迫害，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可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曾经发动过革命，但是一旦政权在手，就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而且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了

领导权，压迫人民，屠杀人民，剥削人民。现在可不同了，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不但得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有着巨大的贡献，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给予一个极大的鼓励，对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统治，给予一个严重的打击。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业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以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及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我们相信：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与英美旧民主主义的资本家不同，英美资本家是专为个人利益打算，对于国计民生，他们是不管的。我们的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所以必能依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来合力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

在思想方面，我们更当注意所谓“民主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要是不把英美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加以澄清，这种思想就会残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广大地推行这种教育；大家要在密切团结之下，改造自己，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下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类似发生于匈牙利的国际大阴谋，在中国没有空子可钻！

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民主联合政府就要宣告成立。但是目前伟大的胜利，正如毛主席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在会议以后，我们还得认真地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共同纲领的精神和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特征，向群众传达，并贯彻实行会议的决议，使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权底下，更能团结一致，一面来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力量，铲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美帝和反动派的任何阴谋，无隙可乘；一面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 吴耀宗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们宗教单位的八个代表，包括了佛教、回教和基督教的代表，愿以最愉快最兴奋的心情，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重要文

件，表示我们完全的同意，和绝对的拥护。

我们所以同意和拥护这三个文件，是因为它们都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协商拟定的，而新民主主义，又是今日中国所必须遵循的唯一道路。

共同纲领指出解放后的中国的新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反动分子除外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也包括了少数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民。这个统一战线所要求的，不是一个超现实的纲领，而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纲领；它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使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上，共同前进。

这个统一战线将要使过去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形成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过去中国人民之所以不能团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斗争的意志，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领导，只是因为统治者对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恶毒办法。现在，我们看清楚我们共同的敌人了，那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也看清我们的共同的目标了，那就是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发现了共同的目标，认识了共同的敌人，我们就能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挥我们所固有的、巨大无比的力量。

统一战线也将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它使在它里面的每一个人民，都能在共同目标之下，参预国家的大计，表

达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共同纲领所采取的民主集中制，将保证这个民主原则的充分实现，因为它要人民政府向人民代表负责，人民代表向人民负责。

我们宗教信徒能够参加这次新中国建设的伟业，是一件荣幸的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们所以感到荣幸，感到愉快，就是因为在新中国建设的计划中，宗教占有了它所应当占有的地位。在共同纲领里面，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确定了的。我们宝贵这个自由，我们也决不辜负这个自由，或滥用这个自由。我们也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的联系，根本铲除。我们不但要在宗教里面做消毒的工夫，也要把宗教的积极作用，发挥光大。追求真理，服务人类，是一切高级宗教的共同目标。把这目标应用到今日的中国，和今日的世界，就是要扫除封建的残余力量，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战争的阴谋，同时拥护世界的永久和平，拥护民主建设的力量。我们愿意追随着全国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这个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林 伯 渠

(一) 新政治协商会议发起经过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曾根据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主席多年来的一贯主张，发表宣言，其中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他对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重申这个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且清晰地指出了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必然胜利的前途，申述了无产

* 这是林伯渠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领导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政策。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为后来各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奠定了基础。

自从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国内形势起了迅速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经济日益破产;其他方面,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成功,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的昂扬,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配合着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这个号召提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二)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经过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开始,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人士,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陆续来到解放区,以便和中共人士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新政协)的筹备事宜。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代表和已到

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获得了共同的协议。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决定：一、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三、筹备会组织条例推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关于新政协的性质及任务等问题的决定：一、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的时间定在一九四九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有二：一是共同纲领的制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十一月二十五日协议完成之后，国内形势已起了新的根本变化。继一九四八年秋季攻势的大捷，特别是东北的完全解放，人民解放军又获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的大胜利。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被完全消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后胜利，谁都不能不承认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一个空前胜利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

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并且为了击破美帝国主义的卵翼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对于这些号召，已经到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彻底支持（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对时局的意见》），解放区以外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有同样的表示。大家一致承认，中共的号召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样，就使得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一九四九年的头半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平、天津、汉口、南京、上海、太原等全国有数的中心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基本上可以说已被打倒，剩下来的只是消灭反动残余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统一全国之后，如何用最大力量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及巩固国防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了担负这两大任务，就必须迅

速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尽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在这样坚固团结的政治基础上，在时机上已完全成熟的条件之下，经各方协商之后，新政协筹备会于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宣告正式成立。

（三）三个月来筹备工作概况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会，亦即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共进行了五天，出席的计有新政协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中共此项主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代表人物等，一共是二十三个单位，一百三十四人。会议的整个过程，充分显示出和谐团结的气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第一天的开幕典礼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及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诸先生都分别发表了演讲。

这次成立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选出了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经常工作；常委会又推出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在八月下旬，李维汉跌伤，由林伯渠代理。

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筹备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设立

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即：一、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在成立会闭幕之前，第一小组很迅速地完成任务，拟定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的文件，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为：党派代表十四个单位，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九个单位，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个单位，六十人；团体代表十六个单位，二百零六人；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由常务会另行协议。这个“规定”当即获得成立会全体大会的通过。由这个“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代表性的广泛。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普选的、然而却是具有十分广大的代表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筹备会成立会于六月十九日闭幕。一切筹备的工作继续由常务委员会和上述六个小组分别担负起来。筹备工作的重心是放在三方面上的：其一是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文件；其二是推动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并协助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成立；其三是根据筹备会首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紧张工作，上述三项工作都已于九月上旬次第完成。各项文件在定稿以前，均经常委会和起草的各个小组，以及在北平的筹备代表和陆续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反复研究，缜密商讨。于是，常委会即于九月十七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中，审议并基本通过下列各项文件：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的草案及拟定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建议案等两项工作，则因尚未完成，会议决定把这两项任务移交给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原来负责该两项工作的两个小组，向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这一次会议又批准了筹备会常委会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

（四）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的决定的经过

对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与名单的问题，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处理 and 拟定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郑重研究。这样一共花了近三个月

的工夫，才确定了今天这张六百六十二位代表的名单，可以说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在协商并确定这个名单的时候，筹备会首先注意的就是政治上的严肃性。《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这是一个很明确、严肃的选择标准，必须严格遵守它，然后才能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和信任，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是筹备会在协商名单时所时刻记住的。

根据上述原则，筹备会所拟定的名单分为五类，除前项所述四类共四十五个单位，代表五百一十人，候补代表七十七人外，第五类为特别邀请代表，经筹备会常委会与各方面协商定为七十五人。这五大部分一共六百六十二人。人民政协有了这样广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的确可以说是代表性最完备的一张名单，的确可以说是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

根据《林伯渠文集》刊印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之下，中国人民日益坚强地团结起来，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继八年抗日战争打倒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仅仅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就已经基本上打倒了由美帝国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并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推进向全国的彻底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所召开的包括全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就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全国人民早已渴望着召开这样的一个真正由人民自己做主人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都鲜明地记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所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以中国人民为可欺，撕毁了它们在人民面前亲手所签订的一切协定，发动反革命的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召集了分裂的独裁的伪“国大”，妄想为所欲为。但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

从三年前的那个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到今天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划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短短三年间的历史事实，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穷凶极恶，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而建立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的历史，把这个真理证明得如此生动而丰富，使中国人民普遍地经过自己的经验认识了这个真理。这就保证了反动派的旧中国必然永远灭亡，而人民的新中国必然永远胜利。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制度，必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能够保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有力量随时击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中国企图复辟的阴谋，这个国家的政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残余势力实行专政的政权。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是经过了近一百年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牺牲奋斗而来的，特别是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战而来的。中国人民为了寻求和创造这样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已经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积极参加到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各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坚决地一边倒，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

国家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击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任何的挑衅，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为彻底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并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的未来而积极奋斗前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极为重大的，但是，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朱 德

各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通过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符合人民的意志。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全国广大人民和各国人民团体纷纷来电庆贺我们。这是表明在我们的事业中，支持我们的不但有全国的人民，而且有国际的友人。我们深深地感谢

他们的好意，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好意。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成功！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根据《朱德选集》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通过)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 这个宣言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其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已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题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协力，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

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況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

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今天已经闭幕。这个会议的主要工作有三类：一是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二是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三是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方法，制定了国旗。这个会议的伟大成就，会上各位代表的发言中已经说得很多。这里我们对会议所通过的三个文件说一些意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这个共同纲领规定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我们新生的中国，订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它保障了全中国人民广大范围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人必须遵守的若干义务。这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现在已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这个蓝图，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理想。事实上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理想，因为中国人民很久以来，特别是从抗日战争以来，就已在按照它的基本轮廓动手从事建筑，而且已经获得胜利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了。有了这个历史的基础，有了全国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有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一致支持，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忠贞保障，我们相信这个纲领一定能在最近数年内完满地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基本特点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见该法总纲第一、二两章）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政权。因为旧民主主义政权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是压迫广大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办法，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派别之间

争权夺利、分赃肥私；同时也是为了便利于统治阶级玩弄政治手腕，欺骗和压榨劳动人民。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也不完全相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苏联是一个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东欧各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则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参加。但是，在属于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为领导力量和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几点上，中国现在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却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相同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中，“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政府。”（见共同纲领第十二条和第十五条）这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的完成。这个统一战线具有广大的代表性，其组织成份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但又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一切反动分子不被允许参加。结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宗旨，已在该法的总则表明，就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这个统一战线内部实行高度民主，凡参加单位对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得保留至下届会议提出讨论，而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且有申请退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具有严格纪律，凡参加单位及代表对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分别予以处分。这个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地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团结的形式和协商的机关。它将由全体会议产生全国委员会，并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设立地方委员会，继续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二十八年来一向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次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即曾与孙中山先生建立这种合作关系，

因而能够推动中国人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举行胜利的北伐战争。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曲折发展，现在才在新的形势下，结成新的空前强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新的统一战线，有着中国共产党的被众所公认的领导地位，有着中国人民的空前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监督，而又有着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组织法作为共同信守遵行的章则，这就足以充分地保证它的巩固和健全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完成了很好的工作。它为全国人民制定了国家的根本大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放在我们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不折不扣地执行共同纲领和大会其他决议，使它们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是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忠实地履行这些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迅速地而又有步骤地成为国家的现实。是协助政府，把革命进行到底，肃清公开的和隐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治愈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使我们新中国富强起来。是爱护我们新生的祖国，加强人民民主政府的力量，和以苏联为首的爱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以保障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 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

三、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日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关于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令

毛 泽 东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国徽图案说明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国徽使用办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徽在下列各机关悬挂：

1. 中央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及其直属机关。

2. 地方机关：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
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省、市、县人民政府及人民行政公署。

3. 驻外国使馆及领事馆。

二、国徽之悬挂：

1. 国徽应悬挂于机关大门上方正中处；

2. 国徽之悬挂于礼堂者，应悬挂于主席台上方正中处。

三、国徽之其他使用：

1.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有关荣誉之文书证件（如奖状、勋章及奖章证书等）、外交文书（如国书、条约及全权证书等）及外交部所发各种护照之封面，均加印国徽；

2. 外交部及驻外各使领馆所用之钢印、戳记中间应雕刻国徽；正式公文用纸应加印国徽；

3.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总理及外交部部长与驻外各使馆馆长以职位之名义对外所用信封、信笺、请柬等上面，均加印国徽；

4. 外交部及驻外各使领馆得于外交官制服、信封、信笺及其他器具用品（如餐具、文具等）上之适当地方，加印或镶嵌国徽，其详细办法，由外交部拟订经政务院核准后施行；

5. 除以上列举外，如尚有其他必要用途时，由使用机关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批准后，始能使用。

四、国徽不得用于下列场合：

1. 私人婚丧庆吊礼节中的点缀；
2. 工商业品的标记、装饰、广告、图案；
3. 机关、学校、团体的证章、纪念章及其他徽章；
4. 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

国徽图案制作说明

1. 两把麦稻组成正圆形的环。齿轮安在下方麦稻秆的交叉点上。齿轮的中心交结着红绶向左右绾住麦稻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部。

2. 从图案正中垂直画一直线，其左右两部分，完全对称。

3. 图案各部分之地位、尺寸，可根据方格墨线图之比例，放大或缩小。

4. 如制作浮雕，其各部位之高低，可根据断面图之比例放大或缩小。

5. 国徽之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之底子及垂绶为红色；红为正红（同于国旗），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

根据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常务委员和秘书长名单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 主席：毛泽东；(二) 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三) 常务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李济深，王昆仑，蒋光鼐；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马叙伦，张奚若；杨秀峰，乌兰夫；朱德，林彪；刘宁一，邓颖超，冯文彬；沈雁冰，梁希；吴鸿宾；陈嘉庚；邵力子。(四) 秘书长：李维汉。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¹⁾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副总理、
政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

副总理：(四人)：

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

陈云 (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 (无党派民主人士)

黄炎培 (民主建国会)

政务委员：(十五人)：

谭平山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谢觉哉 (中国共产党)

罗瑞卿 (中国共产党)

薄一波 (中国共产党)

曾山 (中国共产党)

- 滕代远 (中国共产党)
章伯钧 (中国民主同盟)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
马叙伦 (中国民主促进会)
陈劭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王昆仑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罗隆基 (中国民主同盟)
章乃器 (民主建国会)
邵力子 (国民党民主派)
黄绍竑 (国民党民主派)

秘书长：

- 李维汉 (中国共产党)

副秘书长：(五人)：

- 齐燕铭
许广平
郭春涛
孙起孟
辛志超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及委员名单

主任：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副主任：（四人）

彭真（中国共产党，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会书记）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教授）

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

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委员：（四十七人）：

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罗荣桓（最高人民检察院署检察长）

吴溉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志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六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署副检察长）

蓝公武（最高人民检察院署副检察长）

谢觉哉（内务部部长）

武新宇（内务部副部长）

陈其瑗（内务部副部长）

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

史良（司法部部长）

- 李木庵 (司法部副部长)
- 张曙时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许德珩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陈瑾昆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李维汉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 乌兰夫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刘格平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赛福鼎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陶希晋 (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
- 吴玉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 张 文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 王葆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 李任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 周鲸文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 刘王立明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 叶笃义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 郭冠杰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
- 郭则沉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
- 黄琪翔 (中国农工民主党)
- 陈铭枢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 郭春涛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 许宝驹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 陈演生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
- 谢雪红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

- 易礼容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李秀真 (农民劳动英雄)
邓颖超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廖承志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
邓初民 (教授)
吴耀宗 (宗教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
周善培 (实业界)
颜惠庆 (慈善界)
林仲易 (律师)
章士钊 (律师)
江庸 (律师)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及委员名单

主任：

陈云 (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二人)：

薄一波 (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马寅初 (无党派民主人士，浙江大学校长)

委员：(五十人)：

李富春 (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贾拓夫 (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邓子恢 (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曾 山 (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纺织工业部部长)
叶季壮 (贸易部部长)
陈 郁 (燃料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 (食品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轻工业部部长)
滕代远 (铁道部部长)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梁 希 (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
李立三 (劳动部部长)
南汉宸 (人民银行行长)
孔 原 (海关总署署长)
戎子和 (财政部副部长)
何长工 (重工业部副部长)
钱之光 (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宋裕和 (食品工业部副部长)
薛暮桥 (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宋劭文 (中央计划局局长)
曹菊如 (中央计划局副局长)
钱昌照 (中央计划局副局长)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

- 孙晓邨 (中央计划局副局长)
范子文 (中央财经人事局局长)
钟 林 (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
孟用潜 (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冀朝鼎 (中央外资企业局局长)
梅龚彬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章乃器 (民主建国会, 上川企业公司常务董事)
胡厥文 (民主建国会, 新民机器厂总经理)
盛丕华 (民主建国会, 上海上元企业公司经理)
包达三 (民主建国会, 上海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
俞寰澄 (民主建国会, 江南纸厂董事长)
冷 通 (民主建国会, 江苏四益农业育种场董事长)
吴羹梅 (民主建国会, 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
李士豪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
千家驹 (中国人民救国会, 教授)
李民欣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
刘子久 (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罗叔章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部副部长)
陈叔通 (工商界, 商务印书馆董事)
简玉阶 (工商界, 中国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侯德榜 (工商界,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
胡子昂 (工商界, 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
周苍柏 (工商界, 华中化工厂董事长)

周叔弢 (工商界, 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
宋棐卿 (工商界, 天津东亚企业公司总经理)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及委员名单

主任:

郭沫若 (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任: (四人):

马叙伦 (中国民主促进会)
陈伯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
陆定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雁冰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 (四十二人):

周扬 (文化部副部长)
丁燮林 (文化部副部长)
钱俊瑞 (教育部副部长)
韦恂 (教育部副部长)
李德全 (卫生部部长)
贺诚 (卫生部副部长)
苏井观 (卫生部副部长)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名单

- 李四光 (科学院副院长)
陶孟和 (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科学院副院长)
胡乔木 (新闻总署署长)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徐特立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柳亚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张东荪 (中国民主同盟, 教授)
费孝通 (中国民主同盟, 教授)
吴晗 (中国民主同盟, 教授)
刘清扬 (中国民主同盟, 北京新中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
潘光旦 (中国民主同盟, 教授)
李达 (无党派民主人士, 教授)
符定一 (无党派民主人士, 文字学家)
沈志远 (中国人民救国会, 教授)
陈此生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
蒋南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副书记)
沈兹九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教部部长)
谢邦定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欧阳予倩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丁玲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

- 会常务委员)
- 田 汉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 阳翰笙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 巴 金 (作家,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钱三强 (自然科学工作者, 教授)
- 陈鹤琴 (教育工作者,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 江恒源 (教育工作者, 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
- 李步青 (教育工作者)
- 艾思奇 (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授)
- 翦伯赞 (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授)
- 侯外庐 (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授)
- 钱端升 (教授)
- 曾昭森 (教授)
- 雷洁琼 (教授)
- 沈体兰 (教授)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及委员名单

主 任:

谭平山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副主任：（二人）：

刘景范（中国共产党，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潘震亚（律师，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

委员：（十五人）：

张秀岩（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

张慕尧（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

朱蕴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韩兆鹗（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人民政府参议）

董鲁安（无党派民主人士，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院副院长）

张难先（民主人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

何燏时（无党派民主人士，杭州市人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主任）

宁武（国民党民主派，东北人民政府委员）

郭任之（无党派民主人士，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

安子文（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许立群（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刘达潮（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丘金（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帅孟奇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部长)
萧 明 (北京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

政务院各部、会、院、署、
行负责人员名单

内 务 部

部 长：谢觉哉 (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
副 部 长：武新宇 (中国共产党，原晋南行署主任)
陈其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外 交 部

部 长：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
副 部 长：王稼祥 (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李克农 (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
章汉夫 (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公 安 部

部 长：罗瑞卿（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副部长：杨奇清（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

财 政 部

部 长：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副部长：戎子和（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

贸 易 部

部 长：叶季壮（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副部长：姚依林（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

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重工业部

- 部长：**陈 云（中国共产党，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 副部长：**何长工（中国共产党，原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
- 钟 林（专家）
- 刘 鼎（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企业部副部长）

燃料工业部

- 部长：**陈 郁（中国共产党，原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燃料工业处处长）
- 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
- 吴 德（中国共产党，原中国共产党唐山市委员会书记）

纺织工业部

- 部长：**曾 山（中国共产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副部长：**钱之光（中国共产党，财政经济工作者）

陈维稷 (民主建国会, 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张琴秋 (中国共产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事业部部长)

食品工业部

部 长: 杨立三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

副部长: 宋裕和 (中国共产党, 原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轻工业部

部 长: 黄炎培 (民主建国会)

副部长: 杨卫玉 (民主建国会)

龚饮冰 (中国共产党, 原上海中国银行经理)

王新元 (民主建国会, 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

铁 道 部

部 长: 滕代远 (中国共产党, 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

- 副部长：吕正操**（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
武兢天（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
石志仁（专家）

邮 电 部

- 部 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
副部长：王 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讯总局局长）

交 通 部

- 部 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副部长：李运昌（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河军区司令员）
季 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农 业 部

- 部 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

副部长：罗玉川（中国共产党，原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吴觉农（专家）

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林 垦 部

部 长：梁 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部长：李范五（中国共产党，原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

水 利 部

部 长：傅作义（起义将领）

副部长：李葆华（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

劳 动 部

部 长：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

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
毛齐华（中国共产党，原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

文 化 部

部 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部长：周 扬（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教 育 部

部 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副部长：钱俊瑞（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韦 悫（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

卫 生 部

部 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副部长：贺 诚（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

苏井观 (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

司 法 部

部 长: 史 良 (中国民主同盟, 律师)

副部长: 李木庵 (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绍禹 (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 张曙时 (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许德珩 (九三学社, 教授)

陈瑾昆 (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委 员: (十五人):

沈钧儒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志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六如 (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谢觉哉 (内务部部长)

史 良 (司法部部长)

李木庵 (司法部副部长)

- 何世琨 (中国农工民主党)
李 达 (无党派民主人士, 教授)
孟庆树 (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吴昱恒 (律师)
王之相 (教授)
戴修瓚 (教授)
吴传颐 (教授)
李祖荫 (教授)
李光灿 (教授)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维汉 (中国共产党,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副主任委员: 乌兰夫 (蒙族,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刘格平 (回族, 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

赛福鼎 (新疆维吾尔族,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委 员: (二十二):

- 张 冲 (彝族, 前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吴鸿宾 (回族, 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奎 璧 (蒙族,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民政部部长)
朱早观 (苗族,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参谋)

长)

天 宝 (藏族, 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巴迭尔汉 (新疆哈萨克族, 新疆民族军阿山骑兵团团长)

阿里木江 (新疆乌兹别克族,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

朱德海 (朝鲜族, 吉林省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王国兴 (黎族, 琼崖黎苗民族自治区副主任)

田富达 (高山族)

刘 春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杨静仁 (回族,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吕振羽 (教授)

翁独健 (教授)

马思义 (回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骑兵团团长)

鲜维峻 (回族, 陕甘宁边区政府三边专员公署副专员)

马玉槐 (回族, 北京市回民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悦丰 (蒙族, 伊克昭盟军区司令员)

王再夫 (蒙族,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公安部部长, 内蒙军区副司令员)

- 特木耳巴根（蒙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财政部部长）
札喜（藏族，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郭锐（藏族，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华侨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副主任委员（四人）：

李任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廖承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

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工商界）

委员（四十五人）内十六人暂不发表：

陈嘉庚（南洋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

司徒美堂（美洲致公堂监督）

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戴子良（中国民主同盟东南亚支部执行委员）

费振东（苏门答腊棉兰华侨总会主任秘书）

蚁美厚（暹罗中华总商会常务委员）

黄长水（港菲出入口商会理事长）

- 周 铮 (旅暹琼崖同乡会主席)
侯寒江 (教育界)
庄明理 (中国民主同盟槟城分部副主席)
赵令德 (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
林 棠 (纽约洗衣工人联合会总干事)
张殊明 (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财委会委员)
叶剑英 (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张云逸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张鼎丞 (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 (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叶 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
李初黎 (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连 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第三室主任)
许敬诚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第三室副主任)
陈任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澳洲分会筹备主任)
王雨亭 (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财务委员)
蔡廷锴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
彭泽民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官文森 (致公党中央委员)
王任叔 (前苏门答腊华侨总会联合会顾问)
邵力子 (国民党民主派)
萨镇冰 (海军耆宿)

科学院

- 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 副院长：**陈伯达（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
- 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 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 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大学校长）

情报总署

- 署长：**邹大鹏（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

海关总署

- 署长：**孔原（中国共产党，原中共抚顺市委书记）
- 副署长：**丁贵堂（专家）

新闻总署

- 署 长：胡乔木（中国共产党，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 副署长：范长江（中国共产党，原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
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出版总署

- 署 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 副署长：叶圣陶（作家，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银行

- 行 长：南汉宸（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 副行长：胡景翼（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银行副总经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
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名单

毛泽东 (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五人)：

朱 德 (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刘少奇 (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 (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彭德怀 (原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程 潜 (起义将领)

委 员：(二十二)：

贺 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

刘伯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陈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东
军区司令员)

林 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
军区司令员)

徐向前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

叶剑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

聂荣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

- 高 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粟 裕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 张云逸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副司令员)
- 邓小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 李先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饶漱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 习仲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 罗瑞卿 (公安部长)
- 萨镇冰 (海军耆宿)
- 张治中 (国民党民主派)
- 傅作义 (起义将领)
- 蔡廷锴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 龙 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刘 斐 (国民党民主派)

总参谋长：徐向前

副总参谋长：聂荣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副院长及委员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中央常务委员）

副院长（二人）：

吴溉之（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军法处处长）

张志让（教授）

委员：（十四人）：

陈绍禹（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

朱良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冯文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许之桢（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李培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费青（教授）

贾潜（司法工作者，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

王怀安（司法工作者，原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秘书长）

陈瑾昆（司法工作者，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吴昱恒（律师）

闵刚侯（律师）

陆鸿仪（律师）

沙彦楷（律师）

俞钟骆（律师）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副检察长及委员名单

检察长：

罗荣桓（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
政治委员兼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

副检察长：（二人）：

李六如（中国共产党，原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
部长兼人民法院院长）

蓝公武（无党派民主人士，原华北人民政府
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委员：（十一人）：

罗瑞卿（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
兵团政治委员）

杨奇清（中国共产党，原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
副部长）

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
员）

李锡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
员）

周新民（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陈少敏（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
员）

许建国（公安工作者）

汪金祥（公安工作者）

李士英（公安工作者）

卜盛光 (公安工作者)
冯基平 (公安工作者)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办公厅主任及副主任名单

主任：齐燕铭
副主任：余心清
周新民
乔冠华
罗叔章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其中的政务院总理、外交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的。

六

施政方略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 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

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机关堆积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的所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有些城市，如石家庄，领导机关一去，也想先将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人民政权的支柱和党的耳目，但执行的时候，却毫无准备而冒失地召开工厂的职工大会，城市的贫民大会，马上成立各厂工会和街道的贫民组织，结果被国民党特务钻了进来，控制了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反而使我们与群众隔离。另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在城市刚解放后，我们为建立革命秩序，维持人民治安，需要召开各界或各业座谈会，报告我们政策并征

询大家意见，但这是临时性质，不能解决经常与群众联系的问题。有的城市，已成立临时参议会，但这一组织形式，容易给人以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的不良印象，而在成分上，因是聘请作参议，很容易偏重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在职权上，因是咨议机关，对群众的联系也就不会密切。因此，为纠正上述这些联系群众的弱点，特规定成立各界代表会的办法如下：

一、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当城市初解放后，即使党在该城市原来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但究因是地下党的关系，不可能有广大群众的联系，故不仅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时不易召开，即成立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也须根据我们原来工作的有无好坏，分别先后进行，不能一下组织好。而各界代表会，则可根据我们在该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动员的力量，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各界代表会，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

二、各界代表会的人数不拘，但每个代表应具有团体的代表性，如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卫戍部队，大者各出一、二人，小者共出一、二人；各革命团体如秘密的工会、学生会和妇女青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如在未解放前受反动压迫的各党派，均可出代表一、二人；旧有的商会或其他有代表性的团体如非反动者，亦可容许其出一、二

人。这些代表，均为聘请，并须在我军入城前后，经过调查研究，方能确定人选，其中应以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占多数，但必须尽可能地多请原与群众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切忌尽请一些从外边派去工作的干部。如查明某人系属反动分子，即使有某一为我承认之合法团体推荐，亦可拒绝，如已聘请，亦得撤消。在某些团体或商店、作坊和贫民的街道组织尚未组成或尚未健全的时候，可以暂缓聘请其中的人为代表。在各人民团体，首先是工会，学生会的组织已经健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代表可以经过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的群众大会推选，然后加以聘请，以增强其代表性。

三、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付与的。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各界代表会报告，并经过其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定，付诸实施。各界代表会并可向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提出各项市政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各界代表须负责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街道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报告和解释这些政策和设施的内容，并向各界代表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必要时，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亦得派代表直接向上述各单位的群众大会做报告。在各界代表会开会时，得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允许，可邀请有代表出席的团体单位派人旁听，以观察其代表是否尽职。

四、各界代表会的开会日期，在城市初解放时，每星

期应有一、二次，每次应不少于三小时。在开会时，军管会和市政府必须有负责人出席报告和参加讨论及解答问题，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委员和高级职员均有权参加各界代表会会议。

五、各界代表会可选出主席副主席，并组织秘书处以执行日常事务。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约束之权，但我们如能运用得好，则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保持军管会和市临时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我们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探知群众的要求，并取得群众的协助来解决各项困难问题，例如解决煤粮缺乏问题及煤粮配给办法等，均可经各界代表会讨论来获得解决。因此，我在各单位的党的组织和工作人员应力争取得群众信用，使党能经过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聘请我们同志为代表，并从而培养将来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使党在群众中能树立起坚强的领导作用。

六、各城市解放后，人民代表大会何时召开，须视军管期间我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及人民群众的组织情况而定，但最主要的还看我们运用各界代表会这一组织形式的成效如何。考验我们能否管理好城市的决定力量是党的政策掌握了群众，也就是说群众拥护了党的政策。要使这一决定力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自然配合这一组织形式联系群众、传达党的政策、反映群众意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

见的，尚有党所领导的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等人民团体与党的报纸和广播及其在群众中的通讯员等等，但最直接而又最广泛的，还是这一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前身——各界代表会的政权和半政权的组织形式。望各地根据这一规定，善为运用，并创造出新的经验，随时电告中央。

中 央

戊 陷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刊印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刘 少 奇

毛主席的报告很好，许多同志的发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现在讲讲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 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

*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这是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

城市工作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城市的接管问题。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虽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北平许多私人企业至今未开工。私人企业不开工，有的是确有困难，但是有些资本家想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这也是事实。因此，我提议，在大城市中，如南京、上海，对于私人企业，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者、捣蛋怠工者，原则上派人去监督，派军事代表去。现在一般地公布监督私人企业的法令是不适宜的。但对派去监督私人企业者，应给他和该企业以详细的指令。在派出之先，还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了解情况（也可找资本家谈），搞清楚问题，有了把握再派去。对军事代表的职权，在指令中应有具体规定，如厂方应对代表做详细的报告，不准隐瞒；要组织工会，教育工人；要防止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对于工人罢工，党在原则上是无权禁止的。但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才能保障生产。自然，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如原料、销路等问题，也是需要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接收后应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当然有些企业是交不出去的，如上海的纱厂，交给地方是不能正常生产的，但

中央政府又尚未成立，也无人接管，所以上海市仍应设法管起来。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应对接管沪、汉等大城市的大企业进行准备。

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

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关于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

必要的优待。例如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自然，工人过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在极端困难时，工人生活虽苦，而我们的生活更苦，那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他们的谅解，获得他们的支持。陈云同志在沈阳对工人讲，不仅工人烧碎煤，我们也烧碎煤，好煤拿去开火车运军队打仗了。好煤是用来开火车对呢，还是用来烧火对呢？工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就没有怨言了。陈云同志这样讲是很对的。

自然，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给工人阶级以希望，那末工人就会说，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你们与国民党一样。我们必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目前，有许多农民说，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粮，这不公平。这些话，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么？工资未增加，工时未减少，种种情况与过去差不多。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应向未来看。当然不能像对农民一样，允许工人“工者有其厂”，但应注意宣传解释，到将来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到北平后就要召集全国的

专门会议，或先从某一个企业部门研究解决之。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 关于教育工人问题。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对于旧的行会组织，应加以改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旧职员，基本上不动。旧政府机构是要打烂的，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除特殊技术需要者外）。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政府机构是不对的。

总起来说，不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办短期训练班，一两个月毕业，三四个月毕业；再就是上大课、夜校等。开始一个时期，上大课是主要的。李立三同志说，沈阳解放以来，住过训练班的职工有三千人，上过大课的有三万人。至于留用的旧职员，当然应受训练。

我们现在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政策是要讲的，但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俘虏兵经过诉苦运动，一个星期就变了，掉转枪头，英勇杀敌。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这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津解放后，进行教育的条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热情，找我们上大课，虽然下工后很疲劳，上大课还是来。如果进城半年还不搞教育，工人热情就会冷下来。所以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像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课程大约就是这四门。

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提高觉悟。接着就要搞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组织上有了工会，还有大量党员，那末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我们许多负责干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们，他们急于要了解我们。所以，负责同志进城后就应该和工人见面，向工人讲话，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应该发一个关于组织工会的决定。全国产业工人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千万。应规定只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才可以加入工会，而不要把小手工业者也搞进来。可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工会等。原则上要把所有的

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工人代表会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机关，均可成立代表会。机关、工厂的代表会合起来，就是市的工人代表会议。

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可在工会成立以前就成立，开始是讨论工人本身的生活问题，逐渐到工厂的生产问题，再到市政等问题。市工人代表会议可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个步骤。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和意见，均可向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解释宣传，让代表们讨论。工人代表会议搞熟练了，然后搞学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会，搞几个月，搞年把，再发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的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厂长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取得同意，而后下达，则容易贯彻得多。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地搞。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迟，就不利于反官僚主义，不利于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现在各地应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

根据《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任 弼 时

一 目前形势与任务

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要用最后的努力来实现这一全国胜利，同时又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个建设的首要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巩固中国的独立与统一。

代表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想借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来达到它削弱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目的。它对反共是积极努力的，而对抗日则是消极的，借抗日之名以积蓄力量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这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特别是美

国帝国主义的意图是相吻合的。但是，国民党借日本的力量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希望并未能实现，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之下，成了中国人民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没有它，中国早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自己。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终于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陆海空军兵力总共有四百三十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一十八万人，既没有空军海军，大炮也为数极少。国民党满以为依据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各种帮助，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并曾预计在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内定可消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虽占劣势，但是执行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因而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解放军，与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努力相结合，经过一年艰苦的防御战斗之后，在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即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就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反动军队则由进攻转为防御。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解放军除大部收复了在第一年所失去的土地、城池之外，并且把战争引到长江以北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从缴获中培养了自己的炮兵，建设了自己的工兵，因而也就能攻克一批中等城市，如石家庄、四平、洛阳、潍县、开封等，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军威大为提高了。

到了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不可比拟的，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反

动军队。到现在为止，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共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四百九十五万人。现在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队已经由四百三十万人降到只有一百一十战斗部队及数十万后勤机关部队，这些残余的战斗部队中许多是经过一次或一次以上消灭后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既很薄弱，而且散布在迪化到台湾这一非常宽广的区域之内。人民解放军则于同时期内由一百二十八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以上，其装备则毫不亚于美国装备的国民党的最优良的陆军。

与军事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的地域与人口也扩大与增加了。据三月初统计，现在解放区的面积有二百六十万一千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整个东北和几乎是整个长江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都已被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万万以上。在包括一万万人口以上的地区之内，已经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在这种地区内，过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说是已经被消灭了。在广阔的解放区之内，有相当的轻重工业、铁路运输的基础，有极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源，如煤、铁、粮食、棉花、盐、石油、木材等。分布在这一广大的解放区内及三百多万军队中，有三百万共产党员。在解放区内，有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工人、妇女、青年及民兵。解放区内工业农业正开始恢复，金融物价也比较国民党区域为稳定。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大为增加，人民胜利的信心非常坚强，解放军的士气甚为高涨。

人民力量的胜利发展，亦即国民党力量的失败与缩小。国民党随着在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日益土崩瓦解起来。发行不久的金圆券，已经降到伪法币的地位。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人民面前，遭到从来未有过的孤立。一切过去还动摇着的中间力量，现在已经更加靠近于人民方面。总而言之，人民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对比，在最近一年之内是起着对人民方面绝对有利的变化。经过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在基本上被解放军所打垮。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援助，也不能改变国民党灭亡的命运了。

最后肃清国民党存留的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使革命在全中国获得彻底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目前应当继续努力不可松懈的工作。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下列方式：一种是继续以战争的方式，就是所谓天津方式，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全部歼灭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有把握做得到的。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连国民党反动派在内，都会相信这一点。另一种是按照毛主席在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就是所谓北平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没有如天津方式那样干脆痛快，那样能迅速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但是可以避免破坏和人力的消耗。^{〔1〕}

对于这两种解决中国残余反动势力的办法，我们欢迎第二种，但同时必须准备第一种，而且只有痛击一切反抗

和平解决的部分，才更易于争取用和平方式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要努力使南京政府迅速交出自己的权力，以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实现中国的完全解放与统一。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见，我们离在全中国胜利的时期已经不远了。这种胜利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对世界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比重上，会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然而我们要认识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指示的深远的意义，要懂得在军事上完全打败国民党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完全摧毁国民党一切反动统治机构，这是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这还不等于中国就已经最后地达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毛主席着重指出说：“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完全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估计，“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百分之十左右的工业，因为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影响，相当部分已被破坏。我们要使中国在经济上达到完全独立，则不独要努力争取被破坏的工业能够在三年五年

内恢复，而且要有计划地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由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比重，使中国有相当强大的机器制造业，生产大量发展工矿交通业所需要的机器和车船；而且要达到中国自己的工业能够生产国防上需要的大炮、坦克以及飞机等。到了那时，才可以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达到独立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上也具备有足够力量来保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只有工业发展起来，生产技术随着提高，生产成本日渐减低，能出产极大数量的成品，才有可能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自己和生活水平，才更能巩固工农间的联盟，真正发挥城市领导乡村的作用，才是替将来转向社会主义打下了强固的经济基础。

在恢复和发展工业，努力使中国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首先使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一切条件。为此，我们必须把可能积累的资本，多多地投入国营公营企业里去。我们必须改造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官僚资本手里接收过来的企业，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东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创立新的适用的东西，使企业管理、劳动组织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旧有技术干部，只要他们能改变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欢迎的。更为重要的，我们要从熟练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中有计划地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

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在恢复和发展工业中，对于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企业，应当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党的这个政策，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完全必要的。私人资本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使它走出国民经济需要的轨道以外，但惧怕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加以不适当的限制，也是不对的。

由于战争迅速胜利发展，不仅使过去被敌人分割的解放区打成为一片，而且有了一批大的和大批中等的城市，还有大批城市很快就要解放。在这些城市中和其周围，集中有许多工商业和学校，各个城市之间，有铁路和航运联络着。这种形势，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的新方针。过去由于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盘据，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削弱封建（减租减息）直到消灭封建（分配土地）的斗争，组织军队，用农村来包围城市，然后去夺取城市的政策，事实上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存在过的只搞城市忽视农村的观点，事实上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新的形势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和工作重心。过去以农村为重心的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来领导乡村的新时期。我们向长江以南进军时，也会是先到城市，然后向农村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组织、领导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一道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

僚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要把城市的文化教育工作恢复、改革和建立起来，使大批学校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材。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一切其他工作都应当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其而服务。如果我们进到城市，不去依靠工人阶级，不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其中心的工作，而去依靠贫民或其他阶级，忙于其他的比较不关重要的活动，那一定会要使全盘工作受损失。

我们说，工作重心现在应该由农村移到城市，应该抽调一定力量来加强城市工作，但如果因此而丢掉乡村，把乡村工作力量都移到城市里来，那也是错误的，也是必须防止和要反对的。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住在农村，他们中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是为着要发展工业，也必须使农村能够供给大量的原料，如棉花、大豆、花生、烟叶、麻等；须要农村供给城市大量的粮食。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数量上既然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这就说明在今天我们还要依靠农民大量生产粮食和原料。解放区农村的封建势力已被肃清或正在肃清中，农业生产力有发展的充分余地。我们要努力去领导农民提高农业技术，改良水利、种子、肥料等，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在农村中，要去组织大量的农民认为需要的生产的、消费的、供销的合作社。我们要大大提高农业产量，还因为我们要利用它来与外国交换为着恢复和发展工业必需的机器。此外，我们还要在农

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工作，须要获得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帮助，须要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和努力，才有可能把它做得好。

如上所述，我们虽然接近于全国的胜利——这也还要不骄不躁地认真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完成——然而要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则还需我们极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一切以为革命快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只有这样，再努力十年到十五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是最终地巩固起来了，那时我们有可能和人民一道，过着更加充裕更加文明的生活。

我们的前面还有如此艰巨的任务，而旧社会交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贫乏与落后。虽然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发生任何的悲观。在具有如此勇敢、如此勤劳的四万万几千万人民力量的基础之上，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加上苏联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我

们有根据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比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会要更为迅速的。

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线日益强大。苏联及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经济，都已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日益改善，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力量。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民主阵线则日益困难起来。战后称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虽在努力用造成新的战争恐怖的方法，争取尽量推迟其国内经济危机之到来，然而危机的征象已在出现。美国援助蒋介石在中国进行的反共战争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将要完全冲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锁链，东南亚几万万人在中国革命影响下，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美国在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把西欧的经济引到了绝路，使受援助的国家对美国的附属性越来越大，因此也遭受各该国人民的越来越大的反对。美国本国因经济大危机的迫近，某些企业开始减缩，工人生活日趋降低，失业恐慌随着增长，人民民主力量也逐渐加强。最近，美英又在用“北大西洋公约”，将来还企图要用什么太平洋公约^{〔2〕}等办法，来加紧准备战争，加强美国对于受“惠”国的控制，以求逃脱危机。然而全世界人民连美国人民在内，是不愿战争到来的。只要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民主力量保持充分的警惕与努力，战争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帝国主义者真的挑动了战争，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也有把握战胜并消灭帝国主义势力。这一切都说明今天

的国际环境,是极有利于我们中国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的。一切过高地去估计帝国主义这个敌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全世界人民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 加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

中国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着自己很光荣的历史。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抗战以后的民主爱国运动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三十年来的近代革命史,证明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九二六年说:“在中国,青年问题现在是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一切这些力量,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进展。”〔3〕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些论断,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青年其所以能起这种作用的原因,也正如斯大林所分析:“我们应当知道,没有那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是如此的深刻和迫切,也没有那一个感觉需要与这压迫作斗争是如此尖锐和沉痛,如像中国的青年一样”。〔4〕

我们现在接近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但要求我们作最后的努力；我们面前又放着建设新中国的极为严重的历史任务，没有全体人民的动员与努力，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动员人民力量的时候，必须着重动员青年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作用。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当前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使青年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军的最后进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各地；另一方面使广大青年积极努力参加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特别努力参加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为着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特在今年一月一日通过决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群众的积极分子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发布这一决议，是经过很慎重的考虑的。为了取得建立青年团的经验，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就已开始在各地试办，这些试办的经验，证明青年团的组织是必要的。我们相信，这一决议各地共产党的党委必定会坚决执行。

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更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青年救国会——包括几乎全体青年的那种青年组织，虽在抗日运动初期，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抗战后期就不能满足青年群众的需要了。现在如果没有比较坚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那么就不易团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的意志和行动，青年运动就势必陷于涣散无力的境地。

同时，在目前全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之下，也很迫切地要求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进步青年的积极分子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社会基础，应当比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它虽应以工农青年及革命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但又须能够团结全国各阶层中的进步青年，并把其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应当有系统地进行生动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每个团员具有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这种规律而去奋斗。有这种觉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必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在最后解决敌人，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得力助手。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应该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工作之一。在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其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年学生的狭小范围内，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中的工作上，而且主要地是要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在已经掌握了大城市的今天，正当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时，需要特别加强青年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并要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学徒中发展团员，要求每个重大企业或每条铁路上，每个矿山中，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使青年团组织中青年工人成分的比重增加。在不放松农村青年工作的原则下，把青年工作的主要阵地放到城市各企业的青工工作中去。

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作为遵守劳动纪律、节省生产原料的模范者。在学习技术和手艺中，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要能起先锋带头作用。青年工人团员应成为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工厂中的青年团，除接受党的支部领导之外，必

须和职工会保持正确关系。在组织上，青年团和职工会都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但是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应进行工作，使青年工人自觉自动地遵守和响应各公营企业工厂或职工会的各项规定和号召；而职工会在确定有关青年工作的问题时，应当征询和尊重青年团的意见。同级职工会的青工部部长或副部长，最好是由青年团的工作人员来担任。

在农村中，青年团应当继续有重点地去发展团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中农中的优秀青年入团。新富农及农村知识分子中的进步觉悟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入团。但必须保障团的领导成分主要是放在雇农、贫农出身的青年身上。在实行过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村青年团员，应成为增加农业（包括副业）生产的积极分子，领导广大青年农民与成年农民一道变工合作，进行深耕细作，改良水利，多种粮食，多产棉花和其他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农产品，并且积极参加农村中的合作社运动。在新解放区，则应按照共产党新区工作的方针进行青年工作，准备由减租进到分配土地，同时要不使生产低落。

在军队中建团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其方针与步骤，可按照朱总司令在开幕时的致词中所指示的执行。

中国学生运动有很光荣的历史传统。学生青年容易接收进步思想，他们又有知识，希望他们在学习中注意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材，因此今后还要加强学生中的工作。在各大学、中学和专门学校中，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建立团的组织，开展团的工作。学生

中的青年团员，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特别努力学习于建设新社会有益的科学，同时应该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各种工作，依靠自己优良的学业和模范的实际行动，去取得同学们的信任，使学校中团的组织真正成为团聚优秀学生，而且为一般学生所拥护的组织。

为着发展工业和农业，政府将要开办大批培养工业和农业以及医药卫生方面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城市和农村中的青年团，有任务要供给大批优秀团员和青年工人、农民及革命学生知识分子，进到这些学校和训练班里学习，以便训练出大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材——工业、农业的专门家、工程师、技师及能管理工厂、农场的干部等。

青年团要在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作部门的青年群众中进行工作，其总的目标，在于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在于领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因此，学习问题是所有一切不同职业、不同部门的青年团的共同的中心活动。学习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具体工作上的实际运用。这就是说，学习要和本身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工厂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厂中的熟练的模范工人；在农村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农村中的有知识的模范农民；在部队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模范战士或战斗英雄；在

学校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学校中有思想的模范学生；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工作岗位上的模范工作者。总结起来说，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青年团的工作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偏向的。为着今后青年团工作及青年运动能够顺利地发展，对于青年运动中几个历史上的偏向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恰当的看法，以免许多同志不能勇敢放手地去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障碍青年运动的发展。对于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工作，应当估计为在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成绩的。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从一九二〇年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

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的偏向。后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这种偏向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之下曾有过某种程度上的发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中,青年团在分配土地、查田运动、建立政权、组织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动员青年参军、发展教育,以及在军队中,仍然是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上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及各解放区青年救国会的活动,大量青年学生、青年工人的下乡工作,也都是轰轰烈烈地发展着,有过优良的成绩。以后有些地方的青年组织,因不善于使青年运动与整个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相结合,过分地强调了青年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一种单独去搞青年自己一套的闹独立性的偏向,这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偏向为时不久就受到了纠正。

这就是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代(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和青年救国会时代(抗日时期)大略的实际情况。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不管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抗日时期的

青年组织，都是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如果不估计到这点，那是不对的。我们承认在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及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先锋主义”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我们吸取这些教训，并防止在今后的青年运动中重犯这类错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且片面地夸大过去青年运动中产生过的错误偏向，因而否定过去青年运动的重大成就，那就必然会做出不合乎历史事实的错误结论，且将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再没有建立任何青年团的必要了，似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类思想如不加以澄清，则将作为创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大障碍。

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目前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惧怕青年先锋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青年团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手一些，让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的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在现在中国共产党有着这样强大而普遍的组织，有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自己的领袖；而青年运动本身也有了丰富的经验，有了犯“先锋主义”、“闹独立性”（应称为青年主义倾向更为恰当，以免与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独立性相混淆）偏

向的历史教训，应当是比较不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的。自然，对这些历史上的错误偏向，应当时常警惕，当它出现的时候，则须适当地加以纠正，使青年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但绝不应当因为怕重复错误，就连青年团的组织也不去建立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要犯错误。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先锋主义是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去代替党的领导，这种偏向我们应当反对。对于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的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我们必需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青年运动按照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需要正确地迅速地前进。

当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快要在全中国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建立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这件事是十分的关心和重视，全中国的青年们也都在集中注视这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经过与结果。我们相信在这次大会以后，全国青年运动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青年积极性也会因此而更为提高，使我们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斗争，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长期建设事业中，会获得从青年方面所来的更大力量的帮

助。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

根据《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 在任弼时的报告中，此处还有如下一段话：“除开这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不再参加反动军队来进攻解放军，保持中立，或则站在解放军方面来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可以保持其军队到一定时期再按民主原则来改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消灭最反动的军队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是指的绥远方式，由于当时对绥远方式的政策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这段话未公布。

〔2〕 太平洋公约后来没有签订。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美国策动英、法、澳、新（西兰）、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是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性质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五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4〕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必须注意，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4 页）。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电悉。

(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

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

（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1〕}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

（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 央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新华社《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社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律应当召开，在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的机关，其重要性，和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是一样的。区与乡则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老解放区，凡属条件成熟的地区，则应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凡属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总之，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的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 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 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末世电^{〔1〕}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 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四) 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 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 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

中心。

(七) 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 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 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 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察哈尔省委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该省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说，张家口解放初期未注意开各界代表会，工作走了弯路，从今年四月至八月，已开各界代表会四次。大同于今年五月初解放后，至今已开会三次。宣化仍未注意开代表会，继续用党内扩大的干部会议去传达和布置工作。已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对于联系城市各界人民，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启发各界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城市，均起了相应作用。缺点是存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在形式主义，准备不足，缺乏中心内容，民主讨论不够。今后要使张家口、大同的代表会提高一步，会议代表的产生改以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聘请和推派为辅，并注意克服以往的不足。宣化立即着手建立代表会。人口在二万左右的城镇，亦拟建立各界代表会议。各县按照群众基础不同分别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界代表会议。区村两级建立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县的各界 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份，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

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 央
九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附件〕

华中局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 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中央：

甲、二十五日关于各县代表会问题复示已收。武汉九月五日即行召开，华中局即就近予以协助，其他城市都连续通报要他们认真进行，经验后报。

乙、关于召集各县代表会问题，按中央复中原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新区农村政权问题请示的覆示（同年十二月二日复电已载政策汇编），在双减阶段，新区县、区、村三级皆不应过早建立一士绅参加的人民代表会，而应先建立农协，并由农协所召集的农代会实际起人代会的作用，待群众业已发动起来时再召集正式的人代会，这一规定与此次覆示有区别。根据最近经验，我们初入新区进行合理负担斗争、救济水灾、修堤坝工作中，一方面利用保甲，一方面召开农代会，评议负担，监督保甲，宣传我党政策，发现积极分子，联系广大的无组织群众，打击封建当权分子转嫁负担等不法行为，其代表成份开始必然不纯，经过多次召开以后就可逐渐变纯，对农民的代表性也逐渐提高。我

干部如善于结合好的代表下去工作，又结合自下而上发现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可以很妥当的联系群众，进行工作，建立农协，则农协既易扎正根子，又能联系广大群众。此项经验，已经湖北、豫省新区证明，为众欢迎，可普遍推行。因此，对于召开各县代表会问题，我们意见：

A. 只是县级召开，区乡两级可开农代表，而县各界代表会也可逐步达到以农代会作基础，吸收其他学生、妇女及少数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作为民主人士）参加，藉以发挥联系群众与统一战线的作用。

B. 鉴于开明士绅若无事先的了解，很难辨别真确，此与城市工商资本家民主人士有所不同；又鉴于进入新区后，我干部在吸收使用各种旧人员问题思想界线相当混乱，因此，吸收开明士绅，还应具备以前中央所规定的条件，并经地委一级批准。

C. 全国工会工作决议，乡村工人暂不建立独立的组织，在召开各界代表会时，较大县城可以城乡合并召开，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参加，若无此条件，则只吸收农民（注意吸收手工工人）代表，不必为了开会去专事组织乡村工人，推选代表，分散精力。

以上请指示。

华 中 局

八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周 恩 来

关于党派问题，包括资产阶级前途问题，我想讲几句话。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共同纲领》中没有写明，因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过早提出来反而会乱了脚步。当然，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因此而消失。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我们党并不因此而不努力工作。我今年已经五十二岁，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工作。这不是很好理解的事嘛。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没有资产阶级了。但在今天，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它的历史任务。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起过进步作用的，我们不能主观地抹煞历史。一个人也好，一个阶级也好，只要尽了历史责任，历史就会写上一笔，自己也会从中得到安慰的。因此，虽然资产阶级迟早要被消灭，但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领导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三部分。

这并不可怕。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有些人天天喊共产主义，这当然使资产阶级受到精神威胁。如果有人天天在我面前说，你老了，快要死了，我也不高兴，非躲开他不可。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的人们要自信，他们不但有历史任务，而且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单一阶级的政党？这不是应不应该有的问题，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产生。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个“肺病”是先天不足遗传下来的，一开始就没有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共产党在农村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在今天，如果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只能是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如现在的民主建国会那样。但民主建国会并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里面有进步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走今天这样的路，民主党派也必定是今天这样的类型，这是历史的必然。

各民主党派活动要有所分工。民进在自由职业者方面

开展活动较为适合。职教社提出为劳苦大众服务，这是好的，但光提为劳苦大众服务还不够，照顾的方面要多些。民主党派的组织也不能太严，要照顾大多数，团结大家一道前进。总之，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 少 奇

我来到天津，听一些同志谈了谈天津的情况，还没有谈完，也到有的地方看了一下。总起来讲，你们对天津了解的比我多一些，不过，并不是很够了，依我看还是不够，还须继续了解。

天津有很多困难问题。同志们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怎么办？我的办法也很少，还是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我今天不能提出肯定的意见。今天谈的话，只当作一种引言，好像作文章的引言一样，把大家的意见引出，叫大家注意一些问题，以便最后解决。我今天讲话的性质先确定是引言性的。

天津接收工作已好几个月了，早已结束了。同志们很辛苦，一般都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毛病虽有，但不很多。中央对同志们的接收工作是满意的。接收工作早就过去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

* 本文是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天津进步了，管好了，改造好了，以后就更容易管了。现在接收好了，但没有管好，还没有加以改造。至于发展还是将来的任务。

管好天津、改造天津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就是必须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注意是“劳动群众”，如手工业劳动群众等，而不是“贫民”），争取知识分子（注意“依靠”、“团结”、“争取”，这些文字要看清楚），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注意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并且尽可能多的那些民族资本家，“自由”是加了形容了，“争取”呢？就是要多多地争取可能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不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不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不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不跑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方面去。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干什么？就是要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以便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也是管好天津市工作的总路线。

我们办党要编队伍，进行革命也要编队伍。革命队伍是什么人组成的？就是依靠工人，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我们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

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扩大我们的队伍，即在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事业。天津工作的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执行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上面说的两点上发生了模糊，发生了动摇，发生了错误，就是对总路线的模糊、动摇、错误。

在这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所以今天天津市的资本家，不但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相反是团结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

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如果当成斗争对象，也是犯错误，同样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

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不是什么小错误。

那么对于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是否要进行斗争？共产党、工人、其他劳动人民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过去资本家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工人是恨他们的。解放后，工人要求斗争他们出出气，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些斗争，适当进行一些也好。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我们是矛盾的，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我们是否有矛盾有斗争呢？也是有的。在适当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下，与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斗争不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那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今天把重点放在联合上，将来重点是否会变更呢？那也是可能的。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前几天我和东亚毛织厂经理宋斐卿先生说，再过多少年，你办了八个厂，而大势所趋走入了社会主义，那时跟你商量，再给你八个厂，共十六个厂交你办，你能管理工厂，薪水给你增加，你干不干？他说，要能那样，哪有不干的！

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是又斗争又联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但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在什么地方联合？我

想主要是在经济上联合，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工人同资本家在劳资问题上总会有很多斗争的，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会有更多的争论。所以，在哪些方面跟他有更多的合作，哪些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少些。要弄清楚。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如果这点不指出来，就会使他们犯错误。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问题也有加以解释的必要。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同时又有的把敌人放过了。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打了，犯错误了。

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你们解放天津，一次战役三十一小时，就把拿枪的敌人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则三十一天，甚至三十一年也不一定能消灭完。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天津人口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要团结起来，敌人很少。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如何做呢？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

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他们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这些人听了觉得很合胃口，说：“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主席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到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所以也叫做全面关系，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毛主席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毛主席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他们说，我们的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并且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主席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

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上海商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在报纸上宣传资本家别超过宣传工人，没有说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宣传。所以在宣传上要有自由资产阶级^{〔1〕}的地位。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今后天津市的工作如何做？要看你们自己的思想认识够不够。我们同志的认识是有一些毛病的。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

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这一工作天津做不好，整个华北也是做不好的。前些日子，上海的船到了天津，老百姓认为对外贸易要开始了，街谈巷议，眉开眼笑，而我们好多外地来的干部，对这个问题多不了解。

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为了把进出口管好，国家要管制对外贸易，对它加以统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统制，今天必须统制。不这样，帝国主义势力仍旧会侵入。但今天管制应放宽些，不要统制太严，统制死了，不要因统制而妨害正当的进出口贸易。海关的税收税率应配合对

外贸易的发展，不应妨害它发展，所以要由国家管制。国家与私人的出口都算作输出。允许私人出口进口东西，国家统销的出口货，有些也可以公私合办，但统销的名义不取消。不需要进口的，中国能制造的东西，不许进口。不应进口的进口了，就妨害我们的生产。天津有的资本家讲，有二十几种货物不应进口的却进口了，这样一来有很多家工厂就得关门，这就妨碍了天津的生产。

对外贸易的管理、统制、税收、海关等工作，都应加以改善。应当由工会、公安局等设立海员俱乐部，招待中外海员工人，照顾他们，跟他们谈话，卖给他们东西（如卖给他们手工业品不是很好吗？还可赚钱），送他们上船。曾经有一个海员给我们写信，说他买不到东西，很不满意。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但外国的海员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应当加以好好招待。把外国工人看成帝国主义分子，又把阵线搞乱了。

我们的人能够组织对外贸易、了解对外贸易的太少了。搞进出口贸易，可以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要吸收资本家参加，他们比我们熟悉。对外贸易应公私兼顾，如进口的原料，公私双方都买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和资本家商量，和国营工厂、私营工厂商量，共同把对外贸易搞好。外汇也要管好。有一个人对我说：“外汇牌价太低妨害出口。”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商量，多研究，我们自己不懂，又不研究，那是搞不好的。特别是那些资本家的话不可不听，当然也不可尽听。

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今天正好乡村区党委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回去要把城乡关系搞好。听说有的乡间贸易公司，看见去了商人，便当成敌人，把他挤走。我们贸易公司不能把他们看成敌人。天津有一个外国人经营的蛋厂停产了，我们外事处的同志和他们商量，要他们开工。他们说：“我们正想开工，但你们得供给一百五十万个鸡蛋。”我们的贸易公司无法供给，外事处要他们自己下乡去收购。但是他们一到乡下，就有人说：“帝国主义分子来了，赶走他。”结果蛋厂开不了，工人被遣散，这是一笔大损失。如果这个厂子开了，工人可以做工，农民可以卖蛋，税收也可以增加，这是一笔好生意。

税收也有问题。听说到乡下买棉花抽税，运进城又抽税，卖出又抽税，制成纱又抽税，由棉变成布，中间不知要抽多少税。还说：“反正公家抽的是公家的税，多抽点不要紧。”像这样又怎么能货畅其流，发展生产呢？当然有些税是必须抽的，但不应过多。

贸易公司、商人、工厂应合作，天津应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运输、价钱、税收等问题应共同商量。对中小商人要给些利益。农民到天津来卖东西，也常有走不进来的，抽税也很多。

为了做生意，邮政电讯应畅通。现在我们跟上海电讯能通，而与我们解放区的城市石家庄、沈阳、张家口反而不通电话。其实这是很容易通话的。电讯通了，对公私商人做买卖都方便。

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各机关购买东西也可组织机关合作社统一供给。推销城市工业品也可组织百货商场、推销所等，公私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推销。

为了把城乡关系搞好，需要我们政府的贸易公司领导，跟资本家商量，共同努力，使华北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样就活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

城乡关系问题，城乡干部都应好好讨论。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外贸易也能做好，不致于海外来船后，空船回去。特别像猪鬃、皮毛、骨头、鸡毛等，都是农村出产的，这些东西能出口，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

沟通城乡关系，问题很多，如资本问题、收集问题等，都要想想。

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过去不找资本家，这种态度是不妥的。要与资本家商量，哪些事公家可以办，哪些私人可以办；商量如何做生意，如何向他们订货，供给原料等，这样公私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工业生产不比农业生产，农业生

产比较单纯，工业生产则很复杂，很多方面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好好地生产。成品推销市场，原料来源供给，要跟私人工厂商量，必须公私兼顾。如棉花，他们缺少，也应分一点给他们。在市场上，私人销一点，公家也销一点。价格也应彼此商量一下。所以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两利的方法。原料、市场适当分配，不要使一方独占，价格不要各自任意提高或降低，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使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配合发展。但有些调皮的资本家，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列宁说，有文明的资本家和野蛮的资本家，我们要打击野蛮的资本家。只要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主动跟他们合作。山东临清贸易局用故意跌价的办法，打击外地来做生意的资本家，企图独占市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合作。

所以公私兼顾必须贯彻，贯彻到买棉花中去，贯彻到买花生中去……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当然合作的条件是要加以缜密考虑的，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不要使私人没有利益了。

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天津解放后，工人向厂方提出了许多要求，资方已答应了，但有的要求增加工资过高，资本家担负不起，或只能临时担负，长久不了。同

时因工人待遇过高，使工业品价格提高，农民吃亏。

有一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如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或把临时工都改为长期工等。有些是应该改可能改的，有些是不可能改的，如不应改为长期工、不可能改为长期工的，硬要改为长期工。这些要求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另外工厂工人有些行动是不合理的，如不遵守厂规，不听管理人员指挥，上下班随便，破坏劳动纪律，资方又不敢管。还有工人在生产时间开会，搞许多游艺节目，耽误生产，这些行动都对生产不利，所以说的不合理的。

这些要求在工人方面是有其原因的，不能单纯责备工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随意解雇工人，有很多不合理的措施。那时是资方一利而不是劳资两利。这就是今天工人产生劳方一利的历史原因，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做是不好的。目前工人中间，劳资中间，这一偏向如果不迅速加以批评纠正，就会成为系统的错误，陷入“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过去犯过很多这类错误，今天又产生了，应该很快纠正。批评时态度要好，要进行说服教育。但一定要肯定这是不对的，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农民也不利。现在已经产生了“左”倾偏向，如继续发展下去就更有害了：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所以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

(一)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职员解放前的生活

水准，不得降低（有些工厂虽然说是原职原薪但实际上降低了）。有特殊困难必须降低生活水准的，也一定要经过工会与工人同意。

（二）目前是军事时期，经济困难，提高工人生活水准暂时还不可能，但将来一定能提高，共产党也一定帮助提高。今天不可能提高，有的还要暂时忍耐痛苦，应向工人说明，请他们原谅。将来按照生产发展情况可以逐渐提高。目前一部分工厂，由于过去工资太低，现在可以也可能调整的，可作适当调整。但这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现在有增加好几次的，使资本家惶恐不安。所以现在应该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额，是不是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最低是不增加。实际工资包括伙食住房等。至于规定最低工资，劳大决议曾有过规定，但我们中国还不曾实行过，是否行得通还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不规定，只维持原来工资不动，太低的有可能增加时才增加。今天如果把工资规定得过高，很多工人会失业。如有特殊困难须增加，由总工会提出政府批准也可以增加。

（三）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如有确实困难不能复工或不得不停业、停工、裁减工人时，必须经政府批准。

（四）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产的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但一切都必须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在雇请或辞退工人时，必须依照生产需要的最高原则。如为政治上的理由开除工人，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不得强迫厂方雇请

或辞退工人。资本家的雇辞工人权是他的生死问题，但这也是工人的生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劳资双方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在斗争。如何使这矛盾缓和一下，工会应注意此事。要把失了业的熟练工人、技术工人、老工人、正式工人进行登记，并由政府劳动局设立职业介绍所，规定雇请工人时只准到职业介绍所去雇请。还可商讨由政府拿一笔款，资本家拿一笔款，作为失业救济基金，以便对个别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加以救济。这虽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可以办的。

(五) 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服从指挥。对旧厂规，经资本家修改，工人讨论，工会同意，政府批准实行后，大家就得遵守。工人不得不听指挥。

(六) 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准占用工作时间。而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

(七) 每个工厂需要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生活费用由工会负担。工会经费今后应独立起来，要造预算，政府充分供给，使工会有钱进行各种活动。脱离生产的工会工作人员的薪金，照原来工厂薪金发给。

将来工会应筹备自己的经费，工人交纳会费（占薪金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时可以不要政府津贴了。现在这项预算不要轻易改，必须予以保障。私营工厂工会的经费

也由政府给。

(八)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要分析是不是正当的要求，哪些可能办到，哪些不可能办到，正当的可能办到的要求，代表工人去交涉，否则说服工人不要提出。困难就在于分清何为正当不正当，何为可能不可能。

这样由总工会来解决，才能增强工会的威信，工会的作用也会提高，否则工会就没有威信，即使有也是官办的威信了。党、军代表等各方都要大力培养工会的威信。有些厂长、军代表、贸易机关负责人，怕工会威信高，说：“工会威信高了，我就不好做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工厂工会威信越高，厂长越好当，工厂工作更好做，党才有发展，工厂行政才有推进。反之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工会是桥梁，没有它，政府与工人就建立不起联系。如果劳资双方纠纷不能商量解决，则由劳动局解决，工会可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资本家也可以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由政府劳动局调解和仲裁。天津资本家对于这类问题正呼吁无门，我们可以开这样一个门。

我想关于劳资问题，军管会颁布一些规定是必要的。

宣布这个规定，工资过高的工厂的工人可能会不太高兴。所以今后我们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

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现在工人在政治上是翻身了，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工人今天还不可能翻身，生活稍微改善一下是可能的，很大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经济上获得大的收获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的工人还没有获得更大的解放，还受资本家剥削，不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在经济上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的。就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还要艰苦奋斗一个时期，生活才能有较大的改善。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乐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有些老实的资本家想多办一些工厂，但怕剥削得多，罪恶大。如启新洋灰厂经理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有些资本家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为利益分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看过，越看越害怕。

我问他们，你说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都是剥削；分红分得多也好，分

得少也好，还不是把剥削来的钱揣在腰包里？

有的资本家说：“生产发展后股息就大了。”他们提议要限制股息，主张过多的股息归国家。我想这恐怕是资本家在试探我们，看我们准不准许他们赚钱。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资本主义在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生气。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资产阶级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腐化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不能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烧掉成品，或把产品扔在海里，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又不丢，又不烧，那只好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的，不然就会生产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准备，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

今天工人阶级还得受资本家剥削。那么农民呢？农民翻身可以消灭封建制度，分得土地，但工人还不能得到工

厂。工人翻身与农民翻身不同，如照农民那样翻法，就翻坏了。工人翻身这口号是不能空洞宣传的，容易与农民翻身连在一起，如不加以区分，那就坏了。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个利润分配问题，今后可以加税，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又变为国家财产，国家又“剥削”了资本家，很好呵！

关于劳资问题，要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对于工人过高的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说服不了，要报告上级，由市长去说服。我们共产党必须向工人郑重表明态度，说明利害，不然到工厂关了门，工人失业吃了亏，他们该说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讲！”所以应该早讲。

除劳资政策以外，还要告诉工人注意提高生产，否则改善工人生活是不可能的。工厂负责人必须将工厂业务向工会与工人作报告，不外是原料、制造、销售三件事，缺一不可。进行生产，必须有原料，原料要好一点，便宜一点，生产时还要节省一点。产品质量要好，产量要高，原料、机器要节省。销售就需要有市场。原料、制造、销售这一过程，都应使工人了解，要计划原料，保证制造，并能销售。要把这些情况经常告诉工人，和工人特别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量。国营工厂这样做，同时也要说服资本家老实地向工人作报告。没有原料与销售计划，只有制造计划，不算完全的生产计划。必须把全副工作计划向工人

报告，把有利条件和困难在哪里，都告诉工人，困难由大家克服，如军队一样，只有把情况说明，才能打胜仗。这样才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好。在厂内实行生产民主，有利于发挥工人的积极性。

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但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倒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中现在在搞民主改革，工厂中有些冗员要裁减，有些机构不合理要改造。工厂也要实行精兵简政，特别是上层机构庞大，应该减缩。要团结职员工人，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雇佣劳动者，是脑力劳动，工人大多是体力劳动。一般职员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以内（他们不同于经理等压迫工人的职员）。鼓动工人来反对职员原则上是不对的。过去职员对工人不好，是由于国民党利用职员控制工人，制造裂痕。今天我们要消灭职员工人间的裂痕，方法是向职员讲明白，让有错误的职员进行自我批评，认错道歉，使工人谅解他们过去的错误，一般的既往不咎，有大问题的要宽大处理，但这些事要快些处理。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职员如认为让工人批评了就不能再管工人了，这是不对的。这问题明天再讲，今天不多讲了。

国营工厂中的职员工人关系问题和私营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很快解决，解决以后，还应把

经济机构组织好。

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为了搞好这些关系，首先公家与公家的关系要搞好。现在不只是国营私营彼此不相往来，就是国营各部门也有这种情况，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相封锁，上面只看到有人来要东西，而没有人来报告我这里有什么东西，这样如何能把经济组织起来。工业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把各自管理的企业、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国，是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今后必须规定各企业、部门的请示报告制度，不准打埋伏。军管会也要严格一些，不但要管资本家，而且要管共产党员。今后还得实行类似派经济专员的制度，经济专员可以代表中央调动一切。公家与公家配合好，再与对外贸易配合好，再与乡村配合好，再与私人资本家配合好，这样四面八方就照顾到了。军管会不仅是管理军事管理政治的，而且是管理经济的，军管会在这方面要负起责来，要召集经济会议，各经济组织的代表要互相报告情况，互相了解情况，互通有无。可以组织经济委员会，还可以与资本家商人在一起组织进出口贸易委员会、原料采购委员会等，研究政策，统一领导。这些机构、组织、我还未想好，为了发展生产，管好天津，这些工作是要做的。

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把我们的队伍组织好。工人阶级是不是可靠呢？一般讲是可靠的。马

克思讲，共产党唯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革命的领导权，唯一的依靠是工人阶级。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不去教育工人，不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那么工人就可能不撑你的腰。为了使工人阶级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必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工人阶级有了认识，有了觉悟，就有了力量，工会有了威信，我们党又掌握了工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可靠了。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工人阶级离开党很久了，国民党在其中有一定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工人工作进行得不好，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切实进行组织工作。除开工人阶级以外，在学生、小资产阶级、农民独立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中，我们都要进行组织工作。这是管好天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组织各委员会，发展生产。所以目前天津的工作，工人群众工作是一环。经济管理工作是一环。今天工厂里党的力量不太多，不要把大力量放在党务工作方面去。要把最好的足够的干部放在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工作的机关。

根据《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注 释

- 〔1〕 这里说的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建立有工作能力的 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刘 少 奇

一、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

* 这是刘少奇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定之，其决议，由过半数到会委员之多数通过成立之，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停止或修改或废除其决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数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下列各工作机关，在委员会及主任与副主任领导之下，分别地进行工作：

(一) 中央计划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并得按各财政经济部门逐步设立若干计划组。

(二) 中央财经人事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财经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及一般职员和工人的训练、登记与调动等事务。

(三) 中央技术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有关新的技术之发明、采用与推广等事务，并得按各项技术性质逐步建立若干技术组。

(四) 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私营企业之指导事务，并得按各项私营企业部门逐步设立若干事务处和设立华侨经济事务处。

(五) 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合作社之指导与协助事务，并得设立消费合作事务处、农

业合作事务处、手工业合作事务处、水利合作事务处等。

(六) 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负责管理关于外资企业的事务。

(七) 秘书处，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事务。

五、除开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机关而外，应即陆续建立下列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即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

(一) 中央财政处，负责管理有关税收、粮食、盐务、烟业、酒业、渔业及其他财政事务。

(二)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管理金融并进行其他银行业务。

(三) 海关总署，负责管理全国海关并管理港口、码头及边境检查等事务。

(四) 中央商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对内与对外贸易及实物配售等事务。

(五) 中央铁道部，负责管理全国铁道之运输及铁道之修建事务。

(六) 中央交通处，负责管理邮政、电讯、船运、航空、公路等事务。

(七) 中央燃料处，负责管理有关煤炭、石油及电力等事务。

(八) 中央金属处，负责管理有关钢铁及有色金属与机械制造等事务，并管理军事工业与造船工业。有关基本化

学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之事务，亦归金属处管理之。

(九) 中央纺织处，负责管理有关棉、麻、毛、丝的纺织等事务。

(十) 中央工业处，负责管理除纺织工业以外的有关其他各种轻工业之事务。

(十一) 中央农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农业、畜牧、垦务及农业试验场、国家农场等事务。

(十二) 中央林业处，负责管理有关森林之采伐与培植并管理有关造纸工业的事务。

(十三) 中央水利处，负责管理有关巨大水利工程的事务。

六、前条各处之组织条例，另行拟定。

七、除建立上述各中央财经机构外，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在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立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其组织条例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拟定。

八、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划分，国家企业之由中央直接经营或划归地方经营或委托地方经营等事，均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之。

九、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之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其年限相当长久者，其合同须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后，方为有效。

十、地方财政经济机关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执行以下各项任务：

- (一) 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指定之任务；
- (二) 管理当地财政工作和金融工作；
- (三) 恢复与发展当地人民经济；
- (四) 经营中央与上级机关划归地方或委托地方管理之国家企业；
- (五) 监督与协助由中央直接经营之当地国家企业。

根据《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一九四九年六月)

刘 少 奇

一、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

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三、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但在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特权以后，我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地恢复和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和采取什么路线去发展经济呢？

四、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

(1) 国营经济；

* 这是刘少奇撰写的一份党内报告提纲。

- (2) 合作社经济；
- (3)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 (5) 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五、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合作社经济今天还很少，但可以很快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营经济则在接收全国官僚资本后，以及在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不过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

六、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

七、在前项基本矛盾的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

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而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八、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如下：

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

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九、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及战犯手中可接收不少的大企业，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收回或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剩下的私人资本的大企业，已经不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邮政、电报、大钢铁业、盐业、纸烟业和大部分矿山、轮船、纺织业等，将由国家经营或由国家监督经营。目前的问题是：（1）我们还没有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还没有完备的经济计划；（2）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3）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的经济机关，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国营经济常出现无组织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商人资本家则从中渔利。中央拟于最近发布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决议，建立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各省各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财政、工业、铁路、航运、邮电、农业、商业各部及国家总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并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建立国营、省营、县营、市营各企业间的正确关系。

十、我们在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地区组织了许多劳动互助组。还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要办学校训练干部，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领导机关及合作银行。

十一、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

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现在已有少数加工、定货企业。

十二、依国家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发展的程度，适当地实行某些物品的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及学校学生的生活。对市场则采用调剂物价的政策，以与奸商作斗争。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以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

十三、很明显，苏联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1）经验上的援助；（2）技术上的援助；（3）资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似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如果这种援助和互助是很大的，那就可能帮助中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

十四、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

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

根据《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张 闻 天

根据几个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我认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

大体上说来，从八一五^{〔1〕}解放到全东北解放（实际时间可算到今年三月），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东北私人资本从日帝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的过渡时期。

伪满时期，东北私人资本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大汉奸大特务，在经济上是掌握大加工业、大配给店^{〔2〕}的大资本家大商人，在农村中往往又是大地主。这是伪满时期的一种汉奸资本。这一部分资本依靠日帝政治与经济的势力，与日帝资本结成一体，为非作恶。其资本较大，势力较大，但人数不多。另一部分是中小资本家，

* 这是张闻天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

特别是小资本家，虽也依附于日帝资本为生，给日帝加工，做些零件小玩意，或执行配给任务，但经常受到日寇的压迫，特别在日寇实行经济统制（伪康德七年即一九四〇年）后，受到的打击很大，故对日寇不满，同汉奸资本亦有矛盾。这一部分资本数量较多，但力量很小，在日帝经济统治下，只能苟延残喘。

八一五解放，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被摧毁。过去依附于这一体系的汉奸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应受的惩处，没收的被没收了，破坏的被破坏了，有的为逃避目标，化整为零了。但中小资本家，却得到了解放。这三年余来，东北的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一般地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应指出，在过去这一过渡时期内，私人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比较不正常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是战争时期。东北被分成许多块，南满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还在敌人手里。由于战时财政的入不敷出，物资的缺乏，故物价总是不断上涨，特别从一九四八年夏季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物价表现极不平衡。由国家没收过来的公营企业，这时正在恢复，生产量又低又少，还发挥不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国家对私资的发展，除土改后期的一个短时间外，一般是比较放任的。虽然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了对于私商的某些限制与管制，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平抑物价与反对投机倒把的措施，但作用不大。在这样条件下发展着的私资，大部分要利用物价的波动与

不平衡来进行商业活动，那是很自然的。这部分商业资本，固然也解决了国家与人民的某些需要，但同时它却大大地发展了投机倒把的活动。商业利润是特别的高。商业资本从国家与人民手中发了很大的财。如果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的活动，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活动，那也是不算过分的。至于另一部分工业资本，则主要地为国家加工而获利，尤其以军工军需的加工为多。有的则为一时一地市场的需要，制造一些日用必需品出卖。工业的发展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游击性的，抓一把的，大多数是小型的。有原料、有销路，就生产开工；没有就另想办法。看到投机有利，就去参加投机。为避免目标太大，避免税收负担，及为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力求资金周转的迅速与灵活起见，较大的工厂与商店，均走向分散而“化整为零”。小手工工厂与作坊，特别是行商、摊贩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工商业户数的增加，研究起来主要地也就是这种小商店、行商、摊贩及小手工工厂及作坊的数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投机倒把的发展。显然，这是循着无政府的老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运动，到今年三月可以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当时在我们同志中间，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误思想，以为这就是发展工商业的主要方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小资本的要求在党内的反映。但东北局当时的方针（见去年九月高干会《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3〕}），是全力恢复控制经济命脉的国营工

业与商业。因为它懂得只有加强国营经济的力量，才能在经济上巩固我们的政治与军事的力量，反对私商的投机倒把，给私人资本主义以经济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全东北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停止了。全东北和平统一了。东北大军的进关，使财政收支的平衡成为可能了。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大城市全部收复后国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大，大量物资可用之于调节市场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力量增强了。物价开始达到平衡，有的甚至下降了。国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始取得了主动，加强了计划性。天津、上海的相继解放，使东北市场同关内市场联系起来。这些都对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的影响。商业投机困难了。军工军需的加工定货减少了。价廉物美的东北大城市的本地工业品及关内来的工业品，进入东北内地市场来，同本地货竞争了。许多原料的来源，还不够发展着的国营企业的需要。物价、原料与市场的条件，都起着不利于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巨大变化。虽然大部分商业资本还在盲目地待机与挣扎，到处找空子钻，但一部分商业资本却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想转入工业生产了。有的工厂与作坊，如像安东之棉织业、造纸业等，因缺乏原料而无法进行经常的生产；有的，如像安东的铁工业、丝织业等，则虽有原料，但没有市场，而不敢进行生产；有的虽有原料市场，

但成本贵，不能同国家的、大企业的及外来的成品相竞争，也不敢进行生产。大部分私人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有奖实物公债的推销，银根的紧缩，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严格管制，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一切这些在私人资本家的头脑中，造成了惶惑与混乱。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物价如何？原料如何？市场如何？国家意图如何？成为每一个资本家所要解答的严重课题了。

这些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加以解答。于是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从第一时期转入第二时期。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自由发展”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所铺设的轨道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至于私人资本的一切越轨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着眼，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

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我认为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体上已经具备。

为了给私人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办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我认为具体检讨一下过去我们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各个方面，是有必要的。

在三年余来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我们开始进入东北时期，在党的总的领导方针上虽然是右的，但在城市内实行了反奸清算的地方，在打击汉奸资本时，有时也扩大了打击面，把不应该打击的某些中小资本家打击了（强调了东北私人资本的汉奸性）。在多少进行着工人运动的地方，也有个别增加工资过高的现象。虽然这种情况当时并不严重，甚至相反地，在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上，在迅速争取工人贫民靠近我们上，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从私人资本那里抓一把的思想及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是有的。较大的私人资本的转移及其“化整为零”，同我们当时的这些作法，也是有些联系的。七七决议〔4〕后，全党转入土改，对私人工商业一般采取了放任的与不侵犯的方针，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得到了若干发展。但到土改后期，农民进城没收清算工商业者的封建性，有些政府机关与部队从财政观点出发，从工商业方面抓了一把，街道斗争中的工人贫民，也从中侵犯了一部分工商业。这给了私人资本家，尤其是较大的私人资本家，一个比较

严重的打击（在安东当时受到影响的，占全部工商业户数的百分之十六，其中较大的私人工厂被没收的比例更大）。这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时间短，纠正快，纠偏后私人资本又得到了恢复。以后物价的飞速上涨，促进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商业方面的特殊繁荣。纠偏后，在干部思想中曾经发生过过分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忽视了发展国营企业的迫切需要，忽视了同私人资本家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做斗争的必要，及片面强调了保护资本家而忽视了依靠工人的一些右的观点。在中央与东北局“纠偏必须防右”的方针下，这些右的观点迅速得到了纠正。自此之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一般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也仍然是有的，尤其在防右后的“左”的偏差。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纠正一切这类偏差，尤其是“左”的偏差，今天极为必要。

我认为目前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在公私兼顾方面。原来强调国家的利益及国营企业的利益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侵犯了正当的私人工商业，那就不对了。而这样侵犯私人工商业的事，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有些财经部门、财经机关，为了本部门或本机关的利益或便利，而损害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类事件是比较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最近所检查的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5〕，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

子而已。在公私合办的企业内，这种只顾公方利益不顾私方利益的事也不少（关于这类的材料见另件）。

第二，在劳资两利方面。原来在城市工作中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发生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因此损害了劳资两利的原则，那就不对了。而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省委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6〕）。

第三，在税收政策方面。（这个问题原来是公私两利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但这里特别提出是有必要的。）原来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税收负担以解决国家财政的收入，那是正确的。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商人投机倒把的活动，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为了税收，给工商业者的活动以过多的过分的干涉与限制，那就不对了。在一些同志中，尤其是在税收机关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税源的思想太少，而“杀鸡取卵”的思想有时甚至还有表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太少，而限制的思想却多了些。这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很不利的。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以上这些“左”的偏差，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程度认识不足。东北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重的悬殊，国营企业在工商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这一明显的事实，往往容易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私人资本无足轻重的思想。同时领导机关过去差不多集中全力于恢复与组织国营经济成为计划经济，因而对私营经济的注意不能不有所放

松。过去物价波动时期，私人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投机倒把活动，给我们困难很多，损失很大。这些明显的突出的事实，也容易使我们过分强调私人资本的投机倒把的破坏方面，而忽视了它在我们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下，可以发挥其积极建设的方面。这也就使我们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注意不够。其他如片面的国家观点，片面的财经观点，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常常容易侵犯到私人资本的利益。而这种观点，常常是较之右的观点更加难于克服的。在党内，“‘左’比右要好”的残余思想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所以在干部中就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坚决贯彻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营经济的建设多少有了一些头绪，私人资本又陷于这样的一种困难情况，党的领导机关更多地去注意于积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作，也是可能的与必要的了。

当然，在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也仍然是有的，而且在批判一些“左”的思想与做法中，右倾思想一定又会乘机抬头。但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哪里发生右倾思想，我们也就能在那里加以纠正，不用害怕。为了正确贯彻中央、东北局关于私资的方针，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是必要的。说“‘左’比右好”是错误的，说“左”比右难于克服些，因而“不妨右一点”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

以上看法，是否有当，请指示。

关于本省直属各市的材料，有的照原来报告，有的经研究室〔7〕同志略加整理，现在一并附上，供你们参考。

关于调整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写了一个决定草案，已寄上请批示。

此外，我们还想写一个关于公私兼顾问题的文件〔8〕，待写好后再寄上请示。

根据《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八一五”，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在这一天发表诏书，宣布日本对中、苏、美、英四国无条件投降。

〔2〕配给店与加工业，指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时期为实行“经济统制”而指定的商店和加工厂，它们被允许销售和生受“统制”的商品，包括所有生活必需品。大加工厂、大配给店往往为汉奸资本所掌握。同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可以得到许多特惠。小加工厂、小配给店则只能按日伪规定的工价和配售价格得到收益。但是由于它们是日伪“经济统制”体系中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基层单位，有些配给店还有利用其特殊地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所以一般也为清算运动所波及。

〔3〕这个文件最初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正式发表时题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4〕七七决议，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强调，必须在干部中扫除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确立从事长期艰苦斗争的决心，把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置于工作的第一位。决议全文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313页。

〔5〕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指本溪县地方政府侵犯这一石灰窑的事件。一九四九年四月，本溪县贸易局要求与本溪县新洞村三仁石灰窑公司合作，遭到谢绝。当地公安分驻所即令该公司停工，并宣布一切不准动。同时，本溪县营兴华窑业公司在该地开工，利用三仁石灰窑一部分工人及其宿舍进行生产。一九四九年七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人并令辽东省政府共同查处了这一违法事件。

〔6〕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指中共辽东省委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张闻天主持起草的。

〔7〕研究室，指中共辽东省委研究室。

〔8〕中共辽东省委后来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作了《关于贯彻“公私兼顾”方针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是张闻天主持起草的，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陈 云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七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四亿四千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

*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是建国前夕一次重要的财经会议。本文是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我先讲讲上海目前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意见。

一、敌人封锁问题。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要准备赔些钱。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

二、工厂搬家问题。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三、粮食问题。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

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上海的大米供应，每天至少需四百万斤（五百五十万人，每人每月平均二十一斤半）。现在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八十万斤大米。另外，近来每天上市的大米约八十万斤。还有我们每月配售及卖出的大米有三千万斤，每天一百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二百六十万斤，尚差一百四十万斤。不足部分，是靠上海市民在国民党占领时储备的“应变米”补充的。当然，市民自己储备的米并不多。将来粮食调剂得好，可以补救“应变米”的不足。上海米价最高时为七月十八日，现在低些了。估计今年米价的最高点可能已经过去，但我们仍应作万全的准备。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较江南一般地区迟四十天登场，但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如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再隔四十天，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接上，粮食的供应就可以解决了。退一步讲，即使上述地区的粮食运不来，也有办法。现在准备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来一亿二千万斤粮食，九、十两个月各六千万斤。根据两个月来的配售与市场情况，每月六千万斤可以够用。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听说皖北、常熟、无锡等地禁运粮食，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华中对华东也不能封锁。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明

年计划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六至八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明年水灾严重，则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

四、棉花问题。这几个月纱厂生产能维持现状，每周开工三昼夜到四昼夜，就是好的。八至十一月，每周按四天生产计，共需棉七十九万担。其中，中纺三十六万担，上海私纺四十万担，青岛私纺三万担。棉花的来源：中纺在上海现有二十三万担，在香港存有二万担；私纺在香港存有十万担，还可在那里买五万担；上海贸易处存一万四千担，前经济合作总署^{〔1〕}存七万二千担；华东可以买十八万担，华北可以买十万担，西北可以买三万担。以上合计为七十九万六千担。新棉收购计划即将布置下去，希望十一月底能开始拿到手。明年准备把农村妇女手工纺线缩小些，以机器纺纱来代替，用降低布价的办法来补偿农民的损失。预计明年在华北、华中、西北三地共可购棉三百万担，华东自己再收购一百八十万担，共计四百八十万担。如果能够买到这些数目，则明年纱厂的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收购数量由中财委摊派，各地公营企业要联合私营企业共同采购。组织购棉这件事情，担子很重，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可以办好的。各地应大力援助华东。有了棉花，还要估计到明年纱布可能外销不了，内销也可能成问题，此事以后再作研究。

五、运输问题。运来上海的东西（主要是煤、粮、棉）多，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主要是纱布、纸烟等）少。最大宗的，是煤炭的运输。从铁路运输看，困难大大超过

东北。浦口轮渡有困难。蚌埠至浦口一段，现在只能开十四五对列车，要争取开十六至十八对，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余为其他货运和客运。现在徐行及错车距离长，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通讯设备不够。今后应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车站的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铁路调度人员要很能干，因为货物来自各地，管理系统又不统一，调度十分困维。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避免列车过分集中。总之，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

六、工业生产问题。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面粉厂可以继续生产。五金机器工厂多，但也只有一万多工人，修铁路、造船可以利用这些工厂。这些设想，不一定都行得通，但可以做做看。旧上海那种公务人员与商人勾结起来，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的局面，不能再让它存在了。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七、金融问题。现在关内的钞票统一了，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

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票子，说这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但是，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下面我再讲讲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克服今年秋季的财经困难，力争明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

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八至十月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人民币，以七月底二千八百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则物价也将上涨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十一、十二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还须另外筹划。物价上涨指数是否可能降低？到冬季，由于解放

地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纱布的推销等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按保守的估计，可能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物价上涨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在北平时，曾有此议，中央让我们开会商量决定。华中已提出发公债，而且数目还很大。现在各大区负责同志已赞成发一点公债，请到会同志再考虑考虑。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少发票子就得发公债。

公债发多少呢？预计一亿二千万银元或二千亿元人民币。有的同志主张多发些，我倾向于发二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发行公债主要是在城市，新区的农村市镇也发一些，以便帮助推行人民币。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一亿二千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二亿银元的公债。他在历史上每逢到了没有办法时，就搞这么一下。东北四千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一千二百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

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六百亿到七百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现在拟了一个发行办法〔2〕，请大家研究一下。发公债各地区动作要一致，否则此宽彼紧，有人会钻空子。公债要折实，以牌价为准，有借有还。偿还期限，初发公债时短些，三年分期还清，每年还三分之一。能不能今年不发，明年再发？看来不行。等明年发，目前的困难不好解决。当然发公债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努力搞好整顿税收、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方面的工作。

关于明年的收支计划，按解放区人口将增加到四亿四千五百万计算，初步的设想是：

收入方面。公粮共一百九十三亿斤（大米一百零五亿斤，小米八十八亿斤）。各区分配数字如下：华东六十五亿斤（大米四十五亿斤，小米二十亿斤），华北小米三十亿斤，华中四十五亿斤（大米三十亿斤，小米十五亿斤），两广大米十亿斤，西南三十亿斤（大米二十亿斤，小米十亿斤），西北小米十三亿斤。

税收按七月底物价计算，共收一万七千五百零二亿元。几个地区的情况如下：华东七千一百亿元（其中上海三千

五百亿元，一个上海顶五个天津)，华北一千八百亿元，华中二千二百亿元，西南一千八百亿元，西北四百八十亿元，两广一千八百亿元。

这一计算，是根据天津的税收及各地人口的比例而拟定的。东北因为实行另一种货币，不好统一计算。计划明年从东北调进关内的物资，计有二十万吨大米，十万吨大豆，五十万吨杂粮，二十万吨钢，一百五十万立方米枕木。

支出方面。按九百万脱产人员每人每年的需要折合三千斤米计算。其中三分之一用粮食供给。共需九十亿斤；三分之二用货币支付（大米按每斤一百五十元，小米每斤六十元），共合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亿元。另外，事业费支出计七千四百六十亿元。

上述公粮收支相抵，剩余一百零三亿斤，合人民币一万零二百三十亿元。经费开支货币部分共三万零六百二十亿元，用税收和剩余粮食抵补以后，还有赤字二千八百八十八亿元。

大家会说，这个预算还有问题，就是有赤字，而且没有把预备费打上。是的，有这些问题。但是，努一把力，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老区过去公粮负担很重，老百姓希望减轻一些。新区工作无基础，还不能按老区的标准征收。因此，老区今年还松不得。老区松了，新区又接不上，就成了问题。

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

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四分之三，而公粮仅占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今后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例如东北，随着物价由不稳定达到相对稳定，许多商业投资转到了生产领域，同时钞票的储藏性能增加了，这样，货币的周转减缓了，市场上感到筹码不足，需要增发票子。发行的结果，物价并未上涨。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这样，预备费也有了，工业投资

也有了。

最后提一下剿匪和发动农民的问题。

剿匪和发动农民，对完成财政经济任务作用很大，党、政、军都要抓好这两件事。当然，贸易工作和税收工作也要抓紧。对于干部下乡，我很赞成。还要注意物资下乡。现在农村多以米计价并作为交换手段，我们把土匪打掉，农民发动起来了，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明年我们有了四亿几千万人口的统一的地区，这是民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否则，各项工作就会落后于形势，处于被动。

根据《陈云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前经济合作总署指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政府设立的经济合作总署。它是美国政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建立的负责援外的主要机构。

〔2〕 指华东地区发行人民公债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发行总额为三千万分，年息四厘，分三年还清；公债之发行及还本付息事宜，指定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其所属机关办理。

制止物价猛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陈 云

一、自十月十五日以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到今天止，以七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京津已涨达一点八倍，上海涨达一倍半，华中、西北亦与此相近。此次物价上涨，除部分地区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二、自七月底以后，由于我地区扩大，钞票下乡，农产旺季，工商恢复等等因素，货币流通量是扩大了。七月底发行总数二千八百亿元，按当时的价格折算，等于布一千万匹或粮食二十亿斤（大、小米平均）。目前发行总数一万六千亿元，按现价折算，等于布二千万匹或粮食四十亿

* 这是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指示。

斤。七月底与目前的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相同，都是很快的。估计我货币所占领地区已扩大了一倍。依此推算，全国平均物价比七月底上涨近两倍，按这一物价水平，则关内货币的全部需要量为一万六千亿元。因此，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八千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销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此决定如下：

（一）以沪津两地七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二倍或二点二倍。

（二）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十一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二亿一千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

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 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征。

(八) 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 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 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二十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二十天。

(十一) 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预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 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 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以上措施，请各地讨论并作准备。如有意见，请即电告。在准备中，所有布置，切勿登报外传。

根据《陈云文选》第二卷刊印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 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周 恩 来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

* 这是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

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

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 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 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〇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

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

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 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 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

地，最后解放城市；反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

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

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

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

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

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

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 and 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刊印

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政务院
第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帝国主义者侵犯了我国的海关自主权，他们用武装力量及奴役式的条约，强迫我国开辟商埠，进行对外贸易，规定以极低的关税甚至免除关税输入商品。各帝国主义国家，曾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权，大量地向我国输入生产品，吸收廉价原料，并藉此绞杀和阻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自由发展，使我国长期变为落后的从属外国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者为了保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特权，为了对其奴役性的条约和掠夺性的借款取得赔款与债息的担保，曾长期地掌握了我国海关管理和关税收支的大权，海关主要负责人员，全部由英美人担任，在各海关用英语办事行文，外国职员的薪金比中国职员高得多，并且享受一切中国职员所得不到的特殊优待条件。一九四三年的所谓“取消不平等条约”，并没有真正实现海关的自主，只不过是把海关的管理权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到另一个帝国主义者手里，海关的最高官员由美国人代替了英国人。

帝国主义者掌握我国海关大权后，继续扩大损害我国

主权，如将与海关无关的职务，如保证航运的安全和巡卫国境海岸等，也揽入海关管理范围之内，用我国海关的和其他的收入，建筑港口、灯塔及其他助航设备，这些设备，对我国固有一定用处，但首先是利用来保证外国运输的安全和方便，而不是用来便利我国脆弱的不能与外国资本主义公司进行竞争的航运。再，海关缉私和国防保卫工作，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任务，但他们利用缉私的名义，在有些地方竟将警卫国境海岸的国防保卫工作也由海关掌握起来。

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以上各种不平等与不自主的状态，收回了中国在关税政策方面的独立主权及管理海关事业的自主权。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国家海关工作与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上所进行的监督与某种管制，在恢复与发展我国人民经济中，应起重要的作用。海关税则，必需保护国家生产，必要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必须是统一集中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

所有和海关无直接关系的职务，如：管理港口、疏浚河道、建筑助航设备、巡卫国境海岸等工作，均应由海关移交给其他有关机关。

为了实现上述关税政策及组织海关工作的任务，政务院特作如下决定：

一、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

二、解除下列各项与海关无关的职务：

1、关于管理海港河道、灯塔浮标、气象报道等助航设备的职务，连同其工作人员、物资、器材全部移交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或市的港务局。

2、巡卫国境海岸的职务及武装舰艇，全部移交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但为了便于海关执行职务及在口岸上进行缉私工作所必需的一些小型船艇在外。

责成海关总署与交通部、公安部共同商讨移交上述工作及其人员、物资的办法和日期。

三、准许海关总署在新海关税则未规定施行前，在输入货物方面暂用一九四八年的进口税则，在输出货物方面暂用一九三四年的出口税则（一九四五年修正本），但某些方面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订正。

四、必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入输出货物的新海关税则，为了制定新的海关税则，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派代表一人任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财政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农业部、交通部、食品工业部、邮电部及海关总署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之，并委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该委员会的人员编制。

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给该委员会主任以权力，得由参加委员会其他各部抽调专家，参加制定海关税则的工作。规定该委员会必需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以前完成上述工作。

五、在制定海关税则时，专门委员会得按下列各项基本原则，进行工作。

1、在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或者暂时还不能大量生产但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品，于进口同样的这些商品时，海关税率应规定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与我国同样货品的成本间之差额，以保护国家民族生产。

2、对于一切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订征更高的税率。

3、在国内生产很少或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种籽及肥料等，其税率要低或免征关税。

4、凡一切必需的科学图书与防治农业病虫害等书籍，以及若干国内不能生产的或国内药品所不能代替的药品的输入，免征或减征关税。

5、海关税则对进口货物有两种税率：对于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应该规定一般的正常的税率；对于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贸易条约或协定关系的国家，要规定比一般较高的税率。

6、为了发展我国的出口货物的生产，对于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所奖励的一切半制品及加工原料的输出，只订很低的税率或免税输出。

六、必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法规，确定海关的组织、权限与职责等，特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以前将海关法规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核。

根据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陈 云

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根据各大区报告，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实有近九百万人。（二）去年秋季规定征收的公粮，虽已大部征齐，但在若干地区尚未征齐，且在征收工作中发生某些偏向；税款的实收数字与预定计划亦有距离。（三）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四）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由通货膨胀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已不能限于一地，而势必影响全国。但是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如不

* 这是陈云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

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〇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作如下各项决定：

（一）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以薄一波为主任，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聂荣臻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大市均分设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各部队各机关的首长必须亲自负责，核实现有人员、马匹，消灭虚报数字。立即制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及招人开训练班的现象。政府及企业部门编外及多余的人员，不得擅自遣散，均由全国和各地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使用。各部门各企业如需增添人员，在经过一定机关批准之后，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只有调配不足又经一定机关批准时，才能另外招收。把所有旧军队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不变，但在我军解放前已跑散的人员，不必继续召回。自己要求回家的人员，不必强留。包下来的人员，亦不应采取消极的包饭态度，应该有步骤地加以改造和合理使用。

（二）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杨立三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市、县，各后勤部，各工商企业，均分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各级

首长应亲自负责，指导清查仓库，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今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三) 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四) 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同时，省、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公粮不使损失腐烂以及协助运输的责任。由于若干地区去年歉收和大城市需粮数目浩大，必须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全国范围的公粮调拨计划，以便达到合理使用的目的。除人马口粮和集中起来的残废军人优待、救济、婴儿保育粮外，不经批准，各地不得以公粮拨作经费。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审慎计算其可能，发出调拨命令之后，各省不得拒绝以本省公粮运济外省或其他地区。凡属拨给外地的粮食，均应拨给近地的好

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关于公粮支付、保管、运输的各项规定。

(五) 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二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三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三月份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离库较远之镇市，则由各地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时间按期入库，禁止延期缴库及挪借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经济恢复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

前述四、五两项的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以及税则、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施行，不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

(六) 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各地人民政府及其财政经济委员会，负有监督和协助本地贸易机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计划的任务。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构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贸易机构与各工商企业、各合作社的营业往来，均须依照经营业务的正常经济核算制度，不得以财政经费不足为理由，拖欠贸易机构的货款。一切经

济单位之间的营业往来，必须严守信用，凡遇对方失信时，得向法庭控告。凡属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国营贸易机构每日售得的现金，必须逐日解缴国库，不得挪用延缴。各地贸易机构除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者外，不得向国库支取贸易金款。一切部队机关，必须严遵毛主席命令，不得经营商业〔1〕。

（七）国家所有的企业，分为三种：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依此标准，责成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划清现有各类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并制定对这些企业投资贷款的条例。一切公营企业及合作社，均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其解缴总数及按期缴出的数量，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地方政府根据情况分别规定之。

（八）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私人请求外汇办法仍旧。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

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九)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办法，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根据供给标准和全国概算所列的现金部分，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算，按期支付现金。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对地方经费的支付，照供给标准应发经费数额，扣除其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中归地方的部分。国营企业的投资，文教社会事业费的支付，依照全国概算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支付之。国营企业请领投资款项前，必先有经过批准的工程预算。为确保军政费、事业费及企业投资的币值，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短期无息的或一定数量低息的折实存款。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为保证上述各项经费的支出，必须严格管理税款、公粮支拨、公粮实物变款、公债收入、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折旧金等等，以保证这些收入按时入库。

(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严格地实行上述九项规定，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就可能克服，军政费用的开支就可以保证，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就可能防止，因此，必须严格地完全地予以执行。凡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纪，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这些分子以必要的制裁，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实行。

由于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收支机关脱节，金融物价不稳，要求我们必须有进一步的统一管理。但是，因为许多地方是新解放区，实行统一管理会有若干困难。同时，在公粮、税收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以后，地方经费开支，比以前更困难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而来的困难，其范围、程度和后果都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在粮、税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之后，一切地方工作同志不但不应有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对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应更加积极负责。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地方工作同志的责任。

根据《陈云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的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毛 泽 东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 and 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

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程。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

作，现在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可以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

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

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根据《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 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便利工作的进行，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近一年来，还组织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出版委员会、中央电影管理局等机构。在过去中央政府还未成立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成立，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务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院、署亦已先后成立。原本部所属之新华通讯社已改为国家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处已改为广播事业局，均隶属于新闻总署。本部所属之电影管理局，已改为电影局，隶属于文化部。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除了上述组织已改属政府以外，全国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后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各地政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其组织办法最近即将由政务

院通过)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适当部门报告和请示。所以需要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方面的工作,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长期间是作得非常薄弱,必须坚决加强的。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之重大问题,各地区仍须依照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以及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委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文件的规定,经过党的系统,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根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刊印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示了中国科学工作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过去我国科学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上虽然也有若干的贡献，但是由于反动政权和反动思想所加于科学的束缚，由于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及科学工作者主观上的弱点，我国科学始终没有发挥其为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功能。

现在新的中国已经诞生了。这给我国的科学工作提供了新的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对我国的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特别是其中有关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概括说来，就是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

根据这个总方针，目前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

(一) 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

(1) 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

(2) 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的水平。

(3) 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建立并加强各学科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 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

(1) 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2) 与各大学及其他专门人才训练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协助，统筹专才的训练。

(3) 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予以有计划的分配和补充。

(4) 号召并协助留学国外的科学研究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

(三) 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

(1) 暂以自然科学为重点，先就原有的基础，把过去彼此独立的性质相同的研究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

(2) 广泛征求财经工作部门的意见，并与其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按照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建立地方工作站，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

(3)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目前尚无基础而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各学科的研究工作。

根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 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及各项决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望你们加以注意并督促实行。

中 央

十月十五日

关于第一次全国 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

毛主席并

中央书记处：

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由中央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到省、市以上政府教育部门、工会文教部负责人及有关机关、团体、学校的代表共四百余人，并邀

请了若干大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自九月十八日开始，二十九日闭会。

二、一年来，工农群众教育与工农干部教育有显著发展。去冬老区农民入冬学的达一千二百余万人，今年转为民校坚持常年学习的三百万人。全国工人入业余学校学习的七十万余人。今年起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十八所，学生二千五百余人。山西举办工农速成小学，入学一千二百五十余人。在职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的，河北省已组织起四万余人，太原市已组织起一千五百余人。但上述工作仍缺乏明确的方针和统一健全的领导。

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领导思想，明确方针任务，规定具体办法，改进领导关系，并适当地解决经费及学习时间等具体问题，将工作推进一步。

三、会议经过反复讨论，首先对下列方针原则问题，达到了一致的认识：

（一）明确了加强工农文化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国防军、建立强大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工农群众尤其工农干部迫切要求提高文化，国家必须逐步满足此种要求，首先必须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并着手培养工农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

（二）当前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教育对象，应首先着重对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并逐步地推广到有组织的青年男女和迫切要求学习的工农群众中去。教育内容，工

农干部和积极分子及老区的工农群众，一般地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并适当地结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在半老区、新区，则一般地应与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和群众斗争相结合，以政策时事教育为主，并通过这种学习，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字教育。实施的步骤，应因地因时制宜，有重点地稳步前进，在巩固的基础上要求发展，目前只提“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还不提“扫除文盲”的口号，以免使工作陷于被动。反对急于求成及只追求数字、不讲求效果的形式主义作风。

（三）工农教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工作。工农群众教育经费，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政府予以补助；师资问题，实行以民教民为主的方针，可能时设一定的专任教师作为骨干；学习组织，应适合当地具体条件与群众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能强求一律，不能强求正规化。

（四）领导关系方面，必须实现“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以达到统一领导、分工合作，将工作做好的目的。克服本位主义、包办作风或相互推卸责任的偏向。

四、根据上述方针原则，会议修正通过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工农速成中学、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三个暂行实施办法，及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

例等六项草案，将各种工农教育组织的任务、方针、制度、教学计划、经费、领导关系等问题，明文规定下来。各地区代表并按当地情况与主客观条件分别初步拟定了实施步骤和计划，确定了一九五一年开展工农教育的具体任务和各项补助经费的分配比例。

(一) 工农速成中学：吸收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具有相当高小毕业程度，志愿长期学习、参加革命工作或产业劳动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工人入学，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三年（必要时延长到四年）毕业，使能升入高等学校深造，培养成为各种高级建设人才。计划明年增加到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四人（中央直属八百人，东北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华北四千零四十人，华东二千二百人，中南一千人，西北一千八百人，西南四百人，内蒙一百六十人）。

(二) 工农文化补习学校：暂设初级班与中级班。初级班招收初小程度的工农干部，两年毕业，提高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中级班招收高小程度的工农干部，两年毕业，提高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程度。中级班分甲乙两类，甲类以文史课为重点，毕业后可升入政法、文教部门的干部学校或干训班；乙类以数理课为重点，毕业后可升入财经部门的干部学校或干训班，学习政策、业务后分配工作。计划明年招收学生两万人（华北九千人，华东五千人，中南三千人，西北二千人，西南一千人，东北、内蒙未计入）。

(三) 机关干部业余学习：凡不及初中程度的在职工农

干部拟均以学习文化为主。计划明年组织起二十五万工农干部补习文化（华北八万人，东北四万五千人，内蒙五千人，华东五万人，中南三万五千人，西南二万五千人，西北一万五千人）。

（四）职工业余教育：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争取三、五年内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由厂、矿、企业的行政、工会及有关方面，统一分配职工业余时间。学习文化时间以每周不少于六小时、全年不少于二百四十小时为原则。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不占文化学习时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可单成立政治班或技术班。经费主要从工会的百分之一一点五文教费中解决，企业行政方面予以协助，政府作重点补助。职工业余学校学员人数计划明年发展到一百五十万零五千人（东北五十万人，内蒙五千人，华北三十万人，华东四十万人，中南二十万人，西南十万人，西北五万人）。

（五）农民业余教育：凡经过土改，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的地区，农民业余教育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除冬学、识字班、学习小组等组织形式外，在基础较好的村庄，可成立农民业余学校，坚持常年学习，农忙时放假，全年上课一百五十次到二百次，每次一至二小时。经费主要由群众自己解决，县教育粮划出百分之十至二十作为补助费，另由中央作重点补助。民校学员人数，计划明年发展到五百零一万人（东北一百九十万人，内蒙五万人，华北一百六十五万人，华东九十五万人，中南三十万人，西南十万人，

西北六万人)。

五、加强领导问题：为加强工农业余教育的领导，拟在各级政府教育部门设专管机构或人员。另由政府与工会或农会及有关团体代表组织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全国、市），或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省、市），或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县），以便统一计划，分工合作。

六、此外有两个问题，因牵涉范围较广，只一般交换了意见，未作具体规定：一是工农干部在职学习问题；另一是举办工农干部学习业务的各种干部学校问题。拟请中央召集各有关部门会商解决。为了有计划、有系统地解决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问题，我们建议在政务院设干部教育委员会，由人事部、教育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参加，统一领导和规划这一工作（此事即由中宣部、中组部于本周内邀集各部门开会讨论——乔木注）。

七、据各地代表反映：有的地区对工农干部教育及工农群众教育重视不够，只顾眼前工作，缺乏长期打算，工农速成中学招生时，将编余人员及不好处理的干部介绍入学，而不肯派好干部学习；有的地区，政府教育部门与工会之间、企业行政当局与工会之间、地方工会与产业工会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不够协调，工人学习文化的时间没有保证，影响工作的开展。拟请中央通报各级党委予以注意（此事即由中宣部另电通报——乔木注）。

上述各节，是否妥当，请指示。

钱俊瑞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刘 子 久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

根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刊印

七

团结统一

毛泽东、朱德复重庆号 巡洋舰官兵电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朱德对程潜、陈明仁等 起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

程潜、陈明仁等致毛泽东、 朱德等的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西安彭副总司令，南京刘司令员，邓政委，汉口林司令员，罗政委，邓政委，上海陈司令员，饶政委：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致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詎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起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斂，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既被迫退休，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籍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狙于抗战之役，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

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产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特此布闻,诸维察照。

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熊新民,军长谷炳奎、彭锬、杜鼎,副军长李精一、方定凡、汤季楠、鲍志鸿、杨馨文、于一、刘光宇,师长张用斌、夏日长、汤季楠、杨文榜、刘壘浩、康朴、卫轩青、曾京、张诚文,湖南全省绥靖副总司令刘兴、李觉、王劲修、成刚,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保安师长何元鼎、王笃恭、张际泰、丁廉、颜梧,宪兵团长姜和瀛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朱德对董其武等 起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

董其武等致毛泽东、朱德 等的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的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方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之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的投靠帝国主义，乞灵于帝国主义。反

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的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派的行政学院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的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进犯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虽然吃过马料，吃过沙土；但我们为了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坚持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供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的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

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将何以对死难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只有原形毕现的匍匐在帝国主义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白反动派和人民的利害是相反的，和革命的利害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害，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卑劣无耻的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既然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无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派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

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完成。

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之下，努力奋斗，才能达成人民的愿望，才能符合我们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正确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的为人民服务！让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前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 前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 前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 前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俞方皋 前陆军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第八十六师师长胡景通 前陆军第三一〇师师长张副元 前陆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 前陆军第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 前陆军第二二八师师长杨仲璜 前陆军第三二〇师师长马逢宸 前陆军第三二六师师长王崇仁 前陆军第三一九师师长张璞 前骑兵整

编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 前骑兵整编第十三旅旅长高理亭 前独立第三旅旅长乔汉魁 前骑兵第五旅旅长安恩达 前骑兵第十一旅旅长陈秉义 前绥远全省保安副司令孟昭第 前归绥警备司令张潜 前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 前绥西警备司令于霖瑞 前保安第二旅旅长张振基 前保安骑兵第四旅旅长张汉珪 前保安骑兵第六旅旅长邬青云 前第三十二兵站分监王度 前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 前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阎肃 前土默特旗总管兼绥远省政府委员荣祥 前绥远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 前绥远蒙政会委员兼绥远省政府委员胡凤山 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辛崇业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杨令德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志仁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梁子才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奇世勋(蒙旗)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任秉钧(蒙旗)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理事长吴桐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副理事长吴耀庭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常务委员王质武

九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朱德对陶峙岳鲍尔汉等 起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鲍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一〕

陶峙岳等致毛泽东、朱德 等的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

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敌，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成若，旅长鍾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全樑、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同叩。

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二〕

鲍尔汉等致毛泽东、朱德 等的起义通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钧鉴：

新疆自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根据和平条款，组织了各族人民代表的民主联合省政府以后，一向在张治中将军领导之下，推行全省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三年多以来，因为国内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不能圆满达成任务，但由于全省各族人民的支援，以及伟大的友邦的鼓励，新省终于能够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即在张治中将军为全国和平运动而离开西北，国内反动势力继续顽固挣扎的时候，本省仍然为维护和平，争取和平，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深刻了解，新疆人民的惟一的愿望，是在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祖国的扶助之下，才能完成富强康乐的新新疆的建设，更进而为全国和平建设贡献其力量。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经召开，一个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在目前。全国人民，都为这有

史以来伟大工程的奠基而欢欣鼓舞。新疆全省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感觉兴奋。我们现在代表新疆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同胞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邀请留在伊宁的省委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必能迅速地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谨此电陈，敬候指示。

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刘效藜、陈方伯、刘永祥、白文昱、刘德恩、尔德尼、鍾棣华同叩

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对“两航”起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国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总经理，及两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 全体员工起义的通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副主席、宋副主席、李副主席、张副主席、高副主席、周总理钧鉴：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经营交通事业，向以服务社会人民为主。成立以来，经人民多年血汗培养与从业人员一致之努力，乃能粗有现在之规模。不幸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两公司受其挟持将营业机航重心一度迁离上海，随其到处流徙，几濒绝境。而国民党政府最近复一再逼迫两公司迁往台湾，两公司乃系国家之资产，从业人员之事业，自不能任其破坏灭绝。况值解放军事业经底定，建国大业正在开始，经慎重考虑结果，决定依照公司一向服务之方针，并顺应全体同仁一致之愿望，自即日起开始复员回国，所有人员器材即将逐步运回国内，以便筹划恢复原有业务。并自即日起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人民政府，听候指示，不胜迫切，谨此电闻。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刘敬宜

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 陈卓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对前资源委员会 驻港员工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前资源委员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同志们：

十四日电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

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宣布 脱离反动政府的通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副主席、宋副主席、李副主席、张副主席、高副主席、周总理钧鉴：

我们参加资源委员会工作，办理出口矿品业务，目的在为人民服务，促进国家生产，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疯狂破坏，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打击，与我们的目的完全违背。

最近反动官僚在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压力下穷途末路，犹用其一贯贪污舞弊的手法，掠夺留港的资产，以饱私囊。我们对于这种违反人民利益的卑污行动，实在痛心疾首，不忍坐视。

我们认定我们是为国家人民而工作，我们经营的资产是国家人民的资产。今天全国人民推翻了反动黑暗的统治，展开了光明的建设，我们全体同人愿为我们的新国家努力，并使这些属于国家人民的资产用在今后的建设上，决不使贪劣之徒得遂其侵吞掠夺的诡计。我们决定从今天起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不受反动贪官的任何乱命，一致

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宣布脱离反动政府的通电

坚守岗位，为人民保护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谨此电达，伫候指示，不胜迫切之至。

资源委员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
员工吴志翔、龚家麟、梁桑、李新民、冯
日宾、林艾园、孟颂南等三十五人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朱德复班禅额尔德尼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附录〕

**班禅额尔德尼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举，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叩

十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周 恩 来

西北的工作，做得不错，下面谈几个问题。

一 民族问题

我们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来办事，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的政策与国民党那种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按我们的政策去做，各民族必定能够日益团结，必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同时也应该指出，民族问题在西北是严重的，方针、政策虽然对了，但一不小心，还会出偏差，还要出乱子。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大汉族主义常常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就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有时也不免会有一些疏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

* 这是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的总结发言。

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做解释工作，说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说一次不行就再说一次，不怕多说几次。人家终究会知道你的话是对的。

西北的民族工作有成绩，方向是对的，但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三五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后再进行。少数民族只有三千万人。在五亿人口的中国，这三千万人的地区晚一些时候土改，对全国来说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慢一点搞，比闯出乱子来要好得多。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情况不同，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

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我们现在也还不能提出改革的口号，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假如少数民族中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改革，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着急。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提，慢些改比快些改要妥当得多。

二 经济问题

汉族多年来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无意中还可能犯错

误，应该多想想自己的错处。凡事都“求其在我”，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汉族同志应该抱着这样的精神和少数民族通商。

在税收方面，喜饶嘉错主张减一些税。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不要因为收那一点税款而引起不好的效果。

在物资方面，前些时候新疆的同志出国订购了一批货物，如肥皂等日用品。现在因为自己已经有了，又想不要了。我想花点外汇不要紧，还是要把这批货买回来。东西多了，价钱就便宜点，使新疆人民多用一些，国家可以给他们补贴些外汇。甘肃的交通很不便，日用品自然很贵，以后应该设法解决交通问题。

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要办一些轻工业工厂。明年的财政计划，应该多照顾少数民族，要让他们逐步从游牧变成定牧。

救济问题。西北除灾区以外，粮食还算丰富。今后如果什么地方粮食发生困难，中央一定尽力帮助。

三 其他问题

干部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各省应积极创办干部学校，汉族学生应把学习少数民

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必修课程。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区域自治问题。我们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做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好处。各自治区政府应有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在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应包括各方面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的比例要有原则规定，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可以大一些。

纪律问题。凡是涉及民族问题，比较重要的应该请示大行政区，更重大的必须请示中央。许多事情要请示，办事自然会慢一些，但慢一些比出乱子好。

开发柴达木盆地问题。这个地区是很适合于开垦的，但当地的少数民族可能误会我们要强占他们的地方而引起冲突，所以这件事最好慎重一些，不要冒失。

货币问题。新疆币和东北币不同于人民币。东北因为过去关内财经情况不稳定，怕影响东北的生产，而另出了一种票子。以后全国的货币都要统一起来。新疆改用人民币的问题，今天不作决定，但新疆省人民政府可以先考虑一下，做些准备工作。

当前对银元还不能禁止流通，因为纸币威信还不高。将来纸币威信提高了，自然可以解决银元流通问题。对于银元，我们已经在几个地方打过几仗，证明它并不可怕。

新疆需要技术人员，希望提出具体方案。比如需要哪几方面的人才，要多少人等等。提出后，我们再同有关方面研究抽调。

各省回去应该想想明年的计划。十一月份要开政协全国委员会，准备提出明年的经济概算，各省应该提出计划来。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了，我们只能搞一年的计划。五年计划之类的东西，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还是慢一步好。

根据《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邓 小 平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

* 这是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1〕}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

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

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

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

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2〕，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3〕。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4〕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称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

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

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

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

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不搞土改，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

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

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2〕 指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

〔3〕 一九四二年四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九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

〔4〕 “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

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

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李维汉

(签字盖章)

代表 张经武

(签字盖章)

张国华

(签字盖章)

孙志远

(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

(签字盖章)

代表 凯墨·索安旺堆

(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

(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

(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

(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外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一) 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
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二) 具体政策，目前暂行规定下列各项：

(1) 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

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

(2) 外资关系。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只对于于人民经济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金融投机，以及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帐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

(3) 对外贸易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忙于去建立和恢复一般的贸易关系；尤其不要忙于去订立一般的贸易合同；只在对我有利、而又急需者，可与这些国家进行临时的个别的地方性的进出口贸易。天津一向出口的盐、硷、煤及其他土产，均可准此原则办理。

(4) 海关税收。在我未重订海关税则以前，凡为我所允许的进出口贸易，除特许者外，应照旧章征收关税。海关机构，亦应全部接收，派人管理。其中职员，除反动破坏分子外，均可留用。外资在华应纳之税，在未改订税则以前，亦应照旧缴纳，不得停止。塘沽及其他港口，应实施船舶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出入。

(5) 外国传教士。已在我解放地区者，容许其继续居住，执行业务。新来者，暂不批准。

(6) 外国人办的学校。已办之私立外国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其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其学校经费，必须报告其来源；其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新请成立者，不予批准。其专为在华外国儿童主办的外国小学校，许其存在，但亦须报告备案。

(7) 外国人办的医院。已办者许其继续，但须受我监督检查。新办者，未得批准，不许开设。

(8) 外国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已出版之外国报纸、刊物，暂置不理，但须令其送全年报刊呈请登记。经过一个时期调查，交得中央批准后，一般的不予登记，停止出版。特殊的，或暂不干涉，或转为华人出面办理。外国通讯社一律不准发稿，更不得私设收发电台。塔斯社，电通社，应另订合同，由新华社代收代发。外国记者凡未经许可入境，或留在被解放城市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报之权，只予以外国侨民待遇。

(9) 外国人办的文化机关。已办者，经一个时期调查后，视情况，并得中央批准，或派员监督；或实行改组；或派人接收。新来接洽者，暂置不理。

(10) 外国人办的救济机关。其属于帝国主义政府者，如经济合作总署等，应不予承认，拒绝接收其援助和救济。其属于国际合作团体者，须视其有无损害我国家主权，及我人民团体的独立自主之处，方能决定接收其援助和救济与否。尤其是对于美英等国的团体或个人救济，更须识别其背景，有反动阴谋者拒绝之，有进步作用者欢迎之。对外国救济事务一律表示欢迎的态度，是错误的。

(11) 外国雇员。对一切非政权机关的外国雇员，从顾问到一般技术人员，原则上我们不承认其原有机关的合同。但在需要与并无危险性的职位上，可以容留某些外国雇员，继续其工作。其需解雇者，可酌给若干遣散费。

(12) 外国人入境。在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外国人入境要求，除特许者外，概行停止批准。

(13) 上述各项外国侨民，在我解放区内，必须服从我人民政府法令，不得进行任何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一经发觉，定予严惩，或即驱逐出境。上述各项外国侨民，非经特许，不得携带武器，装制收发电台。原有武器或电台者，应即呈交当地公安机关（即公安局）封存，待其本人出境时领回。各国外交人员的随身武器，可容许携带，其电台则应交出封存。

(14) 所有外国侨民，均应遵照当地公安机关的限期，

携带本人像片，亲往指定机关（即公安局外国侨民管理科）登记，并呈验护照。如属合法，概予保护。

（1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三）外事组织，目前可暂行规定如下机构：

（1）各城市，凡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地方，其公安局内，应设外国侨民管理科，专管外国侨民的居住、来往与职业的登记、询问和检查及护照之签发。如发现外国侨民中有护照不符，身份不合及违法破坏等行为者，该外国侨民管理科，即有权呈准公安局按法惩办，或将其驱逐出境。

（2）在规定的城市市政府内，应设外国侨民事务处，专管外国侨民所经营的事务（如工厂、企业、银行、公司、商店、学校、医院、教会、团体、报纸、刊物、通讯社等）的登记、审查和批复。如其问题性质属于一般的批准立案、核准请求或给予批驳者，小则经市政府行文，大则须经解放区政府行文。如其问题性质属于工厂生产订货、进出口贸易乃至银行借贷或其他专门业务者，则应介绍给各级主管机关接洽，而在内部则均应报告中央或中央局核准。

（3）在规定的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一外交问题研究组，由市委负责同志一人参加领导，吸收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外国侨民管理科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研究有关外国侨民及外交问题的各种情况，并搜集各项材料，

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定期报告，并提出应请示的问题和意见。

(4) 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应于政府内设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并兼一个市的外国侨民事务处（如东北兼沈阳，华北兼北平，华东、西北、中原可暂不设），以取得经验，指导各地。

(5) 在目前，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济南五个市的市政府内应成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内的外国侨民管理科，其负责人选，须报告中央批准。其他各市，如有外国侨民在百人以上者，应由中央局经调查清楚后报告中央核准成立上述机构并决定人选，其在百人以下者，只在公安局内设外国侨民管理科，并代管侨民业务。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 方针的补充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天津市委，北平市委，并告林罗聂^[1]，华北局：

中央子皓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想达。现有两事，须暂时变通办理者，特告如下：

(一) 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武官处中，有电台者，连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看其对外作何报告，并与其本国政府及南京大使馆进行何种接触。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公安局亦暂不向他们发出登记通知书，而只从旁侦察其行动。等到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态度，或封存其电台时，当由中央决定电告，或由你们提议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二) 对平津两地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观察其究作何种活动和报导，但对外国通信社，仍应禁止其发稿。外国记者向我机关人员和部队进行访问，

仍应拒绝接见和答复；如被偶然遇到并被询以我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时，可答以尚未考虑这项问题。外国记者在北平电报局尚能向外发报时，如有新闻电稿发南京、上海、我可暂不禁止，让其发出。但我军事代表必须令电报局将其所发电稿于发后按日送阅。在经过一个考察时期后，并经中央批准，再令所有外国记者举行登记审查，到时可考虑其中有否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只以外国侨民待遇。

中 央
子 有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林罗聂，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如果美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 可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我方对美、英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此事请邓、饶、陈、刘加以注意。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致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电报的一部分。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邓 小 平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

* 这是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的一部分。信中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口头指示。

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1〕}，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

* 本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价。

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2〕，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

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头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

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

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目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

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

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们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美国的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是指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编好白皮书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

〔2〕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皇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

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皇俄国的承认。

新中国的外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周 恩 来

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做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

* 这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今天整个世界还有阶级存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家机器在今天还必须重用，这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单一民族或是多民族的国家里，总有一个阶级掌握领导权。我们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现在联合其他阶级来掌握国家这个机器，对内统治反动派，统治过去压迫和剥削我们的阶级，反对地主压迫农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对外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我们的国家。所以国家机器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武器。

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先说对帝国主义，刘少奇同志在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引用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在黄河以西打游击时说过的话：我们对帝国主义在全盘战略上应该藐视它，但在具体战斗的战术上应该重视它。这两句话是非常合乎科学的。我们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应当藐视。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倒了三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被打倒了三个，削弱了两个，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孤立，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壮大起来，在东欧也出现了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说明了真理，从两个世界对照来看，难道我们还不能肯定说帝国主义终将死亡吗？读一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他在三十多年前已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三四十年来，就看到了这种情势，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美国表面上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物质上的损失是不大的，但战后在政治上的损失非常之大。一九四六年起，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很快地衰落下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后不到四五年，在国际上的威信就很快地降低了，所以我们说它是纸老虎，我们有理由藐视它。

拿五四运动到现在的三十年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年相比是短的。再拿日本投降以后的四年同前两段时间来比更是短的。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越接近胜利，就发展得越快。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到二十

世纪初，经过六十年产生了列宁主义。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一七年，仅十几年的功夫，列宁主义在苏联就胜利了。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三十二年，中国革命就胜利了。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从“五四”到现在三十年来，我们的星星之火已经成了燎原之势，烧遍了全中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这是战略的一方面。

不过从战术上来讲，我们要促使帝国主义死亡，就不能轻视它。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二十二年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建军的时候，就有胜利的信心，但是要达到使敌人死亡的目的，是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的。这条路并不简单，外交斗争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有病，它是想尽方法要活的，因为其体内尚有未衰的因素，有新生的血球存在，它必定要挣扎。所以，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须要留意，要仔细，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

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它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我们打硬仗，必须要仔细，不要害怕。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要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

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另外，联合一方面，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国家承认我们，加上阿尔巴尼亚，共有十个国家。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要来承认我们。加上印尼、越南等，便要有十几个国家了。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

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

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刊印

周恩来外长关于国民党反动残余 政权无权代表中国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国组织

秘书长赖伊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于十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政府成立之日，即郑重向全世界宣言：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已流亡溃散，其残余力量不久即将消灭，它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

因此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经变成了一小堆流亡分子的御用工具，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

周恩来外长关于国民党反动残余政权无权代表中国的声明

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周恩来外长关于应立即取消蒋廷黻代表团一切权利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国组织秘书长赖伊先生转
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阁下：

本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公告中，已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反动残余政府业已基本灭亡，不复再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否认目前正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并也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

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

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字）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根据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